

征 文 启 事

贯彻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 举办“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与广东实践”征文活动

以总结、宣传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省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可喜成就为主题,旨在推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认真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深刻领会和积极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由省委宣传部牵头,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东电视台、《学术研究》杂志社、《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社联合举办“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与广东实践”征文活动,征文活动并由中山市中草堂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协办。征文活动设一等奖3名,各奖2000元;二等奖6名,各奖1000元;三等奖9名,各奖500元。征文活动时间由1997年1月28日起至1997年7月28日止。

本刊特向学术理论界广大同仁发出征文启事,敬希踊跃参与,积极投稿。来稿请注明参加“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与广东实践”征文活动等字样,并注明作者单位、职称及邮政编码。

附:征文选题

- 1、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与广东实践。
-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 3、从广东实践看精神文明价值定位和精神支柱、时代精神的确立、形成。
- 4、从广东实践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治、文化伦理和道德理论、规范建设。
- 5、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广东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成功经验和可喜成就。
- 6、思想道德建设如何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服务。
- 7、广东各条战线精神文明建设的典型经验。
- 8、广东各级党组织加强和改善党对精神文明建设领导的典型经验。
- 9、广东加强宣传文化基本设施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 10、广东增强宣传文化事业投入的对策与经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广东专家学者学习座谈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

□陈家义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5周年之际,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和广东省社会主义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在广州召开了纪念“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学习座谈会。来自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南方谈话”的重大意义及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政建设等多方面、多领域、多层次的问题进行学习探讨。大家一致认为,“南方谈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标志着这个理论进入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广东省社科联顾问张江明教授说,邓小平同志身体力行解放思想,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的和新出现的问题。例如,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没有讲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要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我国解放初期,虽然讲革命解放生产力,但没讲改革发展生产力,更没有把两者作为统一的整体,这是“不完全”的。“南方谈话”,一方面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角度阐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还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坚实理论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阐明改革不仅是解放生产力,而且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把两者辩证地“讲全了”,作了新的论证。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的新思想,说明了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首先要解放思想,才能解放生产力,进行改革;而解放生产力的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这就把解放思想和生产实践、前提和目的辩证地统一起来,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和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性的认识,掌握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梁渭雄研究员说,由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南方谈话”以创新性的思想观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三有利”准则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台阶式与稳步协调关系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关系的思想,等等,都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科学地作出了新的概括和新的表述。这些思想理论观点成为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迈上新台阶的巨大物质力量。

广东教育学院梁琼芳教授指出,“南方谈话”提倡要有“冒”的精神,“闯”的精神,要有一股“气”、一股“劲”,才能走出一条好路、新路,干出新的事业,我们坚持这个精神不断努力,才有今天的局面,今天的成就。

中山大学刘歌德教授认为,实事求是必须是每个认识的主体、实践的主体都要

开动脑筋、独立思考,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实事求是还必须有科学的精神,胆子要大,头脑要冷静,心要细,决策要民主、慎重、科学,步子稳,还要不断地及时总结经验,这是“南方谈话”非常重要的思想实质。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孔庆榕教授说,“南方谈话”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的一次正本清源,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谈话”提出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反对人为地限制发展的速度,明确指出经济发展的快速,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反对消极平衡,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有条件的地方应比全国平均速度快,但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使我国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这是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提高到国家的存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高度来概括。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广东教育学院袁惠民教授说,“南方谈话”语重心长地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冲破“左”的框框,“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就是实事求是,特别是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而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的标尺,澄清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糊涂观念,排除了我国利用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障碍。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马中柱教授说,“南方谈话”强调“关键在人”,就是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靠对人的教育和培养,说明加强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关键在人,“和平演变”主要是人变。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这是对人的争夺。使帝国主义的希望变成失望,就要教育好后代。为此,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此其一。其二,以人为本,培养好人才,把人民和干部培养成为“四有”新人,选拔德才兼

备的人进班子”。选好了班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全国人民才能在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三,掌握马克思主义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靠人。

“南方谈话”提出要求人们“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并把它提高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其四,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还是人。“谈话”强调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改造世界观、增强党性锻炼,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结合起来,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张先贤教授认为,“关键在人”,这里所说的“人”,首先是指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因为他们是否德才兼备,能否廉政勤政,是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大局成败的决定因素。因此,在“谈话”中特别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几年来,经过多次的综合治理,党风、政风的建设,取得积极的进展,当前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是也要看到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和蔓延,一些干部职业道德失范,在违纪违法的案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个案有所上升。这种新倾向,使党风、政风进一步受到损害。为此,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是个紧迫任务,廉政建设是社会系统工程中的关键工程。

中山大学陈福雄副教授说,“南方谈话”发表5年来,中国的社会面貌、综合国力、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都取得了令人欣慰的进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遵循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沿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乘胜前进,成就喜人。

作者陈家义,广州广东省社科联教授
(510050)

责任编辑:冯 生

邓小平南方谈话闪耀着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的光辉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 5 周年

□张江明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 5 周年以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走上新台阶。现着重探索其中几个辩证关系问题。

一、解放思想与解放生产力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解放思想,看作是一切工作和行动的前提。如果思想不解放,就不可能接受新事物,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也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1979 年 12 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实质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体报告的讲话,他把解放思想放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之前。在讲到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时,他认为“首先是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思想先行,尤其是解放思想先行。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工作和生产才能达到什么程度。当然,解放思想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是胡思乱想,不是讲大话、假话。“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①

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不是停留于一般的解放思想,而是要思想大解放。他提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他要求“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解放思想是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紧密结合的。我国的历史证明:在旧中国固然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同样要自觉地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个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川流不息的辩证过程,是生产关系从新变旧又从旧变新,即从适应生产力

发展到变为束缚生产力、需要解放生产力,又到新的适应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辩证过程。但是,要解放生产力,首要的是解放思想。例如,如果思想不解放,不敢“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就不可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样,如果不敢从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市场经济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进行改革,使被传统计划经济所束缚的生产力得到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事实表明:解放思想是起点和前奏,解放生产力是立足点,发展生产力是目的和落脚点。而生产力获得解放,使生产力蓬勃发展,又推动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前进。这是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互相联结、互相促进的辩证法,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的活生生的表现。

解放思想的具体内容是根据各个时期的形势、实践和矛盾状况来决定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明确指出:要从姓“资”姓“社”的要害中解放出来,从“左”的思想束缚和影响下解放出来。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办经济特区就是“搞资本主义”。^②这些观点实质上是不同意改革开放的“左”的观点。如果不从这些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就不能使改革开放前进一步,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同志针对这些错误认识,明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右和“左”的思想都要反对,右和“左”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而根深蒂固的则是“左”。所以,“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

是防止‘左’。”③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一针见血的谈话,使“左”有所收敛,但还未彻底解决,有了适宜气候和环境,又会换一种花样重新抬头。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时,以姓“公”还是姓“私”的面貌出现。有的人把党中央“抓大放小”的方针,说成是私有化。认为将国有大型企业建立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和采取承包、租赁、出售、职工参股等多种形式搞活小企业,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从姓“公”变为姓“私”。实质上停留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旧观点,不承认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用机械的单一化的模式来看问题,不克服这种错误观点,就不可能贯彻党中央“抓大放小”的方针,不可能搞好国有大型企业体制改革和搞活小企业,不利于深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随着实践和生产力的发展,解放思想要不断深化和提高,不是一次性就可以达到,而是一个思想解放和再解放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不同、阶段不同,解放思想的具体内容和着重点便有所区别,要求有新的解放思想或新的思想解放着重点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

二、改革是动力与矛盾是动力的关系

要解放生产力,必须要以解放思想为前导,以改革开放为必由之路。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把改革的重要性提到很高的原则上来,他一再指明:“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④又说:如果“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⑤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是优越的,

但高度集中的僵化的体制却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和深刻的革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集中地表现为体制上——主要是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矛盾的解决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邓小平同志说:“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⑥又说:“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⑦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各行各业,要配套进行,不宜单项直进。改革也是体制的重新建构,是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革命,不是小修小补的细枝末节。“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⑧或叫“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动力完全相一致。前面说过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一定要通过改革来解决,促进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都明确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

三、稳定、协调与发展的关系

进行改革,必须有一个稳定、协调的社会环境。没有稳定,就不可能改革,也不可能发展。因此,稳定、协调与改革是不可分割地相辅相成的。邓小平同志很重视稳定,他认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⑨我们要采取和平外交政策,争取和平国际环境,以利于经济建设。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统一祖国,以便更好地发展经济,加强两个文明建设。

从哲学上看,稳定、协调、平衡、统一、

团结、联合、调和、静止、凝聚等,是矛盾对立方面同一性的表现,即矛盾双方彼此相容、协调、和谐、稳定、均衡。稳定可以达到协调,而协调则是事物发展由不平衡到平衡,由对立到彼此协作、共同发展,使事物处于稳定的良好的状态,从而得到更大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和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仅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也有重要的哲学意义。这里说明矛盾同一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重大作用,可以居于突出的地位;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既有斗争性,又有同一性(斗争性和同一性相结合),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同一性的作用更大,这是对毛泽东矛盾观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新贡献,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同志重视稳定和协调,并没有绝对化。稳定和协调是为了发展,促进发展,他在南方谈话中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怎样贯彻“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南方谈话总结了我国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的发展路线”,作为指导我国发展的根本原则和指导方针。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我国近代史曾经提出多条发展路线,例如魏源、林则徐、龚自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发展路线,太平天国带有农业社会主义色彩的路线,张之洞、左宗棠的“中学为体,西方为用”的发展路线,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的发展路线,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的发展路线,都行不通,陷于失败。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的发展路线”,包括有丰富的重要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18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成

功的,今后坚持贯彻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关系

坚持“中国的发展路线”有多方面的内涵,最重要的是加强两个文明建设,使两个文明有更大的发展,这就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南方谈话第一次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仅要两手抓,而且“这两只手都要硬”。只搞好一个文明建设不行,一定要两个文明都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两个文明紧密结合在一起,大体上同时产生,同步发展的,后来由于历史的、认识的和指导上的偏离,出现了两个文明的畸形发展。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⑩因为两个文明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这好比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精神文明则为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决定物质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绝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的代价来求得物质文明的暂时发展。“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⑪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

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很重视两个文明建设,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和十四届六中全会分别作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议》,要求从战略地位上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采取战略性措施来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开创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科学地认识两个文明的辩证关系,坚持两手抓,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和同步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法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正确地处理两个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两手抓,只有一手是不行的。”如何从哲学上来理解两手抓呢?

——两手抓,“就是两点论”。^⑫如果

只是一手抓,就会变为孤立静止的“单打一”,陷于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两手抓,要求“互相制约”。两手之间是互为条件、互相伴随的,两个文明建设要做到协调同步发展,就必须两手抓,否则“就没有制约”。^⑬

——两手抓,要求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结合起来。依据各个时期的形势、工作状况和实践需要,在不同时期对两个文明建设可以有不同的着重点,但这个重点不是静态的、长久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按照一定条件的变化而转移的。“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总的要求是协调发展,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两手抓,最重要的是“两只手都要硬”。这是关键所在,不能停留于口头上、会议上、形式上,而是真正做到硬的要求、硬的措施和落实到硬的行动中来。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是体现着两手抓、两手硬的精神的,要认真贯彻,很需要做到五过硬:一是思想上要硬。必须深刻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作用,如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一样,坚持“两只手都要硬”不动摇,坚决克服“自发论”、“代价论”、“先后论”的错误认识,保证思想到位不偏离。二是领导上要硬。《决议》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关键也在党。各级党委必须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就需要第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业务部门专门抓,各方配合齐抓共管。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到党委的重要日程,定期研究讨论,切实解决问题。精神文明搞得好不好,各级领导要负起硬的责任。三是任务指标上要硬。要“把两个文明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考核、评价党政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干部,不仅要看领导物质文明建设的实绩和本领,而且要看领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实绩和本领。这要作为对干部使用和奖惩的基本依据。”四是投入上要硬。要按照党中央《决议》:“切实增加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定出比例,逐年增加,还要‘建立规范有效的筹资机制’,多渠道

投入,鼓励社会力量资助宣传文化事业,‘保证必需的资金’。经费投入如何是精神文明建设过硬还是不硬的重要表现。党中央《决议》明确指出要‘切实解决目前宣传文化事业投入总量偏少,比例偏低的问题。’要逐年增加投入的幅度”不低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还要“运用税收、贷款、价格等经济手段支持宣传文化事业”,进一步完善“财税优惠政策”等。五是组织上要硬。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队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成为党委的重要部门。“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宣传文化教育队伍”,应该是坚强的有一定数量的队伍。要改变精简机构首先以宣传文化和政工为对象的做法,只顾眼前利益,把机构撤销或合并,人调走,成了“空挂牌”。工作是要人去做的,没有人,便无从开展工作。当然,人要精干,要有战斗力,要高素质,才能做好工作。

邓小平南方谈话,特别提到广东力争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两个文明都要搞好,达到高的水平。因此,广东更要加强两个文明建设,更要重视和拟定过硬的措施来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广东是具备必要条件把精神文明搞好的。只要“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党的领导干部“发挥表率作用”,坚决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发动各个部门和广大群众齐抓共管,采取切实有效的过硬措施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一定可以把广东的精神文明建设搞好,达到高水平要求的。

①⑤⑩⑬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第150页、第208页、第409页。

②③④⑥⑦⑧⑨⑪⑫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373页、第375页、第370页、第108页、第138页、第135页、第284—286页、第143页、第306页。

作者张江明,广州广东省社科联研究员(510050)

责任编辑:冯 生

发展与发展的观

——兼论可持续发展

□赵凤歧

在本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审视以往的行程,谋划自己的发展战略,以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而在不同的发展战略后面,又是以关于发展的不同理论为支点的。

对各学科研究发展的成果给以宏观审视,把“发展”本身作为对象加以考察,这是哲学所面临的课题。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理论见解,也可以是一种发展模式,还可以成为可供选择的发展战略,同时它又是一种发展观。

我国在跨世纪的系统工程中,已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确定下来。开展对发展与发展的研究,包括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

对当代发展理论历史进程的一般考察,是正确理解现实和未来发展的必要前提。

二战结束以后,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谋求战后重建、恢复和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各种研究发展的理论便应运而生。“发展”成为了诸多学科关注的热点。仅就理论流派而言,就有发展纯理型学派、心理学

学派、传播学派、社会学学派等等。新的发展学科更是层出不穷,如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战略学、发展伦理学、发展美学,以及未来学发展理论等等。这些不同的学科,虽然其研究的专业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视角却一致,即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上。在这诸多的发展学科、发展理论中,有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罗森斯坦等人的“大推进平均增长理论”、还有“基本需求论”、“增长加公平论”等等,这其中又有诸多的增长模式,如卡尔多增长模式、新古典学派的增长模式等。在未来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中,有战后初期的“经济增长论”、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论”、卡恩的“大过渡理论”、托夫勒的“权力转移论”等等。

概括地说,就战后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线索而言,大体上是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增长论”到“增长极限论”,再到“综合发展观”,到“可持续发展论”,以及相伴而行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等历史演进过程。

1. 经济增长论

这种观点在发展理论中出现最早,在经济发展的起初阶段,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发展学是从发展经济学开始的,然而发展经济学起初实为“增长经济学”。战后西方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增长理论,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提出了若干经济增长模式和理论。当时一般学术界还没有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多数学者实际上是认为“发展=增长”。这种发展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战略是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目标的。这种观点把经济的增长作为发展的唯一绝对的标准,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其具体表现就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百般追求。这种“发展=增长”的观点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却带来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许多问题,带来了“没有发展的增长”或“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严重后果。于是人们对这种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产生了怀疑。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增长与发展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也日益加深了。本世纪60年代末以后,关于发展离不开增长,但“增长不等于发展”的见解,在更大的范围内取得了共识。国际学术界几乎普遍认为,不能把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而应当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加以区别。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含义较窄,通常指纯粹意义的生产增长;而发展的涵义较广,除了生产数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和某些制度的变化;不仅包含经济增长,还包含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等等。而且,这种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其他各种相关因素对增长的制约,那么总有一天,这种增长本身也是难以维持的。

2. 增长极限论

这种观点在当今的发展理论研究中影响很大,大家都知道这是罗马俱乐部在70年代为批判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而提出的。增长极限论认为,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浪费使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再这样下去,环境将被严重破坏,并且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增长极限论的确给人类敲响了一个巨大的警钟,告诫人们要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看待发展问题。

1972年,受罗马俱乐部的委托,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等人提出了第一个报告,即《增长的极限》。这个报告一出版,就在全世界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增长的极限》的中心论点是:人口的增长、粮食的生产、投资的增加、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消耗都具有指数增长的性质。也就是说,过一段时间就增加一倍。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个时期达到极限。原因就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地球是有限的,空间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吸收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作者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极限到来时的可怕情景:由于粮食不足造成的饥饿和死亡,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消耗殆尽,环境急剧恶化。这样,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就要受

到威胁,世界末日就会到来。

《增长的极限》一出版,立即在全世界思想界和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把这本书看作是悲观主义的代表作,有人甚至认为这本书反映了资产阶级对前途的绝望情绪;也有人指出了本书存在的一些技术上的不足之处,如所用模式的缺点、对于科学技术进步作用的忽视,等等。但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则认为,在人口爆炸性增长、资源大量消耗、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梅多斯等人能一反世人的俗见,把长期受到忽视的问题尖锐地提到人们的面前,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导致罗马俱乐部对世界发展持比较悲观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忽视了人类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动作用以及科学技术进步所能发生的积极影响。法国学者就曾指出,罗马俱乐部所制定的一系列“全球模式”,局限于以“增长——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而把人——社会、人——文化、价值、体制结构等极其重要的关系和因素排除在研究之外。这样,他们的立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批评,可以说是一语中的。

3. 综合发展观

经济增长论是由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增长极限论和可持续发展是由未来学家提出来的。发展问题的日益突出促使人们对发展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多学科介入,极大地丰富了发展观,于是,一种新的发展观——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佩鲁的《新发展观》一书可以视为综合发展观的代表作。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应当是整体的、综合的。这种观点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

佩鲁的《新发展观》序言中讲到:“自柏拉图时代以来,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思想产生于矛盾,而发展这一概念恰恰造成了我们时代一个重要的自相矛盾的事实:向往进步但又对其后果心存疑虑……。对整个发展问题的看法同时就是理解现实和现时

代的钥匙。”^①佩鲁在书中关于影响发展的各方面因素应予综合考察的观点,对于理解现实和现时代的发展,确具有重要意义。佩鲁的《新发展观》是一本从哲学的理论高度来论述发展问题的重要著作。他认为,新的发展就是为全人类和一切人的利益服务的发展,也就是促进人类和一切人自身的发展。文化价值在发展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发展战略上,新发展观强调发展战略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所谓整体的,是指发展模式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观点,既要考虑到作为整体的社会——人的各个方面,又要看到人们相互依存关系中出现的多样性;所谓综合的,是指各个部门、地区的协调一致;所谓内生的,则是指充分正确地利用本国的力量和资源来促进发展。^②新发展观认为,“新的发展”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能输出的模式,要实现新的发展,必须改变现存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新的发展战略力图改变发展各个子系统联系不紧密的状况,强调发展的各个侧面是互相紧密依存的。

可见,佩鲁的发展观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他十分重视联系的多层次性与全面性。

4.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

当代发展研究中真正把以人为中心提到发展观高度的是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该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指出:“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社会发展与其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不难看出,在以人为中心发展的各种观点中,尽管歧义很多,对“人”的理解不尽一致,但其共同点是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

5. 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80年代提出

的,并且围绕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讨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和辩论,终于在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期间达成共识:“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可以看作是增长极限论的续篇。这种观点认为以往的发展模式尤其是西方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已走入绝境,强调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的基础之上,重视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

从上述可以看出,关于发展的各种理论和观念,都不仅与某一特定阶段的历史条件相联系,而且也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相联系的。从“经济增长论”到“增长极限论”,再由“综合发展论”到“可持续发展论”,以及“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等等,大体上反映了人们所走过的历史发展进程,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条件下对于影响发展的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程度;发展的观念一般地总是在不断进步的。但是不同的发展论断在历史演进中的关系,并不是以先后顺序一个全错另一个全对的关系,而是在历史间断性、前进性的同时也存在着连续性、互补性。相互吸收,辩证扬弃,是发展理论在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一种发展理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用,一定要以那里的具体国情具体条件为转移。这个基本点,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种发展观的不可移易的真理。比如说“增长”,把社会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划等号,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忽视了导致发展的其他因素,忘记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因为它导致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后果。但这并不是说,似乎可以离开经济增长而言发展;果如是,那一定是空谈发展。发展学家M·A·西纳索在给佩鲁《新发展观》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也说,什么是发展呢?“发展,既指发展的活动,又意味着结果的状态。”^③增长与发展的关系又如何呢?“增长是规模的一项指标,它是从发展

中获得自身意义的,这种发展虽然同增长保持着差异,但又围绕着它,并在增长取得进展时显示出自己的效益。”^④这就是说,没有结果的“发展”活动是无意义的。而发展,虽然不能等同于增长,两者有“差异”,但发展又必须围绕着增长,而不是避开或抛弃增长,并且只有在增长取得进展时才能显示出效益,即达到有结果的发展。

发展与增长的差别性,使我们不能把两者混同,两者的同一性又使我们不能把它们绝然割裂开来。

二

可持续发展,是关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人类文明进展到新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跨世纪工程的一个基本要素。因此,在概览了发展理论的历史进程之后,有必要对此作些分析。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观是本世纪70年代以后提出的,二战以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经过劳资关系的调整等措施,特别是把科技发展成果应用于经济发展,使得一些发达国家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但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都是以各种资源的巨大消耗、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一些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人口的急剧增长、资源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等引起了一些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未来学家、哲学家、环保学家的关注。前面提到,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作为研究人类困境的第一个报告问世。这一报告对以往的发展模式作了反思,提出:如果不改变发展模式,“只要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正反馈回路继续产生更多的人口和更高的人均资源需求,这系统就被推向它的极限——耗尽地球上不可再生资源。”^⑤这就是有名的“增长的极限论”。这个研究报告中的悲观结论受到许多人的反对,但其中所提出的观点却包含着合理的因素,而“增长极限论”在全世界引起的巨大反响和争论本身,也标志着人们对以往发展模式的反思。

1981年,美国农业科学家莱斯特·R·布朗出版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布朗的这本书被认为是对“可持续发展观”的首次系统阐述。

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了人们代际关系即一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问题,这是此前的发展论中较少或根本没有系统论述过的。与此相关联,布朗还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情景作了一些描述:“持续发展社会同我们现今所处的社会,在某些方面将有所不同。人口规模多少处于稳定状态,能源利用将有效得多,经济将主要依赖可再生产能源来维持,其结果,人类和工业活动范围将更为分散,远不像在靠像石油支持的社会中那样集中在城市。”^⑥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基于对以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问题和面临的人口、资源等一系列难题应运而生的,它是对人类传统的单纯追求产量、产值的片面发展的历史反思的结果。

可持续发展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也带来了一些特点。

回顾历史,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的确一次次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历史的发展提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要报复我们。每一次这样的胜利,在第一步都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今天,人类文明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的力量,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这种力量空前强大,使得人们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显示出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支配力,但是与这种“支配力”相伴而行的是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力。这种破坏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在某些领域使环境的破坏成为不可逆转的,使某些资源成为不能再

生的,使自然界本身自我修复、自我再生的能力有根本丧失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迫使人们不能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了,改变观念和“端正”态度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就是改变过去那种人与自然的对立斗争以及一味“征服”的旧观念,而代之以符合时代特点的新观念。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的新关系,是人们所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这种观念转变包括:应从历史上那种人与自然的对立斗争转变为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从一味向自然索取转变为考虑持续发展,并且以未来发展来规划现在。

以未来发展规划现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使人类与地球从“互相为敌”的怪圈中解放出来,而且人类必须采取主动,这也是观念转变的重要一点。一些学者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赖以生存”,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小小寰球”变得似乎愈来愈小了,“人满为患”的说法反映了一定的现实。有论者提出:“这个地球不是我们从上一代人手中继承下来,而是我们从下一代人手中借来的”。这就是说,我们讲发展不能只顾今天,而不顾明天,不能只顾发展而不顾环境,不能只顾利用资源而不顾保护资源。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符合当代人的利益,又不危害未来人类利益的发展,只有这种发展才能持续永久,才能保障人类在地球上世代繁衍生存下去。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使发展成为在今天现实的、合理的,同时又能使明天的发展获得可能的空间和条件,因此也是为未来发展创造条件的发展。

三

放眼望去,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是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体,而这个复合体生态系统中的人文因素则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概括地说,体制的失调,行为的偏颇,价值观的混乱等人文因素都可能造成对复合生态系统的不良影响,都会影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首先,体制对复合生态系统的影响。

在旧时代,传统的政治体制旨在管理众人,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变迁伴随着千百年来改朝换代;而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失调又辐射着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而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不同时代的体制在世世代代的人类有序和无序地排列组合起来的同时,自然资源也就成为相互对立阶级之间斗争的无辜牺牲品。人类的体制在不同时代由不同民族、国家、政府所操纵,各不相同的目标、操作方法在许多情况下相互矛盾、相互掣肘,导致复合生态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相互排斥,从而造成了不利于人类的后果。

资本主义的掠夺和竞争使得工业革命后已屡受破坏的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在通过消耗大量资源为代价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体制的不健全,形势判断的失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等等,既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也会造成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更不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在深化改革中,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非常有利于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也是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

其次,文化对复合生态系统的影响。人类文化始于对自然的认识。生态危机表面上是人和自然矛盾的激化,其本质是人类文化的危机,即人类文化的失衡引起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紊乱,“文明人跨过地球表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⑦生态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直接的,而对人类文化的摧残却是难以定量的。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很值得重视。例如,把天人合一当作修身养性的道德准则,这也有可取之处。在备受生态危机冲击的西方,许多学者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寻找挽救地球的真谛,不是偶然的。

我国古代朴素辩证自然观的“阴”表示保守性、柔弱性;“阳”表示进取性、刚韧性。

“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⑧概括了自然界阴阳的互补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达到“仁”的境界，便和天地浑然一体。朱熹的“温然利人爱物之心”^⑨将爱人之心和爱自然统一起来。

荀子曾告诉人们不能逆自然而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恶辽也辍广”。^⑩

节俭美德在我国代代相传，使得今天的中华民族在占世界7%的耕地上，生产了占世界20%的粮食，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虽然骄奢淫佚是历代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但是，古代关于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等有机自然观，在满足人类合理需要的同时，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思想源泉。中国传统文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目标，许多仁人志士不畏权贵，反对奢侈生活。孔子提倡朴素的礼乐制度，“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故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蓄聚有数，车器有限，以防乱之源也。”^⑪庄子提倡安于自然赐予的生活，“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⑫在消费时尚不断翻新的今天，享乐主义不仅败坏了人的素质，而且也在洗掠自然界，这不仅给经济发展增加沉重的负荷，而且使得文化滑坡。古代先哲提倡节俭、反对浪费对保护自然资源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而人类对环境变化机理缺乏研究，则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一条日益扩大的鸿沟把我们同真实的世界分隔开来。”^⑬面对急剧变化的大自然，人类文化的进步落后于生态循环的节奏，“世界要求我们所做的，是要我们适应从一个文明时代走向另一个文明时代的急激变革。”^⑭人类必须从文化上自救，在生态意识、生态思维上实现和自然的平等相待，这也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

第三，价值观对复合生态系统的影响。传统的价值观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出发点，以征服自然为进步特征，从而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这种价值观的后果一方面误导人们不择手段地向自然索取，不是理智地思考人类应该怎样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而是能利用多少就利用多少，多多益善。另一方面，更为可怕的是当生态平衡失调的同时，人类的价值趋向也走向混乱，造成人类的自我异化。传统价值观在强化复合生态系统的经济子系统的同时，削弱了社会、自然两个子系统的功能，致使复合生态系统紊乱。实现持续发展，必须更新传统价值观，普及和强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价值观。

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不是在空中楼阁中实现的，而是植根于现实世界的自然环境。生态平衡是复合生态系统的关键一环，走出生态危机的怪圈是实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实现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①②③④佩鲁《新发展观》第1页、第2—3页、第201—202页、第3页、第10页。

⑤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⑥莱斯特·R·布朗：《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页。

⑦弗·卡特、汤姆·戴尔：《衰亡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⑧《周易·系辞上传》。

⑨《文集·仁说》。

⑩《荀子·天论》。

⑪《孔子集语·齐侯问》。

⑫《老子》80章。

⑬⑭佩切伊《未来一百页——罗马俱乐部总裁的报告》，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页、第141页。

作者赵凤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00732）

责任编辑：冯 生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市场理性的培育

□任建东

一、可持续发展蕴含的伦理精神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个动态的全方位立体系统,其突出的意义在于:第一,它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局限,将经济发展这一中心纳入社会整体发展系统之中,要求社会整体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使其有一个合理的物质能量转换过程,避免了为经济而经济的单一思维方式,使经济活动置于社会系统的总体布局之中,以增强经济活动的实力和后劲,从而使社会经济有可能健康、协调、稳步地发展。第二,它着眼于未来经济活动的整体效应,将现在与未来看作一个合理的发展过程,避免了孤立的单一的经济行为可能引发的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现象,使经济运行充满再生能力,从而使社会经济有可能快速、持续、平稳地发展。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战略重点在于强调发展的整体性与持续性,这一思想无疑是对旧的发展观、经营观的革新,同时是对道德理性的更新。

道德理性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是适应一定社会经济伦理保障,体现着特定的生产方式所展现的伦理精神。正如情感理性之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金钱理性之于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一样,它为各自的经济内容提供行为动机、行为规范和一定的行为模式。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它也必然需要和能够培养出体现自身内容的伦理精神。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我国的现代化模式是在自身未经过充分酝酿和长期历史发展的情况下,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从外部引入的,可以说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相适应的道德理性尚未萌发,尽管我们承认这一模式能够培育出与其相应的道德理性,但是消极的等待无补于这一模式的顺利展开,因而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培育体现时代内容的道德理性精神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现实问题。

从上述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内容已可看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本身蕴含着一定的道德理性内容,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可持续发展战略凸现出整体意识。它要求将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起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考虑到与之相关的人(包括人的数量和质量)、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一切与经济发展有关的要素,使经济发展能带动社会系统的全面进步,而社会的全面进步又必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和动力,在这种双向互动关系中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得益彰,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与那种追求单纯的经济指标,忽视甚至损害经济发展其他要素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实践也证明,一些发展中国家为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所走过的“有增长无发展”道路其教训是深刻的,只有结合经济发展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关系,才能真正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赋予我们的必然结论。

第二,可持续发展强化了发展的动态模式,可持续发展重点强调发展的连续性,其目光不仅指向现在,更重要的是指向未来,它要求架起由现在通向未来的桥梁,要求人们在动态发展中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力戒孤立的行为方式。这就是

说在经济发展中,要注重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不只是在规模上做文章,而是进一步“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
①使经济发展保持经久不衰的实力。

第三,可持续发展使优化意识更加浓郁。发展中必然有消耗,以最小的消耗获得最大的产出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许多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枯竭日益昭示我们必须对人类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益。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决不允许对有限资源的无端浪费。如果这样,发展的可持续性必然受到巨大伤害,因而优化社会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极其重要内容。这里社会资源已不是仅作为生产原料的自然资源,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包括了经济条件、技术条件、管理条件与经济活动要素的最合理结合,这种优化是企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样也是社会进步的集中体现。

第四,可持续发展突出了法制化和规范性。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必然要为经济活动设定严格的活动规则,以确保经济活动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的竞争,没有公平的竞争秩序,经济行为势必陷入混乱之中,社会公正原则必然受到破坏,也无从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作用,进而也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因而法制化、规范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坚强保证。

可持续发展战略本身蕴含着一定的道德理性内容,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性原则,对此我们可称作市场理性,这一理性精神只有融入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使之转化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原则,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可持续发展的顺利进行,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发出的道德理性呼唤。

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理性困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培育,由于未经过充分酝酿,理论落后于现实实践

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中,缺乏健全的市场理性指导,而以金钱理性和情感理性为内容的旧的道德一度成为支配许多人的道德原则,致使市场行为陷入近乎非理性的境地,这不仅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进一步完善,而且在根本上堵塞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理性困境最为突出的表现为:

其一,急功近利的短期效应,从客观上讲现代企业的运行与国家的现代化一样,在启动中需要尽快积累起一笔巨额资金,这是市场经济对企业的客观要求,在市场经济不规范的情况下,这使一些企业为追求原始积累而采取各种非理性的经营行为,这一趋势左右和影响了众多的企业行为。私营经济自不用说,国有企业也不例外,原有的承包方式使经营者都极力想使企业在自己的承包期内有更大的效益,而对企业的长远发展目标缺乏合理的思考,因而急功近利式的短期行为充斥于市场运行的方方面面。这一方面造成市场行为中的违法乱纪、坑蒙拐骗等不规范化行为模式,另一方面,这种短期行为极大地伤害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使企业的再发展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心态所产生的行为引发了道德的滑坡。这种为求发展而采取堵塞自身发展的经营行为与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的理性要求相违背,是市场理性所不能容忍的,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更是格格不入。

其二,粗放经营的陈旧观念,在急功近利的短期效应影响下,一些经营者不是着眼于企业的长远目标去挖潜、革新、上规模、上档次、求质量求信誉,而是固守陈旧的经营方式,盲目地追求规模、追求产值、靠拼设备、拼资源去应付市场,这种违背市场理性的陈旧观念,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削弱了企业再发展能力,严重影响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因而经营方式的改变是市场理性对我们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一环。

其三,发家致富的自利行为。自然经

济留给人们一个道德原则就是发家致富、荣宗耀祖,这种封闭的理性原则最容易形成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它与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相结合,为个人或家庭的利益而绞尽脑汁,由于小农意识的法制淡薄,最易诱发违法经济行为。另一方面,即使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小农经济意识也决定了必然满足于一定的发展状况而贪图享受,不思进取,最终失去发展的机遇与可能,这与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形成巨大反差,同样违背市场理性的要求。

其四,血亲利己主义的行为模式,情感理性是自然经济的一大特色,它将道德理性限定于特定的亲缘、地缘的封闭圈子,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行为模式。我国随处可见生产经营中的家族模式,用人机制中的裙带关系,这种亲缘情感理性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血亲利己主义,它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保护了愚昧与落后,也拖住了自身发展的后腿,与市场理性所体现的公平竞争、优化配置相抵触,难以使企业在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旺盛的势力,血缘、地缘的亲情关系也日益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市场经济发育中的种种理性困境揭示出市场经济并不能自发地形成相似的道德理性精神,只有深入探究市场经济需要的市场理性精神,从中提升和培养道德理性原则,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有效地实施。

三、积极培育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市场理性精神

市场经济所蕴含的理性精神是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使其尽快转化为市场主体的经营原则,仍然需要我们付出艰巨的努力,去积极地培育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市场理性精神,由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去努力。

首先,把握市场理性的环境建设。市场经济固然不分姓资姓社,只是社会资源

配置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既要体现市场经济的精神实质,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这一价值目标与市场经济的价值追求具有一致性,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最终体现。但同时,由于其他价值观、道德观的存在和影响,市场运行的利益原则、等价原则等也会染上非理性或金钱理性的色彩,上述理性困境正是这种情境的外露,因而引导市场精神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追求相结合是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一环。这就要净化社会道德环境,用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引导人们,在社会中形成高扬正气、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形成有利于市场理性的道德环境和社会舆论氛围,杜绝各种错误思潮对市场理性的影响,这将极大地有利于培育出合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市场理性精神。如果以为搞市场经济就可以完全听凭市场原则的作用,放松社会道德环境,势必造成价值目标的盲目性,影响道德理性的正常发展,难以形成正确的市场理性精神。

其次,重视市场理性的制度建设。健全的市场经济需要完善的法规作保障,这些法规不仅包括立法机构所颁布的一系列法律内容,而且包括一系列道德理性规则。就前者而论是一个健全法制的问题,这里暂不涉及。就后者而论实质是一个道德理性的制度建设问题。道德不仅是靠理想、信念、社会舆论与风俗习惯等来调节人们的行为,同样存在一个完整的制度化问题,只有将道德原则制度化,才能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风范,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公正、合理性。就市场理性的制度建设而言,在当前应着力抓住三个内容:第一,行为规范制度。一方面在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需要良好的道德风尚,有必要提倡和制定社会公德规范,另一方面各行各业有自己特征的行为内容,有必要提倡

和制定具体的职业道德规范,这些规范若不形成制度,仅靠道德自觉其功效可能会大打折扣,道德水平也难以迅速提高。第二,社会赏罚制度。如果善的行为得不到尊重与称赞,无异于助长了恶的行为,如果恶的行为不受到蔑视和惩罚,无异于打击排斥了善的行为。扬善抑恶、赏善罚恶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取向,这种赏罚机制不制度化也难以保障道德取向的有效性。邓小平同志就此明确强调“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分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③严格的社会赏罚制度有助于鼓励善行,杜绝恶习,鞭策人们趋善去恶,这也是市场理性确立的有力保障。第三,道德教育制度。道德理性特别是市场经济下的市场理性不可能是自发形成的,要靠教育、靠灌输,道德教育与其他教育一样必须层次化、制度化,保障其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提高过程,没有制度化的教育培养,而放任自流,靠耳濡目染,靠传统习惯去熏陶去塑造显然不可能获得正确的道德理性精神,只有在制度化的教育中才有助于培养和树立起健康的市场理性精神。

第三,提升市场理性的道德境界。道德行为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道德水准的高低依赖于道德境界的自觉程度。市场理性作为一种道德理性同样存在境界问题,只有崇高的市场理性精神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追求个人的利

益,这是法律所允许的,但它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却是值得探讨的,有的人追求个人的利益是想纵情享乐,有的人是想为子孙留一份家业,有的人是为金钱而金钱的金钱狂,这些行为目的在一定时期都可能刺激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当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失去持续发展的动力。而如果将市场作为检验个人才能的场所,将效益的追求作为展现自己才华,作为为社会尽自己的义务,作为奉献社会的途径时,势必获得更为强大的动力,保持持续发展的动力。这里不同的境界对经济的持续发展意义是明显不同的,可以说境界越高动力越大。在市场理性的培育中,不断地提升道德境界,既符合市场发展的需要,同样也符合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

市场理性的培育依赖于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靠法律靠制度,只有在制度化、规范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市场理性的境界,才会使之日益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早日实现,这也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生长点。

①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1—152页。

作者任建东,新疆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助理研究员 830011)

责任编辑:谭湛明

国有外贸企业资本经营探析

□许经勇 徐清军 袁向阳

一、国有外贸企业实行资本经营的必要性

1、外贸企业多元化格局呼唤资本经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贸体制在进行了一些局部改革的基础上,1988年在外贸企业中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下放地方;1991年通过调整汇率,统一外贸留成,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取消了对外贸企业的出口补贴,打破了多年的大锅饭体制。在这两次改革浪潮的冲击下,一些外贸企业已经冲破了原来仅仅局限于商品经营的旧格局,开始涉足生产、金融、房地产、信息、服务等几乎包括了国民经济的重大领域。但每一个新领域都有着同贸易不同的行业特点和经营规律,面对这样异彩纷呈的局面,外贸企业在经营观念和管理模式上还没有完全摆脱以商品经营为中心的旧体制的束缚,资本经营意识和资产增值观念还没有树立起来,在经营生产、金融等完全不同的产业时往往用商品经营观念和方式解决多元化综合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另外,单一向银行贷款的筹资方式也难以适应多元化综合经营对资金的需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重经营、轻管理,重规模、轻效益,重投入、轻产出等经营思路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

另一方面,外贸企业长期身处流通环节,主要从事买进卖出商品的业务,这是实现利润的途径,而对资本投入到利润创造的过程不熟悉,这种行业特点,也决定了外贸企业在经营思想上注重短期利益,忽视长期投资;注重利润的实现,忽视利润的创造。虽然目前外贸企业已逐步取得相对独

立的经营者的地位,但长期形成的习惯势力依然较强,它仍然约束着外贸企业的多元化发展。这样,迅速发展起来的多元化格局与传统的经营模式发生着愈来愈尖锐的矛盾,出路只能是转换经营模式,即从传统的贸易型的商品经营模式向适应多元化业务的资本经营模式转变。

2、外贸企业不合理的资本结构亟待调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外贸企业采取全方位包下来的政策,即包任务指标、包贷款、包上交利润。与此相适应,外贸企业经营表现为一个公式:国家贷款+出口货源=国家出口创汇,企业在这种体制下无须关心企业的资本存量与增量问题,也无须关心资产的扩大与资金的流通性,外贸企业所关心的是完成国家下达的进出口任务,从商品到货币,从货币到商品,在传统的外贸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根本看不到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利润化的流程。资金在外贸企业里好像过路财神,在整个经营过程中既不需企业资产也不需企业自有资金,这使外贸企业重视贷款,轻视自有资金的作用。基于此,目前我国外贸企业的资本结构具有比例失衡的倾向,也就是总资产大,净资产小;负债资本大,权益资本小;短期债务大,长期债务小。它是计划经济下纯流通企业的“遗产”,因此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外贸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需要。随着改革在外贸领域的深入,资本在外贸企业经营活动中的角色在变化,一些企业领导认识到,外贸企业进出口商品的经营,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商品价值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使资本的价值增值,投入一定量的资本是为了更多的资本回报。

这样资本经营在外贸中有更广泛的运作视野,作为这种运作的直接后果,可以提高外贸企业的总体经济效益并优化资本结构。

3、外贸企业必须遵循资本经营的发展规律。所谓资本经营是以利润最大化和资本扩张为经营目的,利用裂变、重组等多种形式,对企业所拥有的一切有形与无形资产进行有效运营,它以价值管理为手段,各种具体的资产如商品、货币、产权、房地产等都是资本经营的媒介物,是经营者实现资产收益最大化的运作对象。它超越一般的生产、销售和管理活动,对企业总资产的构成和运作方式作出精心的筹划和灵活的运用。

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看,企业经营管理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即生产经营、商品经营和资本经营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而且技术革新的周期缩短,这些都加速了商品更新换代步伐。因此,企业的经营风险加剧,这要求企业必须超越具体的商品经营,转而经营进行商品经营的商品,即各种生产要素,也就是经营货币、房地产、技术、商誉等有形及无形资产,通过对企业总资产结构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运营,回避经营风险,寻求最佳投资机会,以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本增值,外贸企业应主动进入资本经营阶段,激发企业的内在经营活力,推动企业快速成长。

二、国有外贸企业资本经营的优点

如上所述,资本经营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高级形式,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经营环境相异,资本经营较之商品经营,能体现出更多的优点。

第一,资本经营拓宽了企业的运营空间,使外贸企业经营者从相对狭隘的微观经济层面提升到广阔的宏观经济层面,获得了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优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视野。在当今技术高度发达、社会文明日益进步的信息时代,各种非物质因

素如人力、技术等对推动社会前进的至关重要性得到共识。从资本经营的角度看,高素质的企业员工、丰富的技术和信息资源、深入人心的品牌和良好的企业形象都是加速资金周转,力争以最少的资本投入,获取最大的资本增值的源泉。资本经营强调企业内外资源的优势互补,使无形资产商品化、价值化,尽量发挥无形资产对企业资本增值的最大效应。

第二,资本经营可以改善当前外贸企业不合理的资本结构。资本经营是一种开放式经营管理模式,讲求对企业内外部资源的合理使用,这样就拓展了企业资金、资源的渠道,而以资本价值最大化和最佳经济效益为目标,资本经营者可以对企业的资产进行合理组合和动态调整。在总资产与净资产、负债资本与权益资本、长期负债与短期负债、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构成要素中进行目标结构的选择与合理比例的确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资本结构,在总资产扩大净资产的比例,在资本结构中扩大权益资本的比例,在债务结构中扩大长期债务的比例,同时适当扩大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比例。

第三,资本经营将促进“大经贸战略”的实现,提高国有外贸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对抗能力。纵观世界,当今经济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一家大型企业不是通过合并、兼并方式发展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跨国公司能够纯粹靠内部的扩张形成,这可以从目前席卷整个欧美国家的并购潮中得到有力佐证。这种并购潮表明,以收购与兼并作为特征之一的资本经营策略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而国有外贸企业通过授权经营、兼并、收购、控股等产权运作手段,实现国有资产战略重组,迅速扩张核心企业的资产总量,通过对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人力资本、技术、信息、商誉等无形资产的大力开发,企业资本增值的能力得到加强,这样资本经营各种手段的运作将使我国迅速涌现出一批具有强大经营实力,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提高我国参与国际水平分工

的能力。

第四,资本经营还能充分利用资本增值和最大利润率规律。资本只有进入运动状态,保持在G(支付货币资本,购买生产要素)——W(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G'(销售附加增值量的商品资本)的环节中不断循环、周转,才能继续维持自身的价值。如果运动停止了,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可能减少,甚至丧失。另一方面,资本来到世间,它的本能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这种本能形成了资本运动的内在冲动力,驱使着资本经营者把资本投到土地、劳动力、资源相对便宜的地区,在不同领域内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通过在更广的范围内布置自己的生产、销售,以期得到最佳的资本回报。资本经营利用资本增值规律强调主动盘活沉淀的存量资产,对不产生效益的资产进行清理,对闲置的资产进行处理,使死钱变活钱,根据企业不同情况,采取卖、并、转等方式套出现金,作为另行投入的资本,让资金重新流动起来创造利润。

三、国有外贸企业实行资本经营的基本设想

在当前外贸企业深化改革中,要从商品经营转变为资本经营,还受到一些外部条件的制约,政企分开,国有资产运营主体的确立,金融、技术、人才等要素市场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企业负担过重的解决等一系列改革深层次的问题要有所突破。从外贸企业内部看,也需要创造条件,来推进资本经营的发展。

首先,破除旧的经营观念,开阔经营视野。一是破除以完成进出口任务为中心的旧观念,确立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确保国有资产增值的新观念,外贸企业资本经营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必须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正确处理好规模和效益的关系;二是要破除“等、靠、要”消极被动的旧观念,确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既有压力、又有活力的新观念,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将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外贸企业必须摆脱对政府行政机构的依赖;三是要破除重经营、轻管理的旧观念,确立向管理要效益的新观念。

另一方面,外贸企业要实现由实物管理向价值管理的转变,把商品变为价值载体和增值手段,充分利用好外部资源,实现内外资源优势互补,通过内部资源的优化组合,促进资本扩张。同时要改变传统的单一货币资本观,大力开发各种无形资产,提高综合经营能力,树立复合资本观念,这样将为外贸企业资本经营打下基础。

其次,清理存量资产,优化资金投向,扩张企业资本总规模。外贸企业开展资本经营,先应摸清“家底”。对企业现有资本进行清理分类,目的在于分析企业资产分布是否合理,每块资产的经营潜力及增值水平是否得到最大发挥,以通过结构的优化来达到资本经营整体收益的最大化。通过清理可以进一步明确企业哪些资产还可以继续提高增值水平,哪些资产已无增值效应需尽快处理,哪些资产还需加大投入或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等。外贸企业结合自身实际,不断对企业投资结构主动作出调整,各投资主导行业间要分散风险和加强协调,在投资行业方面,既要有几个处于赢利增发高峰的支柱行业,也要有几个增长潜力强劲的朝阳行业进行开发,合理的投资资产组合有利于外贸企业的优质增长。

第三,外贸企业资本经营关键是产权重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中,资本市场及其他要素市场在我国正在形成,同时根据国家政策导向,现在又是开展企业兼并的最好时机,国家制定了“抓大放小”战略,对国有企业兼并大力支持,所以外贸企业面临高起点进行资本经营的历史机遇。通过企业收购与兼并以及参股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收购上市公司法人股等产权重组形式,加速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以小带大,以少控多,它能使外贸企业迅速发展为中国市场经济的第一代大型集团企

业。

同时,从外贸企业本身的特点,收购与兼并是一种最可行的投资策略。收购与兼并这种资本经营的方式可以使外贸企业在投资实业中扬长避短,扬熟悉资本市场之长,避不熟悉工业生产和管理之短,抛开建设新项目的全过程。变养鸡下蛋为买鸡下蛋,避免走“小而全,大而全”的旧路,还能节省投资机会成本。外贸企业集中做好资本经营,一方面扩大企业资产总量,另一方面跨入发展的新行业。

第四,外贸企业资本经营应加强财务管理。建立以财务管理为中心、资金管理为核心的企业管理体系,是资本经营的基础,通过健全企业财会组织和制度,加强财务指标的对比和分析,可以揭示企业总体的管理水平与发展潜力。目前反映外贸企业的财务指标主要有三类,即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的指标,反映企业资产负债和偿债能力的指标以及反映企业对社会贡献的指标,其中检验资本经营的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主要应该有两项:一项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外贸企业资本经营的最终成果应该落脚到国有资产的增值上,这项指标的计算是用期末所有者权益总额除以期初所有者权益总额的百分比,如果达到了 100% 就是实现了

保值,大于 100% 就是增值,达不到 100% 就是减值。另一项指标是资产负债率,就是外贸企业的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例。资产负债率高,说明企业资金来源中债务的比例大,企业的经营风险和债权人的债务风险就大,投资者投入企业的资本及其增值部分就小,因此外贸企业资本经营的成果应该表现在所有者权益的扩大,从而降低资产负债率。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是资产负债率越低越好,应该敢于用别人的钱去赚钱,关键是外贸企业须有较强的获利能力,在此情况下,即使资产负债率高一些,也不至于陷入经营危机和债务危机。这样通过分析财务量化指标,能对企业资本经营现状有较透彻的了解,有利于外贸企业对如何盘活现有资产存量,扩大资产增量,作出正确及时的决策。

总之,外贸企业实行资产经营是时代赋予的任务,如何针对外贸企业自身的特点,及早转变传统的经营方式,营造有利的内部环境,制定正确的资本经营战略与策略,是 90 年代后期深化国有外贸企业改革的方向之一。

作者许经勇,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 (361005);徐清军、袁向阳,中国(福建)对外贸易中心集团华宝部

责任编辑:谭湛明

战略选择权理论

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时机选择

□ 顾乃康

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机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试图运用战略选择权理论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时机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战略选择权理论与跨国经营的时机

在标准的投资决策理论中,公司何时进行跨国经营可以通过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析基础上的净现值法(NPV法)和计算加以确定。由于经营存在不确定性,存在投资风险。为此,公司通常通过调整海外投资项目的贴现率或调整海外投资项目的

预期现金流量来反映其面临的海外风险,并相应地形成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评估的经调整的净现值法(APV法)。一旦某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经调整的NPV值大于零或在诸多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为最大,那么公司就可作出接受这一项目的决策。总之,在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评估理论中,外部的不确定性被视作内生变量,公司可以通过某些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来分散其面临的风险。与这种标准的评估理论不同的一种评估理论建立在战略选择权理论(strategic option theory)基础上。梅约斯等人(Myers, 1977; Brennan & Schwartz, 1985)提出的选择权理论认为,现在进行的投资相当于公司购买了某种权力的选择权,因此对现在的投资进行评估时必须考虑这种选择权的价值。换句话说,原先具有负的NPV值的项目在考虑了所购买的选择权的价值之后,就可能具有正的NPV值。该理论还认为,现在的投资可以从未来可能的投资选择中体现出其价值,也即现在的投资相当于未来投资的一个“平台”(platform)。进入90年代后,经鲍尔曼和柯伽特等人(Bowman & Hurry, 1993; Kogut & Kulatilaka, 1994)的努力,选择权理论被运用于公司的战略制定,形成了战略选择权理论。

战略选择权理论认为,在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公司决定现在不进行投资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一旦决定现在就进行投资意味着放弃了不投资的选择权;而在某些情形中这种不投资的选择权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例如,许多外部信息,包括产品的价格的变动等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得以披露。如果为了能够随时间的推移而获得更多的信息,那么公司决定推迟投资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即使项目在现在按标准的评估方法计算可得到正的NPV值,但在现在决定推迟投资也许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公司由此可能因“等待和观望”而获得额外的好处。

下面我们用Pindyck的简单双期模型来分析。假定一家公司进行某项对外直接

投资以生产某一产品。在现行价格下,假定公司决定在现在就进行投资,经计算得到的经调整后的净现值为 NPV_1 (>0)。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现预期该产品的价格将在下年下跌或上升,且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将维持下跌或上升后的水平。假设公司决定不在当年投资而推迟至下年,则经计算知:当下年产品价格下跌时,该项目的经调整的净现值为 NPV_2 (<0);当下年产品价格上升时,该项目经调整的净现值为 NPV'_2 (>0 , 且 $NPV'_2 > NPV_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司决定等待一年,且产品价格又正好下跌,那么公司会因 $NPV_2 < 0$ 而在下年作出不投资的决策,此时,“等待和观望”使得公司避免了损失;如果公司决定等待一年,且产品价格又正好上升,则公司会因 $NPV'_2 > 0$ 而在下年作出投资决策,且这种“等待和观望”因 $NPV'_2 > NPV_1$ 而使公司获得更多的现金流量。总之,通过持有投资选择权一年,该公司不但降低了发生负现金流量的可能性,而且获得了取得更多收益的机会。若该公司采取等待策略的话,则等待的价值 V 为 $NPV'_2 - NPV_1$ 。

在战略选择权理论下,影响公司到底是决定推迟投资而保留选择权,或者决定现在就进行投资的因素除不确定性或风险的特征外,还有投资的可逆转性和投资的可推迟性两个因素。投资的可逆转性 (reversibility) 是指当环境发生变动时,公司可以在短期内并不遭受损失的情况下变现的可能性。公司的投资通常具有不可逆转性,因为投资所形成的资产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专用性,而专用性资产的二级市场的流动性较差。正是投资的不可逆转性决定了公司推迟投资保留选择权的价值,并且投资的不可逆转程度越大,则公司所保留的选择权的价值越大。投资的可推迟性 (delayability) 是指投资项目在不长的时间内可以被推迟的可能性。对于公司来说,有些投资是可以推迟的,而有些投资是不能推迟的。这取决于投资项目本身的性质,例如,重置性投资一般是不可推迟的,而某些跨国生产的投资可能是可以推迟

的。只要某一项投资存在着可推迟性,则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公司就有可能通过推迟现在的投资持有选择权而获得更多的收益。总之,如果投资是不可推迟的,且完全可逆转,则公司可以在现在就决定投资。如果投资是可推迟的,且是不可逆转的,则公司只有当现在就进行投资所能获得的 NPV 值大于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而推迟投资所带来的 NPV 值时,才可决定在现在就投资,否则应决定推迟投资。

二、公司跨国经营的时机确定:战略选择权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结合

赖伏莉和塞勒利 (P. Rivoli & E. Salorio, 1996) 将战略选择权理论与邓宁 (Dunning, 1988a, 1988b) 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结合起来,在将不确定性作为外生变量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了公司开展跨国经营的时机确定问题。由上可知,在战略选择权理论下,面临着风险的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机与投资项目的可逆转性和可推迟性有关。而投资项目的可逆转性与公司的内部化优势相联系,投资项目的可推迟性则与公司的所有权优势相联系。

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是完全可逆转的,那么公司就没有理由推迟 NPV 值为正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完全可逆转的条件是: (1) 投入的有形资产必须能在短期内得以完全的补偿。实现的前提是有关有形资产的交易市场具有很高的效率性和流动性,有关有形资产也具有很多其他用途。 (2) 与有形资产一起投入的无形资产必须也能在短期内得以完全的补偿,且还要防止这些无形资产的扩散。然而,对外直接投资所投入的有形资产多具专用性的特点导致对这些资产的投资具有较强的不可逆转性。更为重要的是,无形资产在短期内得以完全补偿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无形资产在交易巾存在着较高的交易成本。如果一个跨国公司具有较强的内部化优势,那么这意味着该公司具有大量的难以描述和转移的关键知识;一旦这些知识随有形资产的投入而投入,那么若要在短期内变卖收回,则必须连同有形资

产一起出售,此时,便遇到一个无形资产的评估问题。不难看出,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优势越强,则投资后变卖收现就越困难,对外直接投资的可逆转性就越差。因此,较强的内部化优势将提高在不确定环境下推迟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所带来的选择权的价值,即较强的内部化优势提高了以等待来替代现在就投资的可能性。

跨国公司拥有所有权优势意味着跨国公司拥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被竞争者模仿的资产;这些资产具有垄断性,并能为公司带来准租金。正是因为所有权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具有垄断性,所以当跨国公司凭借这种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可以不至于因决定推迟投资而被竞争者抢先进入并夺去准租金;跨国公司完全有时间通过等待并获得更多的信息后,再作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可见,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越强,则其在不确定的环境下通过推迟投资而获得的选择权的价值就越高,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可推迟性也就越强。此外,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推迟性与公司所处产业的市场结构以及公司在其中所处的市场地位有关。在垄断的市场结构下,公司的市场地位越强,且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的垄断性越强,则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推迟性就越强。当然,竞争者抢先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先动优势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可推迟性也有很大的影响。当其它公司的先动优势很大,而本公司的所有权优势的垄断性不强时,本公司应尽可能早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当其他公司的先动优势不大,而本公司的所有权优势的垄断性很强时,本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高的可推迟性;当其他公司的先动优势很大,而本公司的所有权优势的垄断性又很强时,本公司可以开展试探性投资;当其他公司的先动优势很弱,而本公司的所有权优势的垄断性也不强时,本公司宜等待竞争者先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并追随其后而动。

三、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时机选择问

题

运用战略选择权理论来分析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的时机确定问题,可以从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动机出发,结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特征加以研究。

笔者认为,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层面理由是为了弥补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缺口,包括投资资金缺口、外汇缺口、知识缺口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缺口。从弥补资源缺口的动机出发,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分成输出型(包括产品出口型和适用技术和技能输出型)和导入型(主要包括技术—知识导入型和自然资源导入型等)两大类。

就产品出口型投资而言,其动机是为了通过在海外建立销售分支机构促进在国内生产的产品的出口,主要投资对象是办公场地和分销所需的专用性资产。由于相对其他资产,例如机器、设备和工具来说,作为投资对象的办公场地具有更多的用途,所以这种投资的可逆转性很强。为了促进产品的海外销售,中国企业必须对包括售后服务设施和特殊技能在内的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但专用性资产的可逆转程度较差。尽管如此,但由于产品出口型对外直接投资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权价值很高的试探性投资,所以通过及时对海外分销机构的投资,可以提高中国企业在下一步开展国际生产活动的选择机会,也可以为其今后的跨国经营决策积累信息。一般地,可以将产品出口型投资视为中国企业进一步开展跨国经营活动的一个“平台”。如果某一企业及其产品拥有在成本和差别化方面的所有权优势,并且产品的销售竞争又很激烈,那么应不失时机开展出口型投资,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分销机构。

对适用技术和技能输出型对外直接投资来说,由于适用技术和技能难以通过建立专利系统予以保护,且一旦公开便无价值可言,加上其本身与熟练劳动力具有不可分性的特征,所以中国企业对适用技术和技能具有内部化要求。这导致适用技术

和技能输出型投资的可逆转性相对小些,由作出推迟投资决策而取得选择权的价值将高些。然而,适用技术和技能的独占性相对较弱,这又使得适用技术和技能型投资的可推迟性较弱。当拥有某种适用技术和技能的中国企业面临着其他同类企业的海外投资竞争时,或面临着同类企业可能因先行对外直接投资而获得新优势的挑战时,这类投资的不可推迟性便占据主导地位,此时,中国企业就不应等待而尽快应作出投资决定。总之,只要东道国对中国企业的产品具有潜在的需求或其环境适应于适用技术和技能的使用,则中国企业宜尽可能早地作出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就导入型投资而言,具有代表性的是技术—知识导入型和自然资源导入型对外直接投资。前者表现为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并在当地销售产品,但其真正的目的是企图通过深入当地的知识系统获得所需的技术积累。一种有效的投资方式是中国企业与当地公司建立高技术型合营企业。然而,这种合营企业的成功要求合营双方能够提供对等且互补的技术和相应的知识。如果本身就缺乏足够技术的中国企业无法提供对等的技术,则这种合营企业或者建立不起来,或者即使建立起来了另一方也不会投入中国企业所急需获得的技术。此时,若中国企业因不能获得所需技术而欲撤出投资时,其投入的资金就很难得到完全补偿,因为所投资资产具有不同程度的专用性。此外,纵使双方提供了对等的技术,建立起了高技术合营企业,但合营企业中所使用的带有垄断性的互补无形资产仍由各自的母公司拥有;母公司也仍对这些无形资产具有强烈的内部化要求。一旦发生风险,当其中受损较严重的一方要求撤除投资时,另一方就可能因会失去必要的互补的无形资产而不愿意支付足够的价格买下前者所占的投资份额。可见,技术—知识导入型投资的可逆转性极差。当中国企业不具备一定的对等互补资产时,或者当东道国对本国技术保护的政

策变化以及合营对方的合作态度不明朗时,中国企业作出暂时不投资的决策而保留未来的投资选择权也许更好。

目前已有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前向一体化或多样化经营的方式开展了自然资源导入型投资。这类投资的投资量大(沉淀成本也大),投资周期长,并且所投入的有形资产具有较高的专用性,因此,一旦进行了投资,当其后发生风险而企业企图撤出投资时,其获得完全补偿的可能性较小。一般地,自然资源投资的风险比一般投资的风险大。这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的价格易变性和当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外国人参与本国资源开发的态度上的不稳定性上。自然资源导入型投资所面临的风险的特征及其投资本身的较强的不可逆转性决定了“等待和观望”策略在其投资时机决策中的重要性。当然,就某项投资而言,能否推迟投资取决于项目本身的可推迟程度。

主要参考文献:

- 1、Rivoli, P & Salorio, 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 (35 - 357), 1996。
- 2、Brennan, M & Schwartz, E, Evaluating natural resource invest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58 (2): 135 - 57, 1985。
- 3、Bowman, E & Hurry, D, Strategy through the option lens: An integrated view of resource investments and the incremental choice proces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8 (4): 760 - 82, 1993。
- 4、Kogut & Kulatilaka, N, Options thinking and platform investment: Investing in opportunity,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6 (2): 52 - 71, 1994。
- 5、Pindyck, R, Irreversibility, uncertainty, and invest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9 (3): 1110 - 48, 1991。

作者顾乃康, 广州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510275)

责任编辑: 郑英隆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应该说是相当重视的。我们不仅建立了一支庞大的科研队伍,而且也研究出了大批的科技成果。然而,迄今为止,我国科技成果的应用率却只有10%左右,我国的专利利用率也只有25%。一方面有大量的科技成果积压,大量的发明专利得不到利用;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的企业工艺落后、设备陈旧、产品更新缓慢。是什么原因阻碍了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呢?对此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不一而足。笔者认为,导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缓慢的根本原因是,我国还没有充分形成企业家技术创新的条件。

企业家技术创新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适度的市场竞争和必要的制度安排。

一、技术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实现“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能,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家,必须富于企业家精神,这是企业家技术创新不可缺少的内在条件。

“企业家”是一个职业概念,它指的是这样的一种人:他具有经营管理企业的才能,并且这种才能集中地表现在他的“创新”活动上。通过“创新”,他建立了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生产体系中引入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新组合”,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便是这种人所

具有的特有的精神。“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企业家就是用这种‘超经济’的东西对经济活动发生深刻影响,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经济进程。”^①

企业家精神“这种‘超经济’的东西”究竟对技术创新有着怎样的作用机理而成为企业家技术创新不可缺少的内在条件呢?事实上,我们说“企业家技术创新”,并不是

说企业家必须直接参与基于产品、工艺、设备等的技术创新活动,而是说企业家是技术创新的倡导者、激励者、协调者和组织管理者。他所要做的就是将企业家精神——他的价值观念、思维态势等,体现在生产组织、管理创新以及日常的经营管理行为和自身的素质之中,借助它们来创造一种适宜于技术创新的组织氛围和文化氛围,以保证技术创新活动的成功进行,并最终求得企业的发展。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的这一作用机理,学术界有的同志用如下图形表示。^②

对于企业家精神,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理解,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也是不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笔者认为,构成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的是这样三大精神,即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竞争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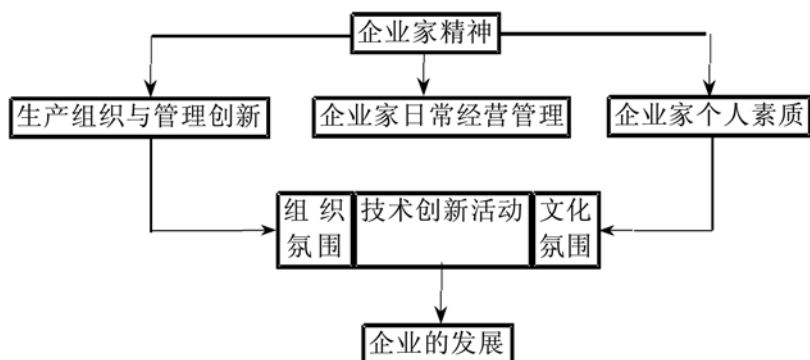
它们不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对于企业家技术创新而言,它们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企业家要进行成功的技术创新,就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来说,企业家还必须富于科学精神和对公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是信息时代,是企业行为与社会和公众息息相关的时代。

论企业家技术创新的条件

□田贵庚 汪小亚

二、技术创新与企业家才能

技术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相关图



对于企业家的技术创新而言,企业家才能也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企业家精神而不具备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是不可能进行成功的技术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共同构成企业家技术创新的主观内在条件。

那么,企业家的组织才能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开发资源的才能。企业家除了自身以外,并不拥有资源,而现实中却往往有拥有资源的人还在“抱着金子挨饿”。矿藏埋在地下永远只是矿藏,只有被挖掘出来加以利用才能成为财富。企业家应是“挖掘者”,他能将别人拥有的资源变成自己口袋里的“金子”。②创造资本的才能。要在生产体系中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最为重要的无疑是要有资本。因而要进行成功的技术创新,企业家必须具备创造资本的才能。企业家“创造资本”,途径有两条:一是筹集资本,二是形成资本。筹集资本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大众筹资方式,而必须在现存的制度安排下寻找适合自己的独特的筹资方式。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充裕的资金来源。而资本形成则有赖于资本积累,即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对于技术创新而言,不注重积累是不明智的。③开发人才的才能。人才是企业家技术创新成功的关键。开发人才,不仅要求企业家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按自己满意的价格购到高素质的劳动力,而且要求企业家要注意“网罗”、“猎取”和留住人才。并且尤其要注意从企业现有的劳动力队伍中“开发”人

才。如 IBM 公司专门拨了一笔款项鼓励职员干“私”活,在外人看来这似乎不可思议,但 IBM 却有自己的道理。因为通过职员干“私”活,既能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又能满足其成就感的实现。不仅为公司“开发”了人才,而且培养了职工对公司的认同感。④利用技术的才能。企业家不是发明家,也不是科学家,但企业家却擅长于利用技术。他能对新的技术、新的发明专利独具慧眼,看到它的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应用前景。企业家唯有具备这样的才能,才能进行成功的技术创新。

三、技术创新与适度竞争

适度的市场竞争,是企业家技术创新的环境和土壤,是技术创新不可缺少的外在条件之一。

技术创新需要适度的市场竞争,从根本上说,是技术创新本身决定的。因为技术创新具有扩散效应,而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其目的是为了得到由创新所带来的超额“垄断”利润。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对技术创新的动力强弱有着明显的影响。扩散效应弱小,则企业家能够维持超额“垄断”利润,他也将始终保持较强的创新冲动。而如果扩散效应过大,那么,“原始创新”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就会被侵蚀,这样的话,企业家就会缺乏创新冲动,他宁愿去模仿,而不愿去创新。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不愿意“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以及假冒伪劣产品的屡禁不绝,正是技术创新扩散效应过大的结果和表现。

可见,要使企业家有创新冲动,能进行成功的技术创新,就应该让他有利可图,避免他的“原始创新”的超额“垄断”利润被完全侵蚀。为此,企图靠阻止“模仿”和“适应”以取消扩散效应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唯一可行的是,寻求某种途径来抑制扩散效应以避免它“过大”。

为了寻求这种途径,我们可以再换个

角度来研究企业家技术创新。企业家的技术创新,按其市场前景,可分为垄断前景推动和竞争前景推动两类。垄断前景推动的技术创新,是指企业为获得超额利润而进行的创新,一般指开创性的原始创新;竞争前景推动的技术创新,则是指企业为避免自己已经享有垄断地位的产品或工艺被竞争对手模仿、更新后丧失超额利润而进行的创新,通常包括对原始创新的自行扩散和“二次创新”。这两种动机推动下的两类创新是同时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技术创新才能够波浪式前进。如果只有前一种创新而没有后一种创新,那么,技术创新就会停滞在某一水平上而不会有所改进和发展。而如果只有后一种创新却没有前一种创新,那么,技术创新就会因为人人都想作“模仿者”而很难出现。

此外,按照卡曼和施瓦茨的观点,还有三个主要变量是决定企业家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它们分别是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力量。其中,竞争程度的强弱所产生的竞争压力,构成了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这是由技术创新所带来的超额利润预期所致;企业规模则影响技术创新所开辟的市场份额的大小。一般来说,一个企业规模越大,它的技术创新所开辟的市场前景也就越大;而垄断力量则影响着技术创新的持久性。一般来说,企业对市场的垄断程度越高,市场就越不容易被“模仿者”在短期内占领,从而,企业进行的技术创新所带来的超额利润也就保持得越久。

那么,三者中谁最有利于企业家技术创新呢?是竞争程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适应竞争”。垄断虽然有利于创新收益的持久获得,但是,在缺少竞争的对手的情况下,进行重大技术创新的动因就会减弱;而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一方面由于企业规模小,另一方面由于缺少保障获取持久创新利润的机制,尽管小的技术方面的进步在竞争中不断出现,但基础性的重大技术创新却难以产生。而“适度竞争”的市场结构的存在,就可以弥合这两个极端的缺陷。它既能抑制技术创新扩散效应的“过大”出

现,又能保证技术创新的快速产生,同时,还有利于进行具有广泛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基础创新的试验。

因此,建立“适度竞争”的市场结构,正是我们要寻求的抑制技术创新扩散效应“过大”的途径。唯有建立“适度竞争”的市场结构,才有可能提高我国科技成果、发明专利的应用率;才有可能推动我国企业的工艺设备的技术改造以及产品的更新换代;企业家的技术创新才有适宜的环境和土壤。

四、技术创新与制度安排

合适的制度安排,同样也是企业家技术创新不可缺少的外在条件。人们经常用足球赛需要有比赛规则来形容市场竞争需要有竞争规则,事实上,“适度的市场竞争”的展开同样也是需要合适的竞争规则的。没有合适的竞争规则,“适度竞争”的市场结构是建立不起来的,企业家技术创新也很难顺利进行。

竞争规则,按照制度经济理论的解释,也就是制度。所谓制度,简言之,就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它包括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两类。所谓正式的制度是指社会制订的法律、法规、条例、章程等;所谓非正式的制度,则是指社会的惯例、习俗、常规、行为准则和礼教等。正式的制度是在非正式的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它的成功实施必须依赖有效的监督和严厉的惩罚。而非正式的制度则是极为重要的,其中的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蕴含着价值标准、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性,而所有这些又构成正式制度制订的指导思想。它们的变化,往往导致正式制度的调整变化。

我国改革开放迄今为止所走过的历程,实际上也就是制度变迁的历程。原有制度框架被打破,而新的制度框架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无论是非正式制度,还是正式的制度,都还处在“安排”之中。因而,企业家的技术创新便处于一种缺乏制度保障的状态。就非正式制度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意识形态的确立为

时尚短,与这一意识形态相应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道德行为准则等都还在形成过程中。因此,非正式制度对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的抑制,对“模仿者”侵蚀创新者超额利润的行为的约束是乏力的,从而也很难保证“适度竞争”的展开;就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言,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虽然我国制订了不少相关的法令,但还不完备。因而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各级政府的政策往往界乎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难以产生稳定的预期,难以付出“生产性努力”的行为,从而使他们对技术创新持不积极的态度。更为严重的是某些“制度真空”的存在,使实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家的权益和收益得不到丝毫保障,当然他更不会去进行技术创新了。于是,设备陈旧、产品老化、工艺落后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另一方面,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成功实施还取决于有效的监督和严厉的惩罚。缺乏有效的监督,或者惩罚极为轻微、不痛不痒,制度安排便难于成功实施。改革以来,我国对立法工作应该说是相当重视的。然而,重“法制”轻“法治”的现象却大量存在。今天,假冒伪劣产品之所以屡禁不绝,正是因为一些人出于部门和地方一己私利的考虑,包庇、袒护违法者,监督不力、处罚轻微的结果。有法不依、轻视法治、监督不力、处罚轻微,事实上是在鼓励人们选择“分配性努力”行为。鼓励人们将别人的财富转化为自己的财富,说到底,也就是“鼓励”人们制造假冒伪劣。因为实行技术创新的这种“生产性努力”行为远不如制造假冒伪劣这种“分配性努力”行为合算,其成本高昂,而其收入却更低。此种情形,当然是谈不上“适度竞争”的,企业家的技术创新冲动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了。

可见,企业家要有创新冲动,进行成功的技术创新,合适的制度安排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这种“合适的制度安排”,应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制度安排;应该是能界定和保证企业家的正当权益的制度安排;应该是鼓励企业家技术创新,有利于生产性努力,同时重罚“模仿者”,抑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安排。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企业家技术创新的条件远不止上述所论及的四个方面,它还涉及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科技体制的改革以及技术市场的良性循环等诸多方面。就国有企业改革而言,解决政企不分的顽症,明晰产权关系,使之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无疑是企业家技术创新重要的前提条件;就科技体制改革来说,使科学技术更多更好地与经济建设结合,建立起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机制,无疑也是有利于企业家的技术创新的;而解决科技成果的供给通道、交易通道及需求通道等方面的问题,促进技术市场的良性循环,对于企业家在生产体系中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总之,充分形成企业家技术创新的条件,促进企业家的技术创新,于我国是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的。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只有企业家们不懈的技术创新,科技兴国才能有望,我国的现代化才能有望。

①徐海波《独占鳌头的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②邢以群《技术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载《科学管理研究》,1993年第12期。

作者田贵庚、汪小亚,北京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100015)

责任编辑:谭湛明

论青年的道德建设

□潘逸阳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担负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个民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文明进步。而青年的思想道德状况,又直接影响到我国下一个世纪的精神面貌。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如何适应时代的特点,有效地加强对青年的教育引导,加强道德建设,确立与社会进步要求相适应的新的青年道德培养体系和工作规范,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在社会转型时期加强青年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新时期培养的青年,不仅要成为坚定的爱国者,而且还要成为道德高尚和艰苦创业的一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全面发展,青年的道德面貌日益进步。比如,在青年中形成的自主、自尊、自强、平等、竞争、创新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然而,应该看到,目前我国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社会转型期里,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青年道德培养教育体系,有不少方面已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如果仍然把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道德规范简单地搬到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是难以奏效的。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理论、规范体系又尚未建立起来。于是在青少年中出现的某些“道德滑坡”问题日益突出,违法失足青少年增多,社会公德观

念淡薄,职业道德行为失控,思想道德教育失效等,成为我国社会生活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加强青年的思想道德建设,逐步构建新时期思想道德体系,引导青少年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明确社会责任感,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培养一代跨世纪高素质公民,保持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

二、建立新时期青年思想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

构建新时期青年思想道德体系,要体现出时代要求,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起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思想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以引导青少年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既由经济基础决定,又有自身演变发展的特殊规律。青年的道德培养,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的道德进步并非经济发展的自发结果,必须通过人们在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自觉行动才能实现。构建新时期青年思想道德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的努力。我认为应从以下的原则来进行探索:

——要建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青少年思想特色和水平的道德规范。

构建新时期青年思想道德体系,首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

标奠定基础。因此要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和与之相应的道德准则、规范,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等等,据此约束共青团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教育、引导广大青年群众。同时,又要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现实状况出发,倡导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思想特点和水平的、能为广大青年所接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道德规范,据此教育和规范一般青年的言行。比如,一方面,我们要提倡讲奉献乃至大公无私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要承认人们通过劳动等正当途径和合法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以不损人或合理利己为标准去评价人们的行为。对青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切忌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和人们的觉悟水平,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或施予过高的道德标准教育,使思想道德教育流于空谈和道德规范脱离实际。目前在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正视这方面的问题不够,导致学校的教育与社会实际脱节,青年工作的思想道德教育与社会实际差距增大。其实,对青年提出的道德规范要求,不是调子越高越好,而是愈切合实际愈能收到实效。总之,构建新时期青年的思想道德体系,要从实际出发,体现出层次性,反映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

——要在新时期的青年道德建设中突出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上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讲,是社会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市场经济精神的生成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的形成过程。道德是人类的精神自律,要靠坚实的理想、信念和信仰来支撑。理想、信念和信仰是道德意识的核心。而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信仰又是

以一定的历史观为基础的。因此,构建新时期青年思想道德体系,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坚持倡导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精神,倡导乐于助人、讲求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信念的基础上,确认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合理利己,正当求利、勤奋致富、公平竞争的合理性,并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基本道德要求。要在青年当中正确地倡导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竞争等观念,用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引导青年正确地对待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的运作义理。并且还要根据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变化、发展的特点,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培养社会成就感和责任感;建立艰苦创业的致富观,培养发展民族工业与实业的精神;建立科技第一观,培养重视人力资本的意识;建立互惠互利观,培养正确的经济伦理精神;建立现代环境保护观,培养生态伦理精神;建立勤俭节约观,培养正确消费意识。以营造一整套适应市场经济机制运作所需要的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建立起新的社会经济伦理规范,引导青年思想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限制市场经济对青年的思想道德观念的负面影响。

——要弘扬民族传统美德,构建新时期青年道德体系。

新时期青年道德体系的建立,应当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道德中有价值的文化成果。当然,传统道德在总体上来讲已经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特别是封建社会所形成的思想、道德、文化,是建立在“畏天命”、“知天命”、“顺天命”的天命论历史理论基础上的,与当今倡导的社会主义道德信念格格不入。社会主义道德信念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青年的思想道德建设,仍然要高举反封建的旗帜。假如忽视了这一点,把封建主义的东西误认为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就会使社会主

义现代化事业走入歧途。当然,在道德建设上,也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不应割断历史,不能抹煞不同历史时代道德之间的继承关系。客观地讲,在传统思想文化和道德中,不乏我们至今仍应批判继承的有价值的精神文化成果以及需要弘扬的民族美德,如讲文明、讲礼貌、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勤劳节俭、团结互助、热爱祖国等等。对于我们民族传统中的这些美德,今天的青年仍应继承,并发扬光大。对于传统,我们要继承优秀的,摒弃封建、愚昧、落后的,应该根据新时代的要求,给民族传统美德赋予新的内涵,并以现代文明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加以改造、充实和发展,使之融入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丰富新时期青年思想道德体系的内容。

——要构建与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相一致的青年思想道德体系。

伴随着改革开放,外来文化对我国青年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教育引导青年正确对待外来文化,以及吸收有益的、抵制有害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则是一个如何构建与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相一致的青年思想道德体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青年思想道德体系,必须也能够继承人类社会在道德进步中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要注意吸收各国各民族社会道德中的文明成果。西方文化伦理中的公正观念、法制观念、主体意识、追求科学与文明、自由与民主的精神,是可以大胆地借鉴与吸收的。只有注意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优秀成果,才能使新时期青年思想道德体系跟上时代的潮流。

三、扎实推进道德建设,促进青年工作健康发展

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在新时期,增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系统性、时代性、科学性、实践性,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青年思想道德体系,扎实推进青年的思想道德建设,是促进青年工作的关键。

我们应当以立为本、虚功实做的方针,从基础工作做起,从实践活动抓起,突出道德建设主题,培养具有适应跨世纪发展需要的良好综合素质的青年。

——要注重青年道德理论、规范的建设工作,构建新时期青年社会主义道德理论和青年道德规范体系。

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积极探索、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青年思想道德体系,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要使之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步确立其在青年工作以及青年社会道德生活中的主导地位。青年理论工作者要在马列主义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深入生活实际,认真研究青年问题,总结青年工作的经验,从青年的特点出发,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中的丰富经验和成果,提高到理论层次,拿出一批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实践性的社会主义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标准的研究成果,用以指导青年工作的实践;提出一套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青年思想特点和水平的道德规范,以更好地促进青年工作。

——要加强青年的道德教育,提高青年一代道德水平。

青年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培养道德情操的可塑性大,是一个人成长阶段培养高尚品德、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时期。因此,加强道德教育,提高青年一代的道德水准,是新时期青年工作的重要环节。道德水准包括道德知识与道德素质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要在青年工作中从道德教育入手,通过各类健康有益的思想教育活动,着力提高青年一代的道德水准与综合素质。对广大青年,一方面要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知识的宣传、普及、教育,使之认知新时期的道德规范,形成道德共识;一方面要开展实践教育,通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志愿者行动和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在实践

中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要在全体青年中,切实提高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和个人品德的修养,以塑造高素质的跨世纪青年一代“四有”新人。

——要树立新时期道德风范,以教育引导青年。

榜样对于青年的作用是巨大的。在青年工作中,我们要大力宣传、培养、树立一批新时期的道德风范典型,如在职业道德方面的优秀代表“青年岗位能手”,在社会公德与个人品德方面的优秀代表“杰出青年志愿者”,在助人为乐、挺身护法方面的优秀代表“治安英雄”等等。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倡导新的道德风尚,同时揭露、批评、抨击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言论和行为,努力促进社会营造良好道德环境,促使广大青年乃至全体社会成员自觉遵守道德准则,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同时,还应注意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文化道德的引导。文化诱导对青年的作用是极大的,文化教育潜移默化、感召力大、穿透力强、作用面广。要注意将新时期的道德准则、规范及先进典型,形成健康有益的文化作品,用以教育、启迪、激励青年,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潮的影响,从而形成良好的品德,提高道德修养,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成长。

——要创造性开展青年道德建设活动,增加青年工作的活力。

在新时期,突出地抓好青年道德建设,必须创造性地开展这一方面的活动。寓道德教育于活动之中,寓道德培养于潜移默化之中。要注意依据新时期青年的思想特点、兴趣爱好,创新青年活动的内容与形式;要注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准则、规范溶入青年的活动之中,以培养熏陶高尚的道德情操,增强青年的自我约束能力;要注意在青年活动中宣传、普及新时期的道德知识与规范,以灌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知识;要按照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的青年,开展有针对性的道德培养教

育活动,务求最佳效应。要注意通过一系列的青年社会活动,虚功实做以倡导社会道德风尚,营造道德建设的优良环境。

——要加快青年工作的社会化进程,增强青年道德建设的合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运行方式都鲜明地体现出开放性和统一性的市场特征,呈现出条条块块彼此贯通、方方面面共享社会资源的新格局。青年道德教育,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单靠共青团组织唱“独角戏”是不行的,必须运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担负起教育培养青年的责任,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共青团组织应进一步明确认识、坚定信念,更加主动、自觉地走向社会,不断扩大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域和能量。要发挥自身优势,争取四面(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八方(教育、文化、宣传、新闻、出版、公安、司法、群众团体等)的配合和支持,形成各负其责、通力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重视社会性青年道德教育队伍的建设,对已建立的青少年教育研究机构,“关心下一代协会”等组织,要进一步提高、健全和发展,并积极发挥青年志愿者等协会、社团在青年思想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要积极争取党政和社会支持,加大财力、物力投入,扩大和完善青少年活动阵地、青年素质培育基地和大中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增强青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物质依托;要按照互惠互利的市场经济原则,吸引企业通过资助形式,参与合办活动,实现团的工作优势与企业的实力优势的有机结合,广泛地利用社会资源,扎实推进青年道德建设;要广开视野,寻找新载体,特别是更好地运用现代化传播媒介,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以更广泛地拓展青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网络的功能。

作者 潘逸阳,广州广东省团委
(510080)

责任编辑:冯 生

冯友兰对辩证法思想的反思

□张翼星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是十分显著的。首先,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他提供了一种学科的范型,就研究对象、基本范畴、主要派别、传统精神、发展脉络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全面而可靠的分析,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而且,他从不满足,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从《中国哲学史》到《中国哲学简史》,到《中国哲学史新编》,不断地有所丰富,有所前进,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重新清理和总结中国古典哲学遗产,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寻求结合点。其次,在中国哲学的理论创造方面,他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即“新理学”的体系。应当看到,我们的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历史遗产,但并不是以擅长于严密的理论思维而著称于世的,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能够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地创立完整哲学体系的理论家实在是太少了。冯先生的“新理学”体系,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它却不仅在理论结构上相当完整,而且贯通古今、融合中西,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特色,这在理论思维的继承创新上就显得十分可贵了。

在冯友兰先生的诸多著述中,直接谈论辩证法的内容和篇幅并不多。但是,他融合中西哲学史,却认真清理和把握了贯穿于辩证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的不关系问题。他的《新理学》实际上是抓住和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的。同时,紧密结合中国哲学传统,他从

亲身的生活经历和学术实践中深刻地思考了辩证法的若干理论内容。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的“总结”中,他要求“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由此论及如何理解客观辩证法的问题,着重谈到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

冯先生说:“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意义。”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看来主要是依据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一篇短文《谈谈辩证法问题》里的一段话:“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匀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①如何理解列宁的这一段话,是我国理论界长期进行过讨论而比较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但从全文的基本思想来看,列宁既讲到“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也讲到“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②至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观点,冯先生引证了张载关于辩证法思想的概括:“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冯先生认为,这里的前三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是同意的,而第四句就不同了。他说:“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仇必仇到底”,其实也就是过去习惯于说的“斗争哲学”。我觉得这里冯先生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分析,多少有些误解,

而这是过去占主导地位的流行观念造成的,责任不在冯先生本人。问题在于过去较长时期流行的观念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意。

在极“左”路线占支配地位的时期,辩证法的某些内容往往被扭曲、被片面地夸大加以绝对化。比如,在理论上只许讲“一分为二”,不许讲“合二而一”,否则就被视为“阶级调和论”或“折衷主义”;只承认一分为二,不承认一分为三、一分为多,因而在文化学术领域便只承认无产阶级一家与资产阶级一家,取消了“百家”存在的权利,使“双百方针”有名无实;在对立双方的关系上,只讲对立、斗争,不讲统一、结合,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鼓吹“斗争哲学”,要求一斗到底,似乎天下事都是“一方战胜另一方”、“一方吃掉另一方”。推行这种观点,只能使辩证法走向反面,并且一度造成国家、民族的重大灾难和文化、学术的严重荒漠。

其实,片面夸大斗争性的“斗争哲学”,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传统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是找不到充分根据的。马克思在论及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时,曾把它表述为“两极相逢”,并且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③恩格斯曾经把对立统一学说表述为“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④而且他还着重批评过片面地标榜“斗争”的观点,明确地指出:即使在自然界中,也“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而“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幼稚之见。”^⑤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既强调了对立统一学说是辩证法的核心,又全面地阐述了对立统一学说的基本内容。他明确地指出:“要认识在‘自己运动’中、自生的发展中和蓬勃生活中的世界一切过程,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⑥显然,在他看来,是对立面的既对立又统一,才推动事物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早在1909年,当俄国

的波格丹诺夫等人在一个教学大纲里提到“无产阶级斗争的哲学”口号时,列宁便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里,这一类宣传课程的教学大纲有几十个、几百个……,但是你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无产阶级斗争的哲学’。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唯物主义,但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无产阶级斗争的哲学’。”^⑦尤其需要我们重视的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国内战争结束、将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时刻,面对各种比较复杂的内部矛盾,列宁要求通过协商、调整,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因而特别提出,要善于“把对立面和谐地结合起来。”列宁把这当作重要的领导艺术来看待,他说:“可以把这些对立的观念不和谐地结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⑧可见,过去流行一时的“斗争哲学”的观点和口号,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不相容的。

那么,“斗争哲学”的观念主要来自哪里呢?可以说主要来自前苏联一定历史时期的理论界,主要来自斯大林的哲学思想。斯大林在理论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有片面性的。他在《联共(布)党史》中叙述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时,便只讲对立,不讲统一;在实践上他过分夸大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严重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至提出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观点,这正是“斗争哲学”的缘由。“斗争哲学”的口号在我国正式出现,是在1959年。这种口号是与哲学政治化、阶级斗争扩大化、推行极“左”路线密切相关的。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一口号更受到一伙阴谋家的利用,被他们肆意标榜和渲染,用作篡党夺权的工具。鼓吹“斗争哲学”,对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是众所周知的。

“仇必仇到底”或“斗争哲学”的观点,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传统不一致,也与一贯重和谐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哲学思想不相容。冯先生充分认识到后一个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我体会主要

有以下几点:1. “仇必和而解”与“仇必仇到底”的思想,在理论上是有重大差别的,重视这种差别,在实践上是有重大意义的。2. 新执政的阶级或政党,作为新的统治者,应当更加重视新的统一体,使之更加巩固和发展,而不是破坏这种统一体。如果说在民族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年代,在一定范围内比较强调斗争性有其客观根据的话,那么在取得和巩固政权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就应当更加重视对立面的统一与和谐,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应当实现相应的转移。3. 中国古典哲学和张载著述中所讲的“和”,是包含差别、矛盾和斗争的。“和”并不就是“同”。“同”不能容纳“异”,而“和”则必须有“异”。“和”不是像“同”那样只容许有一种声音、一种味道或一种色彩,而是有各种声音、不同味道、多样色彩的配合。4. “仇必和而解”是客观辩证法的主导趋势。不管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现代社会和国际社会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冯友兰先生的这些见解凝聚着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的阐发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也蕴含着他对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洞察,至今仍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当今时代的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已经十分明确而迫切。我们在国际国内都需要一种和谐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就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来说,科技革命在走向新的更大的综合,人类社会在走向新的更大的整合。马克思主义的长远的理想目标,是要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种目标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应当更多地着眼于矛盾的解决和达到各种对立面的和谐结合,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和谐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富于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因素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可能对人类历史作出更多的贡献。

①②⑥ 列宁:《哲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3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

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4、572页。

⑦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5卷,第494页

⑧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第10页

作者张翼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00871)

责任编辑:冯 生

以符号学析公孙龙子的《指物论》

“公孙龙子对于先秦名辩，颇多贡献”，
①“他终究建立了纯逻辑的正名实理论”，
②但长时间来，人们对《公孙龙子》的发掘不够深刻，尤其对《指物论》的演绎显得更为突出。《指物论》“是《公孙龙子》中最难读的一篇”。③究其原因是由于《指物论》包含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可说是《公孙龙子》中符号学专论的精神所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汉语言文字是表意文字，“还不是拼音文字”，④故其符号化历程艰难；二、符号学理论虽源远流长，但符号学独立

成为一门学科，并在国际上得到蓬勃发展却是本世纪20—30年代的事。我国对符号学的研究始于60—70年代，如今虽然有所发展，但以符号学进行跨学科的方法论研究和作为分析工具还处于初级阶段。符号学与社会人文科学各学科都有结合，史学也不例外。例如，法国“年鉴派”史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运用符号学的结果。符号学的出现，导致了20世纪的哲学特征转向语言，使人们对语言和意义问题的认识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化和扩展，使“20世纪成为名符其实的语言哲学时代”。
⑤公孙龙子《指物论》讨论的“指”“物”关系问题正是符号和对象的关系问题，而这是典型的符号意义问题。我们有必要以符号学来剖析其理论精髓，以期达到：吸收西方先进科学；弘扬本国传统精华。

一、“指物”思想之发端

“名实”关系是先秦名家辩者关注的焦点。“失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⑥“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⑦可见，“实”是客观存在的，“名”是对“实”的称谓。“名”非“实”，“实”非“名”，没有“名”，人们不能了解“实”，没有“实”，“名”就无所依托。而一味求“名”，则又会导致出现“名”脱离“实”而不知其所“名”的“名实乱”⑧的状态。

我们必须明确，公孙龙子所论的“指物”和“名实”的关系。“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其所物而不旷焉，实也”，⑨可见，“实”是对“物”的一种限制，“物”的外延比“实”大；“失名，实谓也”，⑩这是公孙龙对“名”的定义，“名”就是对“实”的称谓。“名”既然是称谓，就必须具备能发声这个特点，而“指”我们认为是符号，虽然公孙龙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符号不一定是能读的，虽然可读的是主要部分。可见，“名”亦是对“指”的一种限制，“名”的外延比“指”小。综上，我们认为“名实”和“指物”

是两对不同的范畴,但是关联甚密:“名实”是“指物”的基础和主体;“指物”是“名实”的概括和推广。“指物说”既源于“名实说”,又别于“名实说”,高于“名实说”,二说不能混同。据此,我们认为公孙龙子作《指物论》的一个动机是从字形和内容两方面区别于先秦其它诸子的“名实说”。

从公孙龙子的《名实论》《白马论》等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孙龙作《指物论》的最主要目的在于让人们清楚“名”和“实”的关系,即“名”和“实”是两回事,凡是可言说的,都是运用“名”的结果。无“名”则不能称谓事物,也无法感受诸如“金山”、“人鱼”此类虚概念所指称的并非真实的对象,更难以分辨事物。不能以“名”乱“实”,也不能以“实”乱“名”。正如伍非百先生所言,“天下之‘实’,其本体不径入于吾人认识之范围内。而吾人以渴欲知物之故,假认识之形式,造名以系念,因念以纪实。其所记者,乃意之实,而非物之实也。何则?意有离合而物无离合,意有分聚而物无分聚。可得而论定者,皆意中之实,非物之实。夫物实自物实耳,岂能以吾意而为离合分聚乎?凡论一‘实’之是非然否者,皆意中离合分聚之形式,其与物之‘实’也无与。公孙龙恐人泥于实而非名也,又恐人之以名为实而更非名也,故造《指物论》使人知名不是实’。”^①公孙龙子作《指物论》之宏旨由此可见一斑。

二、对“指”的界定

对“指”的把握,是理解《指物论》符号学理论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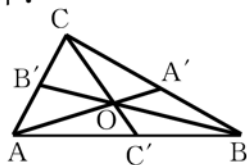
指至今无定诂。关于指的训释,历来众说纷纭。有人把指训为“物”、“物德”(表象),也有人训指为“名相”、“属性”,还有把指训为“概念”,训为“标记”、“标志”,训为“代名词”,训为“指定”,训为“旨”等等,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诚然,各种解释都内含一定合理因素,即运用各自对指的规定,都可对《指物论》进行合理程度不同的理解。但是,由于这些训释基本上是从纯

自然语言或纯哲学的角度立意,故难攫住《指物论》之要旨,而多少有失偏颇。下面择最有代表性的两种解释作一分析:

一、把“指”释为“属性”的“属性说”。这一说法确实包含合理的成分,因为它揭示了“指”作为对象属性集合的反映的功能,然而它却没有昭示“指”的另一项不可缺少的功能——指称对象的功能。因而,把“指”仅仅归结于“属性”,与“属性”划起等号来,是不合理的。

二、把“指”训为“标记”的“标记说”。这一说法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即它正好揭示了“指”指称客观对象的功能,然而却没有看到“指”的另一项作为对象属性集合的反映的功能。仅仅把“指”归结为“标记”,当然也是片面的,不合理的。

我们把“指”训为符号,它相当于弗雷格所讲的专名。所谓“指”,就是代表事物属性并指称对象的符号。“属性”和“指称”是“指”的两个方面,两个基本要素,凡“指”都同时具有“属性”和“指称”。那么,什么是“指”的“属性”呢?我们可以通过下图来解释:



在 $\triangle ABC$ 中,
点O是中线 AA'
和 BB' 的交点,也
是中线 CC' 和

AA' , BB' 和 CC' 的交点。 AA' 和 BB' 的交点, CC' 和 AA' 的交点, BB' 和 CC' 的交点,就是点O的属性。符号的属性是一个集合,但它的元素我们规定不能为空集($\emptyset$),多则无限。弄清了符号的属性,符号的指称就好理解了。符号的指称我们认为是符号所代表的对象本身。例如:“白马”的指称不是“白马”这两个汉字,而是一匹活泼泼的白色的马。符号的属性和指称是属于符号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只有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把握符号。上述诸训释,之所以存在缺陷,正是割裂了符号的两种功能的结果。还须注意,在符号、符号的属性及其指称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相应于一个符号,至少应具有一种确定的属性;而相应于属性的集合,又必然存在一

个对象为其所指称;而对于一个被指称的对象来说,则不仅有一个符号。

三、《指物论》思想之精华

在分析《指物论》的符号学理论之前,我们还必须分辨其体式,这对正确把握《指物论》的要旨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根据傅山和陈澧的说法,《指物论》也像《公孙龙子》其它诸篇一样,采用了主客对辩体的形式。主是正面立论提出观点的一方,客是反面诘难的一方。通观《指物论》,我们认为,主的立论具有反常规的特点,而客的难辞却合乎常识,表面看来,这似乎增大了我们疏通其思想的难度,事实上却为我们正确把握其要旨指明了方向。其实,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公孙龙子设主客二辩并不意味着有客这个人,而是一种假设,是公孙龙换角度(即从反面)所作的模拟反论。显而易见,反论若难不倒正面的立论,自然就更增强了立论的说服力。公孙龙子正是从立论提出后所可能遇到的最大诘难出发设客辩,事实上这是通过主客对辩而捍卫了主的观点,使其牢不可破。这也可以说是公孙龙子的一高明处,至于其论证的艺术在此暂不展开论述。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这是《指物论》通篇之主旨,是公孙龙子符号学理论精华之高度浓缩,也是我国古代最具符号学理论意义的论断。它成功地解决了先秦名辩的最基本问题——名实(符号与对象)关系问题,颇具符号学理论意蕴。我们知道,公孙龙子“指物”思想之精髓集中体现在“指”与“物”的关系上。这里的“物”就是事物、实体、对象。从字面意思看,这两句话的大意是:没有对象不是用符号来指称的,但是,符号本身并不是符号所指称的对象。这是《指物论》符号意义理论的充分体现:所有的对象都是通过符号来表示的,符号代表事物的属性,是事物属性集合的反映,某一事物的属性集合使得它和其它事物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又通过符号来体现。没有符号,事物就不能被称呼,事物间的同

异差别也就分辨不出来;另一方面,符号本身与符号所指称的对象是不能等同起来等量齐观的。符号只是对象的名称,它用来指称对象,但它本身却不是对象。符号与对象是称呼与被称呼的关系,且这种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不具有必然性。

“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非指者,天下无物,可谓指乎?”我们认为这是主对“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这一主旨的进一步展开和申述。“指”(符号)是一种物质形式,而且“每一个任意的符号必须本身是一种存在”,^⑫但这种存在是由“物”(对象)所决定的,因为“每个符号本身都是一个物质的产物”。^⑬符号的存在由“物”决定,这正是公孙龙子“指物”思想(符号学意义理论)的出发点。虽然天下有物,但是如果没有“指”,事物也就不能表明其为事物了。这并不是说“指”是第一性的,对物起决定作用,而是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如果没有符号用来称呼事物,那么千差万别的事物就不能被认识,事物的存在也就只能感受,但不能被言说。万物无名,或万物一名,即“物”这个“大共名”,^⑭思想交流从何谈起?社交活动如何开展?从这个层次来看,有“物”无“指”是不行的,换一种说法,也就是“指”对“物”的反作用是巨大的。“指”伴随着“物”的产生,经过人为的约定而形成。一旦形成,又对“物”起着巨大的影响。这样,“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论点就牢牢树立起来了,其符号学意义理论也逐步得到了展开。

“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客从天下本无“指”出发,对主的论点进行非难。客立足于常识摆出理由:“指”是天下本来没有的,而“物”却是从来就有的,用本来没有的东西来称呼从来就有的东西,是行不通的。客肯定了物的本性(客观存在),那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他只看到了一面,而割裂了“指物”的关系,否定了“指”的存在和作用,因而反驳显得片面、绝对化,而单薄乏力。正是这样,他不但没有难倒主,甚至给主的进一步论辩提供了

反面的理由。

“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不可谓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这是主针对客难进行辩驳的第一节。大意为：假如天下无“指”，那么“物”就不可称呼。既然说了事物不能用“指”来称呼，也就预设（隐含）了事物有“指”，天下存在“指”，这样，怎么又说是没有“指”呢？从符号学来看，“存在是属于每个可以设想的事物的性质，是属于每个可能的思想对象的性质……‘A不存在’这个陈述必然始终要么是假的，要么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A是无，就不能说它存在；而‘A不存在’，则暗示着存在一个其存在属性被否定的东西，因而也就暗示了A存在。”^⑮这样，没有事物是“非指”，也就回到了“物莫非指”的论题。客难之所以失败，在于符号存在及其作用这个问题上，而主的符号学理论之卓见也正在这里。

“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这是主反击客难的第二节，其意为：天下无“指”，且事物不可用“指”来称呼，并不等于说有“非指”这种东西存在。既然没有事物是“非指”，也就是“物莫非指”了。“物莫非指”，那么“指”（符号本身）就不是“指”（符号所指称的对象）了。这样，既然没有代表事物属性指称对象的符号存在，并且对象本身并不等于符号，所以，绝不会存在一个叫“非符号”的东西。既然没有事物叫做“非符号”，这就回到了“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论题上了。显然，主的反驳是令人信服的，有说服力。

“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不为指而谓之指，是无不为指。以有不指之无不为指，未可。”客认为天下有“物”无“指”的原因在于同一事物有多种属性，但是并非每一个属性都对应一个指称。既然属性和指称并非一一对应，而把不是指称的属性称作指称，这样，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叫做“指”啦。把不是指的东西当指，把“有不指”的东西（存在尚无符号的东西）当作“无不为指”（一切对象都有符

号），那是行不通的。客这一难颇具爆炸力。客一难并未把主难倒，反为主的辩驳作了铺垫，我们说他看到符号的存在及其作用。这里，他不仅立足于常识，而且也运用了一些符号学理论，大有非把主拉下马不可的气势。比如石有坚白之石，坚白属于石体，然而，我们确实不能说存在与石对立的坚白，即不能说存在与实体相对立的属性。我们也确实不能离“坚白”而言“石”，把“坚”当成石之“指”，把“白”当成石之“指”。可见，如果把属性和实体对立，把属性叫做“指”，那么一切都可以叫做“指”了。不过，我们必须注意：“物之各有名而不为指”并不等于“有物无指”，也不等于“指不可以谓物”。

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这是主针对客再难所作辩结的第一节。其主要思想为：符号的属性是天下事物所共同具有的，而不是万物毕异，各物的属性互不相干。离开事物来谈属性，即把属性与事物对立起来，当然不能说天下有脱离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属性。另一方面，对于物来说，也不能说天下存在无属性之物。这实际上解决了符号所指称的对象与符号的属性及符号的属性与符号两对关系问题：一、属性是对象的属性，对象是属性的对象，没有无属性之对象，也没有脱离对象之属性，二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这与公孙龙“离坚白”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天下无白，不可以视石；天下无坚，不可以谓石。”^⑯坚白不能离石体而独立，然而石体也不能脱离坚白的属性而自在；二、符号是对象属性集合的反映，属性离不开对象，且通过符号来表示，一个符号至少表示实体（对象）的一种属性，但并非一种属性对应一个符号。如果符号是对象多种属性的反映，那么每一种属性都可以用一个定摹状词来刻画，每一个定摹状词都可用来说明符号，以明确其属性。参见拙作《罗素定摹状词理论分析》，《现代哲学》1996年第2期）所以说，天下不存在“指”，事物也不可用“无指”来

称呼,原因在于,天下不存在可以用“非指”来称呼的事物。不存在“非指”,也就是“物莫非指”了。

“指非非指也,指与物非指。使天下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天下无物,谁径谓指?天下有指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径谓无物非指?且夫指自为指,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这是辩结的第二节。其主要思想是:符号就是符号,没有什么“非符号”存在。指称就是指称,不存在什么“非指称”。把符号的指称功能与符号所指称的对象区别开,是相对具体事物而言的。所以说,“指非非指,指与物非指也”。用A代替“指”,用 $\bar{A}$ 代替“非指”,用B代替“物”,显然, $A \rightarrow \bar{A}$, $A \wedge B \rightarrow A$ 。假如天下不存在代表属性指称对象的符号,那么符号只是符号自身,即一堆杂乱无章的笔画,或一串无意义的声音序列。这样,谁又会承认“非指称”呢?又假如天下没有事物,那么符号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符号也就不成其为符号了。即使天下有代表属性的符号存在,但如果它不指称对象,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有“非指”这种东西存在,也不能说没有事物具有“非指”这种属性。进一步说,假如天下存在脱离事物属性且无所指的“符号”,那么正如上述,符号就失去了其本性,其自身也难成其为符号了。这样,主就彻底解决了符号所指称的对象与符号本身的关系,其符号学理论也得到了充分的铺

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一、公孙龙子作《指物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先秦名学的一个焦点问题:“符号与对象”亦即“指物”、“名实”)的关系问题;二、“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公孙龙子成功地解决了符号与对象的关系问题,其《指物论》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篇符号学专论,其内蕴的丰富的符号学意义理论对当今语义学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三、借用符号学这门跨学科的方法论,进行史学研究,有利于继承和弘扬我国古代宝贵的文化遗产。

① 《杜国庠学术思想研究》第124页;

② 《杜国庠选集》第69页;

③ 庞朴《公孙龙子研究》第19页;

④ 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第198页;

⑤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序言;

⑥⑦⑧⑨ 《公孙龙子·名实论》;

⑩⑭ 《荀子·正名篇》;

⑪ 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第523—524页;

⑫⑬ 徐恒醇编译《广义符号学及其在设计中的应用》第13、18页;

⑮ [美]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中译本),第166页;

⑯ 《公孙龙子·坚白论》。

作者朱前鸿,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研究生(510276)

责任编辑:冯 生

从新发现的庚戌新军起义资料谈起

□黄大德

一

最近,笔者在《时事画报》上发现了一批关于庚戌新军起义的资料,对于研究是役颇有重要价值。

新军起义始于己酉年大年三十,终于庚戌正月初四。时隔仅半个月,正月二十日出版的是年第一期《时事画报》,便刊载了12幅题为《新军变乱》的时事画,各幅题图如下:

- 一、兵警交哄之起点;
- 二、新军哄闹警局;
- 三、新军毁拆警局;
- 四、第一标溃变;
- 五、旗兵枪伤黄士龙之激变;
- 六、倪映典之阵亡;
- 七、新军进据横枝岗;
- 八、防营战后劫掠之凯旋;
- 九、村民欢迎失败后之新军;
- 十、防营穷搜逃军之残暴;
- 十一、各界慰问黄士龙;
- 十二、善界收拾新军之遗骸。

在画报的文字部分,又刊载了《粤省新军变乱详纪》,全文如下:

兵警互哄之详情 新军与警兵积不相能,本不自今日始,故督练公所特设宪兵以约束之,不谓积嫌既深,遂有去腊三十晚之变。是晚五点后钟,有二标新军吴英元等六人,在惠爱七约绣文堂,因定图章,谓该店过期,硬要减价五仙,店伴不服,争论颇哗,警兵上前干涉,互相用武,时老城一局巡尉朱绍祥受伤,警兵大愤,当堂将新军二人拿回。是晚各标入城颇多,闻此消息,纷

纷到一局诘问,愈聚愈众,宪兵弹压不止,一局巡士严阵门前,以防其变。哄动至十句钟,环警局而哗者千数百人,时三标管带戴庆有,亲到一局保人。警官不允,更将被拘之新军锁起。戴乃出语众曰:汝等可速回,此事有我在,断不虞警局之敢无礼也。众益哄然,谓管带且没脸,我等岂能甘此。于是磨拳擦掌,欲哄入一局者数次,无何警道及广协到一局弹压,多方劝谕,并将新军放回,众始渐渐散去,事得暂寝。此三十晚兵警起衅之情形也。是晚二三标新军回营,以巡警欺凌之说,激动大众,翌日各执木枪棍棒等物,联众入城,遇警兵即殴,无一幸免者。各兵先到一局哄闹,伤七人,巡士由后门出编译公司而遁,失去手枪一枝,银鸡十一个,警棍八枝。往拆五局时,人数愈多,有一魏姓警兵,被殴后逃上瓦面,失足跌死。计自巡官以下,共伤九人。其门前木器什物毁烂一空,比之一局六局尤为惨烈,因此局在东门内,为新军出入聚点之地。当局外被拆时,警兵皆匿在瓦面,用大石掷下,新军进攻多不穿号衣,惟每有哄动,必大声呼曰,凡陆军人员必要帮手等语。是时本有多数宪兵拔出令箭在场阻止,均无效力,迫得将大东门小北门两城暂行关闭,并由李提警道广协府县分往各局弹压。事息之后,各局警兵不敢出巡,入夜警道面奉督示谕各分局转饬巡士,照常站街,其非一局五局地段者,多有遵办,然居民已受惊不小矣。此初一日兵警互哄之情形也。

初二日新军溃变之详情 粤省新军现分三标,第一标驻燕塘,第二三标驻北较场。第一标步兵三营,另炮兵二营,辎重及工程各一营,每营三百余人。其步兵营共札一处,如品字样。炮工辎另札一处,相隔不甚远。此标教练已四年。是日溃变,即此第一标之新军,与初一日滋事之二三标新军无与。第一标又以步兵三人为首,其余炮工辎又非全数同意也。

溃变之原因) 初协统张哲培、一标标统刘雨沛,鉴于军警互哄之故,将初二三两日假期,改为运动会,防各兵出营滋事。初二早各兵向标统要求放假,不得命,渐而哄动。至十句钟时有步兵二三人,汹涌出营门,各长官制止不及,出不数分钟,见多数步兵奔回,大哄曰:警兵拉大队来攻营,我辈当出御,于是全营震动,无论同谋不同谋,皆纷纷束装,而变事以起。

枪械之情形) 转瞬间,各兵严装出,哄入军械局取军械,刘标统大喝制止之,复力辩警兵无此事。各兵不听,张知事大变,由后门遁,驾马车进城,刘复出阻诸军,被伤头面。是时各兵已将军械取出,惟枪枝上全无扳机。因去年底大吏接秦提电,恐军界有变事,各标统奉密札,于廿九日将板机并子弹解缴军械局,只留每营常备子弹一千粒,七营共七千粒而已。各步兵见枪无扳机,不可用,即拥向炮工辎各营抢夺,适各营正将板机用马车装运进城,遂被夺去,幸各快炮仍无弹子,只有快枪千数百杆可用,而事变遂成。

叛兵之进行) 是时闻营内枪声大起,不可悉数。一息间见出营先向息鞭亭向游客盘问,随分一队向北较场前进占据钱局后之小山,及横枝岗等处。一队向北较场茶亭附近,其进行均极闪缩,若伺敌然者。并派有伺候数小分队,骑马亦有数人。其走北一队,即抢讲武堂之兵也。

初三四两日乱军失败详情 乱兵退窜

后,至初三日侵晨,水提李准,统领吴宗禹,率带李景濂、太永宽、李得铭、童常标及各防军,各率所部,约二千人,由大东门大北门小南门三路进兵,一点钟搜至东门茶亭,两军相遇,乱兵出全队涌至,约千余人,吴统领至前疾声晓以利害,令即弃械归营,许以回明上峰,贷其一死。旋见乱兵中有穿蓝袍手持红旗者,骑马驰骤,意气自豪,频摇手示不降意,且高叫曰:尔等兄弟如给我面子,当来合队攻城,否则吾首领已有命令,嘱我党今日进城,如不来,即开一仗云云。吴统领知不可喻,即饬所部在牛王庙一带分占四山,以步队遮其前,而以还管炮队密藏于后,布置一定,全师俱伏山上,尽行伏射。炮声甫发,服蓝袍者应声而倒。斯时乱兵亦还枪相击,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而来。故伤亡枕藉。剧战数时,乱兵乃纷纷弃械逃去。计是役击毙百余人。阵斩十余人,牛王庙前一带尸骸遍城,并夺回快枪千余枝,红旗一面,战马十七匹,军械用马车运回,衣箱服装用枪肩返。其伤尚有气息者数人,由十字会医生伍汉持,及西医骈三氏分别医治。官军受伤两名,即驻扎该一军营内。查乱兵此次败之速,实因枪码仅得七千左右,每人不及七颗。吴兵快炮极为坚利,因莫能御,又是日防营在东门外拿获乱兵危宗源、林廷杰、劳谦、林杰、石焕堂、王汉英、王应墀、黄炎祺、胡常松、黄振忠、张善才、蓝荣坤、罗希喧、吴其泉十四名,交南海审办,提讯均不承认。其危宗源八名,认随张协统马车进城不及,故被拿获云。此初三日大战之情形也。初四日,官军以乱兵多向石牌东圃白云一带逃遁,仍分队四出穷搜,即日获回乱兵数名。俱已改装,或穿长衣,并分由各路截击。又官军志在穷追,即于是午将一军两营烧去,以免藏匿。又闻袁督已将得胜情形,分电各省督抚,并请军机代奏。又军营本迫近永济药库,因此只藏火药,未有码子,故新军不

往抢夺,现仍派兵五百把守。又官军进攻时,防其西窜,先调兵五百守流花桥,五百守长堤,以阻其西下之路。并调有佛山安勇四百来省。又乱兵尸首俱穿军衣,又有穿队官排长衣服者。至初四日,方便医院及九善堂前往执尸,又多全无衣服者。西关十字会,在马草堆里搜回病兵一名。又在一军营盘搜出伙夫四名,官军欲将其治罪,各善团不允。时适江孔殷到观,由其保释。又初三晚四鼓后,城兵忽然放枪,居民又复惊恐,闻实因误会所致。又秦提已率大兵到省,汪有容亦带队赴燕塘会合云。

文末有按曰:“新军变乱为年开始一大事,当详细调查记录,兹限于篇幅,先登大概,容俟续纪报。”惜在其后无再发现。

《时事画报》对于同盟会所发动的各次起义,均有用时事画纪之,然皆为单幅图志。而对是次新军起义,画报以4页12幅、且配以2000余字加以反映,尚属首次。对于这次起义,国内虽亦有画报作图纪之,如《神州画报》,但画面只画了新军起义部队在清朝官军的追击下狼狈逃窜的情况,而“原图说明污蔑起义军队”,与《时事画报》形成鲜明对比。

其后,1912年《时事画报》的复刊号中,谢英伯国《复辟辞》文内有一段谈及《时事画报》与新军起义之关系及前后之情况:

“戊申之冬,载恬母子相继死,熊承基洪成典起义师于安庆,事败,洪君成典走香港,与同志计划我粤军界之运动。倪烈士映典力担任,而使画报为鼓吹之机关。盖图画感人,易于文字,而于军人脑质单简者尤宜。况值其时土耳其革命成功,全出于军人之反正。本报乃搜罗土国革命之图画,以为借鉴之资。胡公汉民,且为文以鼓吹之,计每期输入于新军营中者,凡三千余册,而健儿之来加盟者,问以香港机关之所在,亦以《时事画报》对之焉。乃天亡胡,及期而败,倪烈士洒一掬之碧血,谢国人而去。虏吏益疾视《时事画报》,日以七照会

使港督勒令停版。而港督固不之理也,而《时事画报》之股东各为远嫌计,相率而退,而《时事画报》不复能再维持矣。”

二

这两组史料的发现,不仅对于研究新军起义,而且对研究《时事画报》与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斗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时事画报》是当时“内地之有革命言论机关”之始。然史学界对于该画报并未引起重视,加以研究,是为大憾。

《时事画报》的创办人是潘达微。稍懂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没有潘达微便没有黄花岗。然而,正如与潘达微过从甚密的陆丹林所说,在潘达微逝世后,虽然国府明令褒扬,但“当时许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履历”。辛亥革命的有关史料,对他虽有记载(如冯自由、陆丹林的忆述),但亦草草,错谬亦多。究其原因,一则是因为潘达微在殒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前,一直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而在革命成功后,“因他素来不出风头”,没有向人言及其革命经历,因此,人们对他知之甚少。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忽略了对潘达微的注意,这是不足为奇的。

潘达微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对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清末民初期间,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艺术、经济、教育、医学等方面亦贡献良多,被称之为“摄影家”、“慈善家”、“戏剧家”、更有“美术大师”、“实业泰岳”、“报界巨子”、“学务先河”之誉。(有关潘达微革命活动的资料,详见笔者之《新发现的孙中山研究资料》一文,《学术研究》1996年第10期。)创办《时事画报》后,他利用时事画、漫画等形式,宣传国内外革命的形势,记录时代的风云、传递革命的信息。因而深得人民的欢迎。据资料显示,创刊号一出,销量“将及四千”,可见其影响之大。这便引起清政府的恐惧,潘达微在回忆画报之命运时说:“政界缘是嫉之,屡施困厄。同人曾未少挫其锐,而社会之受其影响,转疾而且众,政府忌之

愈深”。1908年,黄兴和黄明堂、王和顺等先后发动钦廉上思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均告失败。潘达微不仅在《时事画报》上刊时事画报作报道,而且还亲自作宋江夜题反诗图等多幅宣传画作为《时事画报》封面,为日后的革命斗争大作舆论准备。这更激怒朝廷,画报被逼迁往香港出版。这便有谢英伯文中所称的洪成典走香港,“与同志计划我粤军之运动”的记载。

对于土耳其革命,《时事画报》在以时事画报道的同时,据不完全统计,共搜集、刊载的照片有“土耳其革命运动之主动者”二幅,“土耳其军队之革命……”四幅,“土耳其革命”二幅。至于谢文中所说“胡公汉民,且为文以鼓吹之。”据笔者在所仅见的几册1909年的《时事画报》上,均查不到史料上胡汉民所用的名、号、化名、笔名的署名文章。但有署名“民”的《中国十年来之梦境》、《二百年来世界刺客成功表》、《外交之秘密》三篇,署名“非”的《胡汉民在《民报》上曾有“去非”的署名文章),则有《张之洞之片片录》。这四篇文章,是否出自胡汉民之手,大可留待专家去研究,但从这一时期的《时事画报》来看,确实比起在广州出版时,更加强了革命的宣传攻势,不断报道“党人行踪”,国内各地革命斗争的形势,国外革命的风云,以及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事迹,营造了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氛围和势态。《时事画报》不仅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报社被视为革命的“机关之所在”,热血青年纷纷前往加盟,而且“每期输入于新军营中者凡三千余册”,对新军起义的发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庚戌新军起义失败了,各地党人,闻之无不激愤,然而“由于其来也如暴风骤雨”,震动了清廷,也振奋了人心。过去清廷一向认为新军是挽救衰亡,重振家声的续命灵丹,殊不知结果适得其反,恰如清御史温肃于1911年(辛亥)7月奏摺上所说的“养虎自卫”了。而在社会方面,一般人认为在科学昌明,船坚炮利时期,非有充足的武力,不足以谈革命。革命党人只凭赤手空拳,充其量不外乎民军,会党等等一点力

量,是无能为力的。新军起义后,使这种观感为之一变,大大增强了人们革命的信心,激发了人民的斗志,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为革命机关的宣传喉舌,报道新军起义失败的该期《时事画报》,为了鼓舞党人的革命斗志,编辑对该期的版面、内容进行了精心的策划:

封面是整整占了半个画面的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映红了天际。

扉页刊登了于1909年11月8日暗杀了日本枢密院长韩国总监伊藤的“韩国烈士安重根肖像”,并全文刊载了他的供词。

正文第一版,在“正是贺新年景象”通栏标题下,刊登了三幅画,一是“花发满城皆锦绣;”二是“爆竹一声除旧岁”,三是“惊蛰闷雷天下响”。随后便是描绘新军起义的十幅组画。明眼人一看而知,那贺新年景象的三幅画,实际上是暗喻着新军起义给中国革命前途带来了光明的喜讯,是向中国人民贺年的礼物。

此外,用时事画描绘了亡国之民在海外之悲惨苦况,报道了国内人民的觉醒;用谐画(漫画)揭露朝廷的黑暗。而在传统的“历史画”的栏目中,编者推出了两组“爱国女儿”的图画,特别耐人寻味。

一是“笑村女”,文字说明如下:

美不堪英之苛政,华盛顿扶义起义师。一日,师次某处,一小村女进见,手携鸡子一筐,上前致礼曰:闻大将军倡联邦独立之举,小女子亦国民之一分子,恨纤弱无以助独立军,谨与邻女共搜得所蓄鸡子一筐,献于将军。愿将军为吾侪造幸福。华盛顿大喜,降阶执其手而礼之,时有参赞军事之法人在旁,为之肃然起敬。

按外国人之倡革命独立者辄成,而我国人之倡革命者辄败,岂谋事者不臧哉。盖外人虽一人倡之,而众人和之。义师所至,欢迎恐后。我国人则否,一人倡之,众人叛之,即自表同情者,亦风闻影响,即挈眷而逃。事后则以疏略鲁莽归罪于首事者,而自己则且以稳重安存自矜也。呜呼。

二为“法村女”，说明文字如下：

普法之战，法师败绩。法兵一联队退至某村，普兵追至，法兵已潜遁，遍搜不获，遇一村女，执而问之，女不答，普兵官拔剑吓之曰：不言即死。女沉吟曰：我法人也，若以法兵所往告敌，则必无幸，吾国或随之而亡，是则吾卖其祖国也。卒不答，受刃而死。

按：呜呼伟矣。如此女子，方足以言真爱国。若我国今日之时流，日以爱国为口头禅，而一举手一投足，无非辱国卖国者，视此女子，能不愧死。

在是年第三期中，《时事画报》刊出了自己整版的广告，一则为“特别增刊大祝典”：

本年七月为本报出版六周岁之期。此六年内，海内外风云诸多变幻，内而萍醴之革命、钦廉之革命、云南之革命、潮惠之革命、徐锡麟之刺恩铭、吴樾之炸五大臣，安徽之兵变，吾粤新军之变乱，外而土耳其之革命，波斯之革命，及无政府党之炸烈药，女选举党之风潮，曾出不穷。皆关于民生民权民族三大主义之惨剧壮剧悲剧也。本报拟汇编成书，配以精美写真片，以为六周年之纪念。凡阅报诸君，定阅长年者，谨赠一册，以志雅意。

其二为征联广告。所出上联为：人能救国方男子。

惜是年出至第四期，便因朝廷压力之下，“股东各为远嫌计，相率而退”，《时事画报》被逼停刊了。

从谢英伯留下的这一段短短的文字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时事画报》无疑就是同盟会组织武装斗争最重要的宣传喉舌与工具。从对《时事画报》进行粗略的考察中，更可看到同盟会的宣传工作的组织和策略，以及它在辛亥革命中重要的贡献。

三

《时事画报》所刊之《新军变乱详纪》，与其他已发现的史料基本没有多少出入，

但却记载了一条不为人知的细节：在新军起义失败后，清廷又在某军营搜捕新军病兵一名、伙夫四名，“官军欲将其治罪，各善团不允，时适江孔殷到观，由其保释”。熟悉辛亥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广州殒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及广州兵不血刃的光复，都是潘达微通过江孔殷的周旋、帮助，才得以实现的。而《时事画报》关于新军起义史料的发现提醒我们，江孔殷与潘达微的关系是颇值得加以研究的。

潘达微在以秘密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时经常周旋于朝廷要员之中，一方面搜集朝廷的情报，为革命党人制定革命斗争策略提供重要的信息；另一方面，也通过与他们感情的维系，利用他们的地位与权力扭转了不少被动的局面。在利用的对象中，潘达微与江孔殷的交情最“深”，而江孔殷对潘达微的帮助也最大。可以说，新军起义失败后病兵及伙夫获救，是潘达微运动江孔殷的结果。

江孔殷生于1864年，广东南海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恩科中二甲第27名进士，入翰林，授职庶吉士。江孔殷与朱汝珍为同榜进士，亦是当时广东有名的书法家和才子。1905年广东爆发拒约反美风潮时，曾有美国领事馆向清政府指名缉捕马达臣、潘信明、夏重民之事，轰动一时。其时夏重民以新秀才自居参与绅士行列，年少气盛，与江孔殷的翰林派对峙，水火难容。当马、潘、夏被捕后，绅士派怀疑是江孔殷从中作祟，故在报纸上不断指名道姓攻击江孔殷。潘达微探得马、潘、夏案系因广东各界联手在反美拒约中抵制美货，激怒美国政府所致，与江孔殷绝无关系，便游说各报，停止对江的攻击，并设法修好两派之关系。江孔殷与潘达微本来就是世交，在此风潮中潘帮了江的大忙，保住了他的名声，江大为感激，亦知恩图报。次年3月，《时事画报》刊载题为《官场之美人局》一图，揭露官场中利用妻妾活动卖官的丑闻，触怒了藩司，着令立即查封该报。江孔殷得知后，即与南海县令疏通，谓画报是为开通风气的善法，谬然就封，恐有不便。于

是，县令传潘达微入署，以编辑者不调查确凿便登报，咎亦难辞，遂罚款一百元了事。此后，潘达微及革命党人更设法接近江孔殷，常以诗书画之雅兴酬唱过从。江氏亦偶以藏画交潘达微刊于《时事画报》。世交之谊与感情的投资，在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失败的紧要关头以及广东独立的关键时刻，潘达微每每求助于江孔殷时，江孔殷也挺身而出，给予大力支持。

据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由于江孔殷在辛亥革命中所作的“贡献”，为了表示对他的敬重，孙中山与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等曾亲自登门拜访江孔殷，对他表示感谢，并在江太史第花园内合影留念。^①

民国之后，潘达微因看不惯昔日的同志僚友争权夺利，勾心斗角，退出了政治舞台，转而任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实行实业救国的理想。而江孔殷在民国后亦未出仕，改行经商，代理英美烟草公司买办。江、潘二人，分别代表着外国资本对民族资本的利益，斗得烽烟四起、你死我活，什么世交之谊、“革命”之情，在这场事关民族工业命运的商战中全被抛到九霄云外了。潘达微屡出奇招，一方面大打广告战，利用中

国人用国货作鼓吹，一方面通过赈灾、办学等办法扩大影响，使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名声大振。而江孔殷也不示弱，报纸上的广告无日无之，继而使出毒计，收购南洋的产品，等它发霉后再推出市场，以打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声誉，更有甚者，还收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制造工潮……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不过，1929年当潘达微病逝后，江孔殷还是送了一副挽联，曰：

白挺动全城，君是党人，自有交情尽生死

黄花成昨日，我非健者，也曾无意造英雄

此联可谓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致令我访问潘达微的女儿时，她仍能冲口背出。然而，它却佐证了一段历史，让人难以忘怀的历史。

①梁世顿：《江孔殷纪事》，《佛山文史》第七辑。

作者黄大德，广州广东作家协会
510030）

责任编辑：郭 林

能否“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①在近代,成了各国能否跨进近代化门槛的关键。哪个国家能有效地利用政治权力这根杠杆,哪个国家制度就会发生质的改变。反之,则很难改变旧的生产方式,改变社会性质,甚至落入列强附庸的地位。本文试图从近代中日两国政治权力对航运业运作之不同所导致结果的差异,从一个侧面,阐述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期对当今学习外国,创办现代企业有所启迪。

一、相似的社会背景

在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的社会背景是相似的。

1. 同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

在经济上,两国生产关系的基础同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这种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两国经济的发展。尽管两国都有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在生产中不占主要地位,而且都遭到封建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双重压制,因而,都有摆脱压制的要求。

在民族命运上,同遭西方列强欺凌。外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中日两国大门后,强迫两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片面最惠国条约。通过这些条约,列强获得了诸如治外法权、关税不能自主、设立外国“租界”、开放通商贸易城市等特权。中日两国在创办包括航运业在内的近代产业时,都要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与限制。

2. 都受外商轮船势力的垄断。

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日两国在

创办轮船航运业时,外商轮船势力都已垄断了两国航运水域,这给中日两国的经济与社会以巨大冲击。在中国,各港口间的木船运输业,遭到了严重摧残。据统计,道咸年间“往还华北沿海各区之帆船,约有一万四千至二万艘之谱”。^②仅上海一地,每年即不少于3600号。^③外国轮船公司出现后,由于轮船运输迅速、安全、价格较低,加上洋人仗持不平等条约享有的特权,使得“附搭轮船运销,既免节节厘金,又无遭风被盗之患。”^④因此,旧式木船业在与轮船竞争中迅速衰落,大批船民失业。在日本,外国轮船大量涌入后,随之外国工业品即大量涌入。欧美商人利用不平等条约,在日本各开放港口和居留地,大办商馆,推销商品,掠取资源,征收高额的手续费,迅速把持了日本的对外贸易。强大的外国商船队和居留地上的外商勾结,形成“居留地贸易体系”,使日本的对外贸易年年入超。据统计,从1860年到1867年,日本的进口额增加了13.07倍,同期出口额却只增加2.57倍。^⑤1875年,日本进出口贸易总额中,外商控制的比重已达99.68%。^⑥除此以外,和中国一样,外商轮船的大量涌入,同样造成了木船业的衰败,船民失业,物价上涨,金银币大量外流等严重社会问题。

3. 共有相对的和平环境。

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发展极不平衡,各国内部的改革尚未完成。资本主义各国的力量,主要放在国内斗争及与他国的竞争上,无暇东顾。这暂时给中日两国创造了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从国内看,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已经结束,80年代中期虽爆发过中法战争、日本侵略台湾事件等,

但时间都不长,规模都不大,没有波及全国。在日本,倒幕运动已经结束,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已胜利,维新志士掌握了领导权。总之,中日两国的国内形势都有所缓和,而且相对稳定。

二、不同的权力运作

封建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压制,外国轮船势力的横行,使中日两国产生了强烈的摆脱挤压的愿望;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以及包括航运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在中日的创办,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激起了中日两国效法西方的冲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相对缓和的国内形势,给了中日两国创办包括航运业在内的近代企业的契机。中日两国政府正是借用这一机遇,通过政治权力,来推进以近代企业为主要标志的近代化运动。于是,有了中国“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有了日本“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明治维新。但由于两国政府在兴办近代企业上的认识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使其在权力运作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1. 目的之不同。

日本政府发展航运业的目的,是为了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道路,赶走外商势力,收回商权、航权,进而达到“与列强并驾齐驱”^⑦的目的,也就是把发展航运业看成是“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的清朝统治阶级中,反对学习西方和兴办近代企业的顽固势力还相当强大。部分有识之士虽然认为应当发展自己的轮船航运业,但其着眼点,也仅是放在与洋人“争利”、“分利”上,而不是通过兴办近代企业改变国体,走西方式道路。李鸿章是中国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人,他创办的目的就是“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⑧是为了“略分洋商之利”。

2. 机构之有无。

由于目的不同,影响了国家是否建立组织机构,并通过机构使权力运转,以推动航运业真正动作起来。日本明治政府成立

的第二年即1869年12月,即成立了太政官所辖的通商司,掌管船舶行政。以后屡屡变动,到1875年11月船舶课改称管船课后,才算大体稳定下来。尽管如此,日本中央政府内始终有个掌管轮船航运业的机构。但在中国,整个洋务派创办的近代企业,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从中央向全国推广普及的运动。清政府中央既没有成立过以“劝奖百工”为中心工作的机构工部省和内务省,更没有成立过专门掌管轮船航运业的机构。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和以后的事务主要由李鸿章个人负责。

3. 政策之差异。

由于目的不同,导致政府方针政策的不同。政策必须通过机构来推行。由于机构之有无,更造成权力运作效果之差异。日本明治政府实行的是全面放开的政策。1868年,即开始制定发展国内产业和航运业的政策措施。1869年10月,颁布有关法令,明确宣布今后直至百姓商人,均准拥有和制造西洋式船舶。1870年1月,又以政府太政官的名义,公布“商船规则”,宣布奖励和保护西洋式船舶所有者。在运作上,不但支持大企业,而且鼓励兴办小企业;不但官办,更鼓励民办。例如,政府先后创办过两家官办为主的轮船公司,但效果都不好,因此,只好把1874年侵略台湾时购置的13艘军运轮船,托付给完全民办的三菱会社承办。1875年,明治政府正式确立了政府监督保护下民有民营的海运政策,从政策上确立官助民办为主。这样,除政府直接重点扶持资助的象三菱会社这样的骨干企业外,大批民间小轮船公司也蓬勃兴起。到1878年,仅大阪一带小业主就达70余名,船舶达100余艘。^⑨与日本政府相反,清政府则是采用限制发展的政策,对招商局实行“官督商办”体制,使其控制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不让其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对广大申请设立小轮船公司的华商,更限制阻遏其发展,以致出现“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局面。从1873年招商局成立,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20多年间,除招商局一家本国轮船公司外,几乎

没有稍有规模的华商轮船公司。

三、迥异的历史结局

不同的权力运作,带来了迥异的历史结局。

1. 航行权利之有否夺回。

日本政府通过政治权力,重点扶持本国骨干企业,通过骨干企业与外商轮船势力竞争,夺回了航行权利。三菱会社初创时,只有3艘小轮,共2181吨。后政府将侵略台湾时,用150万日元所购的13艘轮船,无偿交付三菱会社使用。由于官商合办的日本郵便蒸汽轮会社经营不善,政府又以32.5万日元收购其17艘轮船,同样无偿交付三菱会社使用。两次无偿提供的轮船合计30艘,共18946吨。^⑩此外,还决定每年给三菱会社25万日元的航运补助金,补助金的时限一次就定为15年,^⑪作为同外商轮船公司跌价竞争的补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短短一二年间,三菱会社就一跃成为拥有近40艘轮船,2.3万吨运力的大公司,外加政府的补助,终于具备了同外国轮船公司抗衡的实力。三菱会社开始与外国轮船公司展开激烈的竞争。首先是与对日本威胁最大的美国太平洋邮船会社竞争。日本政府又以年利率仅为2%,15年还清的优惠条件,不失时机地借给三菱会社81万美元,使三菱会社一举收买了美国太平洋邮船会社的航轮和神户、长崎、上海等地的财产。随后,日本政府又向三菱会社提供资金,外交帮助,以及铁路联运等特权,使其击败了另一竞争对手大英P·O公司,从而排除了航运中的外国侵略势力,收回了本国的航运主权。

与日本政府对三菱会社的资助相比,清政府对轮船招商局的资助,则显得十分可怜。清政府曾借20万串(合银123023两),作为轮船招商局开办费用。其后又给其几次贷款以及缓息、免息的优待。但数额与日本政府相比,相差巨大,利息、偿还期限,也不如日本政府给三菱会社的优越。1876年,招商局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轮

船17艘,由此负债222万两白银,仅每年利息就需付出20多万两。招商局因此如牛负重,只得放弃与洋商积极竞争,转而对其妥协退让,更谈不上去夺回航行主权了。

2. 远洋航线之有否扩展。

在沿岸和近海航行主权收回后,日本政府继续利用资金补助、制定法规等一系列手段,引导、鼓励和扶持本国轮船向远洋扩展。1885年政府推动三菱会社与共同运输会社合并,成立实力更为强大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由政府每年向其颁发88万日元的补助金,奠定其向远洋扩张的基础。1893年,日本政府看到时机成熟,即命令和支持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开通了第一条远洋航线——神户孟买线。1896年,日本政府更制定颁布了在日本海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这两个奖励法的目的均在于从船质、船速、船型等方面提高竞争力。这是日本政府引导、鼓励日本海运业在更大范围内与列强竞争,向远洋扩张,进而建立本国远洋航线网的重要步骤。从此,日本政府在航运补助费上不惜持续投入巨资。例如1886年,投到海运业上的补助费总共只有90.8万日元,1897年,一下猛增至266.9万日元。到1911年时,达到1215.1万日元之巨。^⑫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实属罕见。上海的英商《北华捷报》为此惊呼,指出日本海运补助费每船吨达12.3日元,而英国每船吨仅有0.56日元,只有日本的1/22。^⑬日本政府的这些努力果然见效,1896年后,欧美澳三大远洋航线终于相继顺利开通。

当1885年日本政府给邮船株式会社每年以88万日元巨款补助,进一步向远洋航线发展之时,恰是招商局从清政府处获得资助的结束之日。1884年后,招商局再也没有获得过官款借贷,只得以局产作抵押,向英商汇丰银行借款。汇丰银行提供借款条件非常苛刻,从而损害了招商局的独立地位。尽管如此,招商局仍是盈利企业,本有力量进行扩大再生产。但是,北洋官僚集团的任意支用和清政府层出不穷的

勒索,使得招商局不堪负荷。如 1890 年,李鸿章挪用招商局公积金 30 万两,贷与上海织布局;次年,又令提银 10 万两,作为上海织布局的投资;1894 年,户部令招商局垫支 37 万两,作为军费之用;同年,招商局又出银 5.5 万两,作为“报效”慈禧的“万寿庆典”之用;等等。据 1910 年资料所载,招商局光被各种名目支出的“报效”费用,“自开办以来计银 130 余万两”,^⑭占招商局资本总额(1910 年资本为 400 万两)33% 以上。从 80 年代起,到 1911 年,清朝完结,招商局被清政府挪用的资金和“报效”清政府的资金总数达 800 万两,相当于招商局同期股本的 2 倍。这种封建勒索给招商局以严重摧残,使招商局不仅无法扩大再生产,而且负债累累,更无力去扩展远洋航线。

3. 船数、吨数之有否增加。

日本政治权力对航运业的一贯支持,使得日本轮船拥有数、吨位数急剧增加;而中国政治权力对航运业的先资助后勒索,使其轮船拥有数基本保持原状,吨位数也增加有限。1886 年,招商局有轮船 24 艘,吨位 31420 吨,到 1911 年清政府垮台时,只增加到 29 只,49373 吨。1900 年到 1911 年的 11 年中,招商局的轮船数始终没有超过 29 艘,基本是损毁一艘,补充一艘,维持原状。1902 年和 1905 年甚至分别降到 27 艘和 28 艘。^⑮这与同期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相比,差距甚大。1886 年,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有轮船 62 艘,吨位 66715 吨,到 1911 年时已达 70 艘,287078 吨。^⑯从 1886 年到 1911 年,同样经过 15 年的时间,招商局的净增吨数为 17953 吨,平均每年净增 718 吨;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净增 220363 吨,平均每年净增 8814 吨,是招商局的 12.2 倍。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轮船艘数增长不大明显,吨位数增长却十分惊人。这表明日本轮船已明显向速率快、载重量大的新型大型航船转化。若与日本全国轮船数、吨位数相比,差别则更大。中国能造大轮船的仅招商局一家,而日本除了许多

小型船厂外,共有六家大型船厂能制造千吨以上轮船。因此,到 1907 年,日本全国轮船数已达 1033 艘,吨数达 60.4 万吨。1910 年增加到 1574 艘,110.9 万吨,1914 年更增加为 2133 艘,157 万吨。这说明日本航运实力相当雄厚,非中国可比。

4. 航运目的之有否实现。

日本航运实力之迅速增长,使其可以与列强争雄。这仅从日本轮船在贸易中的运载比率,即可窥见一斑。在进出口总额中,由日本轮船承运的部分,1902 年,进出口分别占 36.8%、41.4%;1912 年,分别占 39.8%、52.7%;1914 年,分别占 53%、60.1%。^⑰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远洋进出口运输方面,日本船已完全压倒了外国船,彻底扭转了在海运业中的被动局面,真正实现了“与列强并驾齐驱”的目的。中国轮船数无增,吨位数有限,在贸易中的运载比率是极其微弱的。加上招商局内部负债累累,外部遭到外轮公司的嫉妒和反对,如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和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等,在航运业务上尽力压低运价,排斥招商局。因此,招商局与外商在“争利、分利”上是极其有限的,更不用说实现“求强”、“求富”的目的了。

包括航运业在内的近代企业,构成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破产,明治维新成功。两国近代化,中国初创于 1861 年(安庆内军械所成立),日本 1868 年才实行明治维新。在性质上,中日两国同是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运动。同时同质的运动,“何以他国(指日本)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当时许多大思想家、政治家就发出过无奈的哀叹,作过深沉的探索。航运业作为洋务运动、明治维新的一个侧面,一个缩影,从权力运作角度进行探测,从其成败得失中引出经验教训,是极其沉痛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19 页。

②③④ 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 1

香港正在成功地走向平稳过渡

□吴奕新

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解决港、澳、台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是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又一重大突破，也是他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光辉范例，充分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的统一。从“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以及其后我国政府有关方针的制定，到中英谈判以及其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整个过程，都是在邓小平亲自领导和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构想的全面阐述以及解决香港问题的一系列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内涵，构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多年来，在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和中国政府一系列对香港回归的具体政策的正确指导下，在广大爱国爱港人士的积极支持下，香港的整个形势，正朝着有利于落实“一国两制”方针、落实中

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有利于香港平稳过渡回归祖国的方向发展。香港正在成功地走向平稳过渡。

一、筹建特区的工作正在卓有成效地进行

在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指导下，香港平稳过渡回归祖国的大局已定，香港特区政府筹委会的预委会贯彻“以我为主，依靠港人，面向港人”的方针，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筹建特区政府打下了良好基础。1996年1月26日，特区筹委会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目前，肩负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筹委会的各项工作正紧张有序地推进，并把香港的平稳过渡作为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依靠港人，面向港人”，将筹建特区工作扎根于港人之中，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人士意见，一切着眼于香港的平稳过渡。可以说筹委会自成立以来，各专题小组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推选委员会小组在香港首次开

辑下册，第1252、1250、1271页。

⑤⑥大久保利谦编：《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馆昭和44年版，第17、125页。

⑦《大久保利通文书》第5册，东京大学出版会昭和58年版，第565页。

⑧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0。

⑨⑩⑪《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五十年史》第4、7—13页。

⑫《交通领域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岩波书店1953年版，第357页统计表。

⑬《北华捷报》1908年5月28日。

⑭《殷东签注隶部章程》，第4页。

⑮《烟台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民国36年版，《七十五年来江海轮数量表》。

⑯日本经营史研究所编：《日本邮船百年史资料》，昭和63年版，第656页。

⑰《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百年史》第153页。

作者江道源，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361005）

责任编辑：郭林

展咨询活动,征询香港各界对推选委员会具体产生办法的意见。庆祝活动小组着重就成立香港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活动委员会和香港地区民间庆祝活动总体方案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此外,还讨论了1997年、1998年香港公众假日的安排、关于建立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的问题等。经济小组先后就香港财政预算问题、预委会经济专题小组提出的各项建议和意见以及香港拟设立按揭证券公司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法律小组讨论了预委会法律专题小组提出的《关于香港原有法律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建议》。小组重申,香港原有法律中与基本法相抵触的法律是极少数的,绝大多数香港原有法律可以作为香港特区的法律。1996年1月26日到1996年12月12日,筹委会先后召开了7次全体会议,通过了13项决议决定。包括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决定、关于1997年下半年和1998年全年香港公众假日安排的决定、关于成立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活动委员会的决定、关于推选委员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关于建立香港回归纪念碑的决议、关于教科书问题的决议,还有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区实施作出解释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关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问题的决定》。特别是推委会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60名议员,并宣告临时立法会成立,这两件大事表明,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工作进入全面落实阶段。筹委会在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通过了这么多项决定和决议,并完成了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的推选和临时立法会的成立,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筹建特区工程之庞大,筹委会办事效率之高、成效之大。

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的产生,意义十分重大。由香港人自己选择香港的最高行政长官,这在香港的历史上还

是第一次。众所周知,英殖民统治者统治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总共28位香港总督全由英国钦定,从未咨询过香港人的意见,香港百多年来根本没有民主可言。由港人选出,经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是百多年来香港第一个由中国人担任的行政长官。正如江泽民主席在1996年12月18日会见董建华时所指出的:这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真正体现,也意味着香港即将进入一个新纪元。而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顺利产生,则是又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一事实进一步表明,香港的平稳过渡已经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困难和障碍了。

二、筹委会把香港的平稳过渡作为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1996年5月出席筹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时指出,中国人民对稳定体会最深。在稳定的条件下,一切都可以发展。并同时强调,香港的平稳过渡不仅符合600万香港人的利益,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英国的利益。江主席的这番话,表明中国对香港的平稳过渡是非常重视的。筹委会工作一年来,始终把着眼于香港的平稳过渡作为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为了实现香港平稳过渡,筹委会真诚希望英方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责任,在涉及香港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的一系列问题上,与中方合作,并指出这个合作应是全面的。出于这样的目的,筹委会在成立不到三个月,工作规划刚刚制订,就通过秘书处于4月1日向港英当局提交了《关于希望港府向筹委会提供协助的有关事项》的清单,并期待港英当局能尽快作出积极回应,等待了整整一个月之后,港英当局于4月31日作出了初步回应。在回应中尽管也有一些积极部分,但对筹委会提出的10项合作要求中的6项,则以“须进一步确定要求,才加以考虑”的遁词加以搪塞;更“断然拒绝”对临时立法

会的工作给予协助,并借机再次攻击设立临时立法会是不必要、不可取的。此后,彭定康又跑到美国去,利用国际场合大肆攻击筹委会和临时立法会。筹委会邀请港府有关官员到会介绍西北铁路计划的构思,港英政府又借故不派官员参加。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看,港英政府曾口口声声表示会对筹委会的工作给予“切实的帮助”和“最佳合作”,但实际上采取不合作或不愿合作的行动。

应当看到,筹委会希望港英当局能配合筹建特区政府工作,并不等于离开了英方筹委会就寸步难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香港必将有一个光明的前途,这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中国政府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紧紧团结和依靠港人,确保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长期繁荣稳定。筹委会之所以要求港英政府协助其工作,是因为中英联合声明规定英方对香港政权交接有关事宜负有与中方合作的责任和义务,是因为中英两国外长早已对此达成了外交共识,也是因为中英双方加强合作,以务实的态度妥善处理过渡事务,有利香港的平稳过渡和主权移交,不仅符合600万香港人的利益,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也符合英国的利益。

三、筹委会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香港社会各界人士意见

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关系到600万港人的共同利益的大事,筹委会重视咨询港人意见,筹委会从成立起就确立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去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工作方针和工作规则。如筹组400人的推选委员会的工作,由于是直接关系到产生一位什么样的行政长官和什么样的临时立法会,事关全局。为征询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推选委员会小组1996年4月13日到14日连续两天在香港开展了咨询活动,两天共分行业、界别和团体举行了16场咨询会议,实际参加的团体为366个,团体代表447人;以个人

身份应邀参加的有626人次,总数1073人次。参加的人士涵盖了香港社会各阶层、各大界别。咨询期间,还收到各界人士的书面意见100多份。由于咨询活动真正做到了“面向港人”,做到了民主、开放,并且咨询前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所以咨询活动得到了香港社会的积极反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此同时,推选委员会小组在广泛吸纳意见的基础上反复研究了推选委员会的具体产生办法涉及的有关问题,把各方面意见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些原则性共识。筹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委员会产生办法的原则设想的决议》,这个原则设想因为吸纳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既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规定,也照顾到了香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和愿望。这就为推选委员会小组下一阶段继续深入研究有关问题,最终制订出推选委员会的具体产生办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按照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和临时立法会成员将由400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组成的推选委员会推选产生。根据筹组特区的总体时间表,1996年8月上旬,筹委会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推选委员会的具体产生办法,随后进行推选委员会的具体组建工作,通过了第一位行政长官和临时立法会的产生办法。1996年11月推委会选出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12月选出了以范徐丽泰为首的60人的临时立法会。

四、爱国爱港的热情空前高涨

在香港进入后过渡期以来,爱国爱港力量不断壮大,香港人的爱国爱港的热情不断高涨,特别是1996年1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以来,爱国爱港的热情空前高涨。据有关的报导,仅1996年上半年间,香港就有102个粤籍社团、74个闽籍社团、67个九龙地区社团通过发表谈话、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发贺信等方式表示,要积极支持筹委会工作,热情参与香港后过

渡期的各项社会事务。在筹委会举行的咨询活动中,香港 300 多个社团踊跃参加、积极建言,一些未能出席会议的社团和人士也主动以书面等方式表达意见。当港督彭定康抹黑香港,诋毁工商界、分化港人、破坏平稳过渡之时,香港近百个团体又自发地站出来进行抵制,或游行示威,或发表文章驳斥谬论,用行动捍卫香港的稳定繁荣。香港社会各界、各社团还通过嘉年华会、图片展览、知识问答、有奖竞猜、摊位游戏等许多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基本法,使“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基本法逐步深入人心。随着“九七”临近,香港已有越来越多的社团自发地举办各种庆祝活动,庆祝回归的气氛越来越浓。新界各区从 1995 年开始,每逢倒计时百日,就轮流举办庆祝回归活动,至今已有 10 万人次参加。港岛的一些社团、协会联合发起组织了“港岛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活动筹备委员会”,并举行了盛大的迎“九七”嘉年华会。到 1996 年 6 月,香港各界庆祝回归活动委员会的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许多界别如工商界、教育界、妇女界、地产界、各商界以及宗教界和外国商会等都希望根据本界别的特点,举办大型庆祝活动。

五、港人对“九七”后的香港经济充满信心

尽管香港近几年的经济处于周期性低潮和结构性调整中,主要经济各行业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仍然存在,尤其是在 1996 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有放慢的趋势,但由于香港的经济基础比较稳固,在整体经济增长中,香港的实质增长率 1996 年仍可望达到 5% 左右的增长率,比 1995 年的 4.6% 高出近 0.4% 的增长率,香港的整体经济实力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另从近些年香港的资金流出与流入的状况判断,国际资本流入香港逐年增多,突出地表现在国际性银行和大公司陆续来香港设立机构。近几年来,香港没有出现资金大量外流的情况,而是银行存款稳定增长。据港府公布,

到 1995 年底止,香港银行业存款总额达 22087 亿元,比 1989 年的 10077 亿元高出一倍多。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香港经济的前途充满信心。“九七”临近,随着香港经济增长走出低谷,经贸逐步回升,势必会有更多的资本流入香港,香港资本流入将进一步高于流出。据美国一家投资公司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按目前的趋势,香港将于 21 世纪上半叶继续扮演“东亚纽约”的角色,意欲取代它而成为金融中心的其它亚洲城市梦想恐难成真。具有世界影响的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在 1996 年 5 月公布的 1996 年世界竞争力调查报告显示,在其所列出世界 46 名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排行榜上,香港位居前三名,名列日本之前。1995 年,香港居民购买住宅物业数量和价值分别比上年上升 30% 和 45%;在 1996 年,香港最贵的一幅土地以超过 5 亿美元的价格卖出,这是投资者信心的最好说明。特别是 1996 年上半年,世界银行在香港正式发行了一项跨越“九七”的总值 10 亿港元的 5 年期债券。以此,港元存款不断上升,这些都是人们对香港经济充满信心的最有力的说明。

六、外国人士看好香港

临近“九七”,由于整个香港形势正朝着有利于平稳过渡的方向发展,不仅港人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外国人士也看好香港的前途。目前外国人士看好香港已成潮流。特别是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都看好香港。

1、美国人对香港“九七”回归中国后保持繁荣充满信心

据香港美国商会会长弗兰克·马叻先生介绍,美国在香港的公司近年不断增加,到 1996 年 6 月底止,美国在香港的公司约有 1000 家,美国设在亚太地区的业务总部中有 426 个在香港,从美国商务部统计的数字看到,美国在香港的直接投资已达 125 亿美元,马叻指出,美国投资者对香港“九七”回归中国后的信心,可以从他们商

会 1995 年秋天进行的对香港未来“商业信心调查”报告中看出来。在他们的调查中,被问到对香港未来 5 年投资环境的看法时,有 91% 的被访者回答“非常理想”或“良好”,被问及未来 3 年在香港有何打算时,有 46% 的被访者回答“增加在港投资”,有 45% 的被访者回答维持原状,有 8% 的被访者回答打算逐渐减少在港投资,但其原因并非担忧香港的前途,而是从减少企业成本考虑。

2、法国人对香港未来的前景充满信心

据香港法国工商总会主席鲍文德先生介绍,近两年法国很多大公司、包括法国航空公司都把总部搬到香港,法国国民银行也于 1996 年 7 月在香港租用一座新大厦作为日后发展的一项措施,法国公司在香港注册的数字近两年来不断上升,法国人士普遍看好香港前景。

3、日本人始终看好香港的发展前景

近几年来,日本人始终看好香港的发展前景,日本对香港投资的势头超过美国对香港的投资,并在各主要的经济领域展现出全面扩展的姿态,其对香港的经济影响力不断扩大,对香港的政治问题也日益关注。据香港日本工商会主席石井芳昭介绍,近几年来大多数日本公司对香港的发展前景持积极、乐观的看法,他们预期在香港“九七”回归中国后,香港将会继续保持优势,香港仍将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中心,而日本公司会更积极地在香港发展,日本前驻香港总领事折田正树指出,“中国

内地拥有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潜力,这必将为香港提供更多的受益机会。

4、加拿大人士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充满信心

据香港加拿大商会前会长陈清霞小姐介绍,她对 1997 年以后中国政府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制度非常有信心,实际上外国公司在香港的办事处增多,不仅是看好香港的未来,更重要的是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她还强调指出,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在 21 世纪中国在亚洲将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如果中国内地的经济能够继续开放发展起来,那么,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可能“九七”以后比现在更好。

从上可见,外国人已经看到香港在“九七”回归中国之后,他们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特别是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将对香港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可以预料,“九七”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经济发展的主流不会逆转。

历史正沿着邓小平设置的“一国两制”的轨道,驰入香港回归的 1997 年。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和广大爱国爱港的香港人民,为着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长期稳定繁荣,扎扎实实地开展香港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潮流,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推进。中国的香港前程似锦。

作者吴奕新,广东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研究员(510050)

责任编辑:童轩

浅释港澳档案所藏 有关孙中山与澳门关系研究的一些资料

□ 澳门)霍启昌

一、前言：澳门在孙中山研究的重要意义

孙中山先生与澳门的关系十分密切，只惜史家多未留意。首先，澳门是孙中山走向世界踏足社会的通道。孙在12岁时是经澳门乘船抵达檀香山，接受“西式”教育的。在香港求学的时候，澳门便成为他往返省港的必经之地。孙毕业于香港西医院后，也是先在澳门行医。孙弃医从政，澳门又成为他革命活动的一个舞台。首次起义失败后，亦是经由澳门脱险逃亡国外的。武昌起义成功后，在缔造和捍卫共和国的斗争过程中，孙往往把广东和西南地区作为革命活动的主要基地，澳门和香港也因特殊政治地位而成为重要据点，尤其是在维系海外华人对孙中山的支持和筹集革命军政府的军政费用方面。无论在孙中山早期反清的斗争中，还是后期反对袁世凯及北洋军阀乃至对桂系军阀的讨伐中，澳门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①

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澳门为不少孙中山至亲长期居留的地方。例如孙的兄长孙眉，元配夫人卢太夫人，以及他的两位女儿及孙女等。为此，虽然孙亲身来到澳门的次数不多，但也常常写信到澳门以便一直能与至亲保持联络。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孙中山的至亲甚至乎是死于澳门，或者葬在澳门的。说澳门是孙中山家族的第二故乡，亦不为过。^②因此，对这位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家的研究，澳门是绝不能忽略的对象。

本文就澳门与香港档案的有关研究孙

中山与澳门关系的史料，作一简介，以期引起大家对这方面研究的兴趣。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涉及孙中山与澳门长期关系的一些重要环节，并将在档案所藏有关这些环节的资料作一简介，不当之处，祈为匡正。

二、档案材料例说

(1)乙未首义的资料

乙未首义是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一班革命友人，首次尝试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行动，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上，意义十分重要。但已经出版的革命文献，对乙未首义的筹划过程，都报导得非常简略。^③研究乙未起义的最重要文件，应是藏放在香港档案编号129的一份由港府调查乙未起义的报告书，个中详情可参考拙文。^④但由于在该文本本人并未指出澳门档案亦同样收录到有关乙未起义的重要资料，与港府的资料互相补充，故此本文首先介绍这些澳门档案资料。

远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前，孙中山与他的革命党友人在澳门的活动，曾经引起澳门政府的注意。由于这些革命党人都是密谋推翻满清政府，可以导致中国内政发生重大改变，而影响到中葡关系，自然引起澳葡政府关注。另一方面清政府亦经常施加政治压力，透过葡国驻华使节，要求澳门政府采取行动遏止革命党员在澳门的反清活动，而澳葡政府便更须要搜集有关的情报。故此，澳门政府档案是有收录到评论孙中山先生和他的革命党朋友在澳门策进革命

运动的文件。至于一些现今仍存在的,当时澳门出版的中葡文报纸期刊,亦偶有报导和评述此等活动。以上提及的澳门资料,无论是收录在澳门政府档案的文件,或是中葡文的报章刊物,都会有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可以提供给我们去进一步认识孙中山先生早期在澳门策进革命的过程。

在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期华人在澳门活动的原始资料中,最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应是澳门政府的“民政档”*Administracao civil*,这个档是由民政厅历年收取来自政府各部门公文所组成的。要指出的是由于民政厅发出的文件不一定存放于这个档,所以有关革命党员在澳门活动的其中一些文件,已不能在这个档找到。尤其是由隶属于民政厅的华政务官(其后称华务司)负责调查该等活动而事后呈报给澳督府的有关文件,这类文件当时应该是收录在澳督府办公厅档的,但这个档现在已不存放于澳门。盛传此类机密政府的文件,在“一·二·三”事件发生期间或之后,已运送到葡萄牙去。根据笔者的查探,对于此批文件现在收录在葡国哪一个档案馆,无人能够找出端倪。

幸而现时的澳门“民政档”仍藏有一份有关乙未起义的重要文件。这份编号 AC CX3011544 的文件,是由葡国驻广州领事祈斯宝(CRESPO)于 1895 年 10 月 28 日发给澳督的一封公函。在信内祈斯宝谈及刚在广州发生的乙未起义情况。他指出当时所发生的动乱实际情况不可得知,但从搜获的军械则可测知,假若广州政府不是预先侦破密谋,则可能会引致严重后果。事后政府查得有 500 人早备船票,于次日返回香港,至于谁人付与船票,则不得而知。经政府官兵将其中 10 人逮捕,其他即作鸟散。至于这些作乱份子所用的军械,其来源亦不可知,但整个行动极有可能是在香港澳门策划的。因此祈斯宝恳请澳督要特别提高警觉,注意在澳门华人的一举一动,事关此次密谋,一定与港澳有关。祈又指出有关此次动乱他所得到的消息,是来自其他外国使馆人员,广州政府和一些

商人。根据此等线人,谣言所指,将有革命出现,而沙面亦将会被攻击。因此令到外国使节人心惶惶。但祈斯宝则认为此次动乱矛头所指,显然是两广总督而不是在穗欧洲人士,而这次动乱亦并非意图挑起种族仇视。相信只是一些惯见的帮会份子反抗清政府的行动而已。但他强调这些只不过是他个人的意见。假若澳督向澳华人查探到有关消息,必须从速告知,以便及早应变,因为他的职责在照顾葡国在华的一切利益。

葡国驻广州领事上述的有关乙未起义的报告,虽然内容没有港府调查报告那么详细充实,但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难得的参考资料,进一步认识当时对外人对乙未起义的心态。从祈斯宝的报导可以得知,他对该次起义行动的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他认为港澳必然是该次行动的策划场所亦是看对了。值得注意的事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大都熟识和重视英美驻华领使档案,甚少人留意到,葡萄牙人是最先从海上抵达中国的欧洲人,与中国建交远自 16 世纪,而中葡邦交一直未有中止过。到了清末民初,葡人对中国的认识,已积有 400 年经验,加以葡国一直在国际纷争事件中,严守中立态度,与中国亦没有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葡国领事对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汇报,其看法是较英美等国领事为客观的,甚有参考价值。如祈斯宝在报导乙未首义事件中,力持己见,认为其他外国使节误认事件可能是针对西方国家,受种族主义驱使的看法是错误的,便是一个好的例子。

除了这份政府公文外,当时在澳门出版的两份周报,亦有刊载有关乙未首义的珍贵资料。这两个报纸分别是《镜海丛报》和葡文版的丛报(*Echo Macaense*),而且都是孙中山葡国好友飞南第先生所创办的。两报的创办日期都是 1893 年 7 月 18 日。

1895 年 11 月 6 日出版的第 16 号《镜海丛报》刊载了来自广州的一则电闻,记载有关乙未起义的消息。该电文是刊登在名为“要电汇登”标题下。此则电文一共 702

字,较之港英政府数千字的调查报告,自然逊色得多,但香港政府的文件只集中报导朱贵全招兵勇,及带领所招兵勇乘坐保安轮由港往穗以及抵达省城后被捕等经过。对于孙中山和陆皓东等在广州筹划的过程则只字不提。而《镜海丛报》这段消息却对此有所报导:“查得省垣双门底王家祠内,云冈别墅有孙文,即孙逸仙在内,……即于初九日带勇往捕,先经逃去。即拿获匪党程准、陆号东二名,又在南关咸虾栏李公馆,拿获三匪,并搜获大饭镬二只,长柄利斧十五把,是屋崇垣大厦,能容千人。闻前两日有数十人在屋内团聚。续因风声泄漏,先被逃去。当将五匪带回营中审讯。”

⑤

这里虽然是短短几行字,但已是报导孙中山等在广州筹划起义的遭遇最详细的第一手资料,值得重视。至于电文的其他部分与香港政府调查报告书亦多吻合。值得注意的是,电文最后的终结评语亦即是广州政府对乙未起义整件事件的看法,是与上文所提及葡领事祈斯宝的评价一致的:“先有党徒来省租便民房二十余间,以为屯聚之所,刻下党与已约有四万余人,原拟齐集省垣后,先由藩署前起事,若能得手,即由花县清远一路北上云云。该匪等谋为不轨,幸为李止香大令,先期查获,以遏乱萌,否则五羊城中,仓猝起事,虽有兵勇,其如迅雷不及掩耳何?呜呼险矣!”⑥

《镜海丛报》是飞南第创办的,虽然他个人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但他亦是一个专业办报人,也忠于办报时独立不阿的报导原则。而上述有关乙未起义的报导,是照登广州官方来电的,这是基于飞南第为《镜海丛报》订下的编辑凡例:“首一页论说,次为中外报,先纪京事各事,次详各省各国杂事,次为省港报,日采省港各报之可存而非伪者,删节汇登……”⑦这篇由广州来电汇登的消息,其原文措词是反革命的,若果将它作为飞南第支持孙文及其革命运动的证据则谬甚矣。

反之,《镜海丛报》于同年11月27日在《澳新闻》一栏所载的“事必再发”一

文,则显然是支持孙的革命运动,因为文中有“孙杨两人均赴外洋,余党散伏内地以待再举。文有乱天下之才,所结党半为雄杰。”等语,另外,葡文版丛报早在10月30日已对革命党首次起义行动,有所提及,不过较之《镜海丛报》的报导简略而已。

⑧)有关孙中山革命同道飞南第的记载

澳门政府的“民政档”亦有收录一些有关孙中山在澳门的革命挚友的情报资料,其中包括卢廉若,杨鹤龄,飞南第等的资料。相信研究孙中山的专家对卢杨两人较为熟识,因此本文仅介绍鲜为人知的飞南第的有关资料。

飞南第是世居澳门的“土生葡人”,1863年2月13日在澳门出生,父亲是世居澳门的葡萄牙人,而母亲则是华人。飞是孙中山在香港念书时结识的朋友。当时飞在香港法院先后担任过书记,传达员和翻译员的工作。两人认识后便成为深交。孙中山于香港西医院毕业后到澳门行医,飞已回澳门,因此孙曾托飞南第替他申请医生执照。飞是来自印刷世家的,飞氏家族远在1855年便已创立一商务印刷公司,并且替澳门政府印刷刊物。所以飞南第回到澳门于1893年创办中葡文周报《Echo Macaense》及《镜海丛报》,本身已拥有优厚的条件,可算是深得天时地利。飞为人富正义感,敢言不畏权贵。当孙中山筹划乙未起义失败,被清政府通缉逃到澳门时,飞敢把他收容藏匿在自己寓所,亦即当时《镜海丛报》的馆址所在。数日后飞更安排孙安全潜入香港再乘轮到日本去。飞可说是孙的救命恩人。

其后孙中山被港府正式驱逐出境,又为清政府通缉,但飞南第仍然率先在《镜海丛报》上刊载孙的《敬学序》,表示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⑧在葡文丛报中文广告版栏,于1893年7月至10月期间,又连续登载告白,盛赞孙中山医术高明,并且介绍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情况,尤其表彰孙的崇高医德。飞南第亦在他的葡文版丛报数次报道有关孙在澳门的行医情况。⑨

1912年1月11日,当时飞南第任澳门议事公局(即今市政厅)议员,曾致函孙中山,对推翻清朝统治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表示祝贺。中华民国成立当初,飞又向澳门议事公局建议在局外升旗和举行大会,庆祝中华民国诞生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飞南第可以说得上是在孙中山早期革命生涯中,给予孙相当大支持的一位外籍朋友,很值得史家进一步认识。

研究飞南第最重要的资料是收藏在“民政档”的有关飞氏生平履历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一直保留在飞南第私人档案内,故有幸留存至今,成为我们研究其生平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飞南第是天主教徒,他居住于下环正街,是属于圣老楞佐堂教区,所以有关飞南第的宗信仰等人生大事,如领洗,结婚以至死亡等资料情况,在该堂档案部仍存有纪录。其中一些资料更是十分详尽,例如从他的领洗记录,可以得知飞南第的身世和详细家庭状况。结婚记录则可以找到他的夫人的身世等珍贵资料,这些教堂纪录都是研究飞氏家庭背景不可缺少的原始资料。

至于研究有关飞南第的事业和思想方面,除了上述的“民政档”文件可以提供原始资料外,在他本人所创办的中葡文周报及其他当时出版的葡文报章,亦可以找到有关他的一些轶事,而从这些文章的报导及他本人撰写的社论,亦不难见出一些蛛丝马迹,有助认识飞南第的言行。为此,本文特选录以下一系列《镜海丛报》谈及该报的办报宗旨和原则的言论以供参考。

在一篇以飞南第授词味味生(该报主笔,正名王琴南)改稿的社论有这样的言论:“本报之名,夙著远迹,中西之君相,且不畏其权势,时发微议,而畏尔等之曰控曰杀乎……迹闻外间有等奸人,深 本报指摘过甚,露示机缄,或曰焚杀,播以风声,行其恐喝,是直欲以么麽世人之力,而撼天空之健气。”^⑩

在1895年3月27日的社论有这一段说话:“本报之刚正自持,惩恶锄奸,固未尝

损变规模,或改其夙昔所存之素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勉为耿正之士斯固夙心也。操报以来,遇有西洋弊坏之政,必于报楮而指陈之,以冀修警。”^⑪

又“本报创设两年,经历多变,专为人所不敢为,而平人之所不平。中西国家,本澳豪恶,各等教会,虽至囚杀相加,无所拘避也。”^⑫

1895年8月21日的社论又重复:“本报开办以来,德者固多,怨怒盖亦不鲜,无论中西官绅,苟其狡戾暴著,天人敢锄,本报必奋身振笔,猛为攻击……本报则无党无偏,照公发议,则亦可以心鉴。”^⑬

从上所引述的《镜海丛报》言论,可以得知飞南第疾恶如仇,对揭露和批判中国和澳门一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败行,不遗余力,所以该报的主笔曾遭人在街上泼镪水,而飞南第立即以报主身份悬红缉凶并且登告表示这些凶徒的行为是绝不会令他畏缩的。^⑭

由于飞南第在葡文版的丛报同样敢言,经常笔诛西洋权贵,更不时猛烈攻击当时澳督的政策,因此被澳督告到法庭,打了一场大官司。这一场官司的审判过程被一张当时在香港出版的葡文报纸连续报道个中详情,飞南第在答辩中,显得义气凛然,为研究飞南第言行不可多得的材料。^⑮

就以上的言论,已足见飞南第的思想取向。《镜海丛报》的《论说》,相当于现今报章的社论,多论及国事,言论十分激烈,常抨击清政府,倡导富强救国,将中国变成近代化的中国。研究孙中山早期的近代化思想,飞南第可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很值得深入研究。

§)北伐前后有关孙中山与澳门的资料

武昌起义成功后,广东和西南地区成为孙中山二次革命和护法及捍卫共和国斗争的主要范围。所以在反对袁世凯及北洋军阀乃至桂系军阀的艰苦斗争过程中,不少孙中山的战友,都不时来到澳门进行活动。因此亦引起澳门政府的关注,进行搜集有关情报。例如袁世凯政府在1914年

曾要求澳门政府澈查“白朗”反袁行动是否与澳门有关,而澳门政府相应作出调查复告,双方的往来公函,仍可以在“民政档”找到。又例如支持孙中山的战友亦曾经于1920年在澳门进行倒桂系军阀莫荣新的活动,有关的文件亦可以在同一档找到。但由于这些事件未有直接涉及孙中山,所以不在本文评述。

在这里要一谈的,是当孙中山跟陈炯明争夺广东领导权正闹得如火如荼之际,澳门于1922年5月29日,发生了军警开枪射杀群众事件,引至骚动和罢市。而澳门工会更派出代表团赴穗请愿,要求广东革命政府派出军舰援助。此时孙中山已罢免陈炯明三要职,正处于陈炯明叛变前夕的严峻形势下。但由于孙中山非常关注澳门的动态,还是在6月2日接见了澳门工会代表,答应积极向葡政府交涉,保护澳门侨民。

有关这次涉及孙中山的中葡冲突事件,最重要的澳门政府文件,在“民政档”现已一件也找不到。这大概由于该等文件一直存放澳督府办公厅档内,而这些高度敏感性文件,于“一·二·三”事件发生后,已被抽出或已被移送葡国外交部档案。幸而一些当时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章,曾将其中一些文件全文刊载,而这些报章仍保存至今,所以我们亦能籍此窥见事件的端倪。例如OLIBERAL(自由报)曾将澳门总督于1922年6月3日致葡国领事转复广东政府公函的中葡文版本全文刊载。^{①⑥}该报又于同年6月18日刊载澳门护督致广东政府有关中葡冲突事宜公文的中葡文版本。此外,香港档案亦收录中葡双方展开谈判的有关公文。例如英国殖民地部档案编号129 477便收存广东政府复答上述澳督于6月3日发出的公函的英译本一份。而在同一编号亦夹有英国驻广州领事向英外交部汇报有关此事件的文件。

虽然这些仍存放香港澳门的文件,并非原来发自广东政府或澳门政府的原稿件,而只是译本或转载本,但其内容的可信性,毋庸置疑,因此同样有极高参考价值。

值得指出的是,除了这些官方资料外,当时香港的英文报纸,根据一些由澳门逃避到香港的外籍目击者忆述而作的纪录,亦是很有参考价值的。^{①⑦}

中葡为此事件进行的交涉,其过程十分复杂,主要由于在谈判期间,发生了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事件,港英和澳葡政府为此曾大伤脑筋,对于应该支持孙中山或陈炯明,港澳政府都采取谨慎态度。在编号129 279等一系列的香港政府文件中,可以得知英外交部与港英政府对孙中山的看法并不一致,但他们是倾向于支持陈炯明的。这主要基于他们认为孙中山已受共产主义影响,相当积极于组织港澳工人罢工运动。这样,英国在香港及中国其他地方的经济利益必然受严重影响,因此主张给陈炯明经济援助,令他继续控制广东政府。

澳葡政府跟中国政府谈判的过程中,有赖英国政府从后撑腰,自然亦受这些意见影响,所以澳门的葡文报纸对孙陈在广东争夺领导权一事,亦显得十分关注,不时加以报导和评论。例如《自由报》在1922年4月3日,曾报导因孙与陈意见分歧而导致陈辞去广东政府要职的消息,并提到陈炯明曾经从澳门提借澳币500万元回惠州。又例如,该报在5月4日刊载了有关孙中山已控制广东海军兵权的消息,并估计效忠孙中山的军队为数约2.5万至9万人之众。其后,在7月16日,《自由报》又指出孙中山由于香港工人罢工影响,在澳门带动搞罢工运动并且敦促澳门政府进行禁烟禁赌。该报认为孙的主张影响到澳门的经济和民生,因而向孙提出指责。

香港的中英文报纸,如《华字日报》“孖刺西报”、《南华早报》等,都同样报导了孙中山及广东政府对澳门事件的谈话所采立场,亦不时有所评论。这些非官方的资料,虽然只是代表报章或是执笔者的个人见解,但亦可反映一些港澳人士对孙中山及他所涉及的重大事件的观感,不失为难得的参考资料。

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前,少年的孙中山先生在中国的生活范围,只在香港、广东、

澳门一带。19 世纪末期的香港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相当进步而又现代化的城市。本人曾利用一些原始香港史料、充实推理的方法,来解释当时的现代化香港社会是触发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主导线。^⑮

19 世纪末期的澳门,亦有它现代化的一面。例如孙中山曾说:“则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尝为正式之提倡,有之,自澳门始。”^⑯在当时澳门社会,孙中山又能够接触到一些具有近代化思想的人物如飞南第、卢廉若等。所以有可能孙的早期革命思想同样受澳门社会环境所触发。孙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在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予卜居于珠江江口之澳门……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予之以奔走国事……实始于是地。”^⑰因此,要研究孙早期的思想和革命活动,有必要利用澳门原始史料,作进一步的了解。

较之香港,澳门更是与孙中山有长期密切关系。在孙的政治生涯后半期,他一直致力捍卫共和国和讨伐反革命军阀,锐意建立一个近代化的中国。在这艰苦斗争中,澳门一直成为他二次革命工作的据点,特别是在进行争取海外华人和外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方面。所以若能掌握这段时期的澳门历史实况,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明了一些发生在孙中山先生身上的事实,是在怎样情况下发生,也就可以避免笼统和抽象式或断章取义式的推论。

本人在撰写此文期间,得到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司徒文雄博士以及邓国光教授、谭世宝教授、林宇新先生的协助,谨向

他们致谢。)

①②张磊、盛永华、霍启昌编《澳门:孙中山外向门户和社会舞台》,澳门大学出版中心,1996 年第 25 页。

③④霍启昌《几种有关孙中山先生在港策进革命的香港史料试析》,《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中华书局,1986,445—446、440—445 页。

⑤⑥《镜海丛报》1895 年第 16 号,5、6 页。

⑦同上,1893 年第 1 号,1 页。

⑧同上,1895 年第 16 号,1 页。

⑨同上①;Echo Macaense,1893 年 12 月 17 日,2 页。

⑩《镜海丛报》1895 年第 37 号,1 页。

⑪同上,第 35 号,2 页。

⑫同上,第 28 号,1 页。

⑬同上,第 5 号,1 页。

⑭同上,1894 年,第 23 号,1 页。

⑮O POVIR《前途报》第 98、99、100、101、103 期。

⑯O LIBERAL《自由报》,1922 年 6 月 6 日,6 月 8 日。

⑰例如,《葡华早报》,1922 年 5 月 30 日,31 日。

⑱霍启昌:《十九世纪香港的现代化与孙中山先生早期革命思想》,孙逸仙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学术座谈会,北京,1990 年。

⑲⑳《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伦敦被难记》序,49—50 页。

作者霍启昌,澳门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郭 林

明代两广总督对澳门商埠的设置与管治

□刘伟铿

两广总督是明清时派驻两广的封疆大臣。地方文武官员都受其节制,始置于景泰三年(1452年)。初无固定驻地,多来往于梧州、肇庆、广州之间,成化元年(1465年),韩雍正式开府于梧州。^①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两广总督吴桂芳正式迁督府于肇庆。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两广总督再迁督都府于广州。

明代中叶两广总督设置澳门(濠镜澳与十字门一部分)为对外商埠,是中葡两国贸易和外交政策双向调整的结果。澳门被设置为对外商埠以后,明代两广总督及其属员,一直对其行使国家主权,实施有效管治,与清末沦为葡萄牙管治的澳门有本质的不同。

在沿海设置对外商埠以便贸易活动的开展,不自濠镜澳始,唐代设于广州的蕃坊就是一例。唐代蕃坊经宋代向东扩展,已与广州中城接壤。元代再向西扩展,至明初亦已走到尽头。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至明代中叶,历史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离开广州城在珠江出海口附近寻找一块面积足够大的地域,设置一个有利于对外贸易管理,方便外船靠舶和外商开展正当贸易活动,并使舶市和商埠连在一起的特殊经济行政区域。从明代广东地理环境考虑,澳门和屯门都是可

供选择的地方。屯门比澳门稍深入内地,从国防角度和当时的贸易规模考虑,澳门比屯门为宜。

一、澳门开埠,分为开泊口、开舶市、开商埠三个阶段

唐宋元三代,虽一直存在着以接受朝贡与回赐宝货为形式的贡舶贸易,但对外商的国籍,外船来往的时间、规模,没有太多的限制,一般是来者不拒,外商还可进入广州城内的蕃坊居住。明洪武初,由于张士诚、方国珍余党亡命入海,与倭寇勾结为边患,明廷大幅度收紧对外贸易政策。洪武七年(1374年)罢市舶司,厉行海禁,片帆不准出海,只允许暹罗等5个老牌贡国船只进入中国海面,并且只有贡使可进城,外商不可进城。洪武十四年(1381年)开始,广东都指挥使司在沿海增设多个卫所,加强对沿海的武力封锁。

澳门开泊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增设香山守御千户所驻香山县治东,直属广东都指挥使司,作为澳门一部分的濠镜澳,是香山守御千户所千户属下把总(百户)分防的泊口,由于海禁,入泊者主要是兵船。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增设广海卫于新会县

南(今属台山),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香山守御千户所划归广海卫管辖。②

永乐年间(1403—1424年),部分解除海禁,复置市舶使司,由内臣(太监)充任,来贡国增多。明王朝为减轻国库对“回赐宝货”的负担,对外船国籍、贡物“回赐”与附搭货物“抽分”多寡、贸易活动范围、时间、规模、程序,均视外船所属国与明帝国政治关系的亲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外船进入广东海面,需要预先领有勘合号簿,接受检查。③时濠镜澳等泊口,增加了对经过此地的外船进行“勘合号簿”检查的任务。

正德年间(1508—1517年),两广总督陈金与右布政使兼分巡海道副使吴廷举,曾采取诸如统一税率、设置牙行等措施,促进外贸的繁荣。④由于其时广州的内港码头已不敷使用,“始有蕃人私筑室于湾澳者,以便贸易”。⑤陈金曾尝试离开广州设置舶市,迁市舶司于高州,⑥以方便暹罗等友好国家到广东贸易,但为时极短。因正德末,发生了葡萄牙人皮来资等借贸易之名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事件,中国方面不得不发起屯门之役、西草湾之役,将葡人驱逐出境。⑦又由于浙江、福建倭患严重,朝廷于嘉靖元年(1522年)革去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⑧是年,两广总督张大力整顿外贸秩序,奏请处死纵容家人在电白从事走私活动的市舶使牛荣(太监),⑨并将市舶使司迁回广州,重建分巡海道副使署于广州城。⑩

外贸政策的收紧刺激了走私活动的猖獗,不仅不设市舶司的福建漳州、泉州走私严重,而且广东方面的外贸管理亦无法施行。由于当时广州内港码头已不能使用,广东临时开舶市的地方,有东莞、⑪游鱼洲(琶洲)、⑫浪白澳、⑬上川岛⑭等地,俱是不规范的临时交易之所。据《霍勉斋集》,这些舶市虽有抽分官(税课官)到达施行验税,但往往洋船甫抵,走私者即麇集,购去洋货大半。待“抽分官到,则蕃舶中之货无几矣!”

嘉靖十年(1531年),朝廷革去市舶使

(太监),保留同提举、副提举,加强了两广总督对外贸管理的控制权。同年,两广总督林富讨平活跃于屯门、澳门珠江出海口一带,以东莞人黄秀山为首的走私集团,⑮为规范这一带的外贸活动扫清了一些障碍。

嘉靖十四年(1535年),两广总督钱如京接纳指挥佥事黄庆的提议,将市舶提举司迁至濠镜澳,⑯即在濠镜澳开规范的舶市。其时中葡尚处于战争状态,故濠镜澳舶市不对葡人开放,只对“有朝贡表文者”开放。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葡人侵福建,在走马溪受到严惩。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广东分巡海道副使汪柏批准葡人以“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货物,愿借地晾晒”为由,进入濠镜澳舶市。⑰

汪柏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中国的史籍记载是汪柏受贿,而外国的记载却强调这是中葡谈判的结果。参与此事的葡人索萨给葡王约翰三世的兄弟路易斯亲王的信中这样说:“我在1552年曾乘商船往中国,在业务上没有多大进展,因为葡人被侷于佛郎机之列,禁止利用中国港口。我命令在中国海上的葡人不要登陆,并且不要做任何对抗中国人的事情。然后,我进行和平谈判。葡人答应缴纳各种税,所有葡人都同意这种协定。……和平协定以及缴纳各种税是由广州城海道副使(汪柏)的命令决定的。”索萨给另一友人的信云:“订立和约后,中国人乃停止称葡人为番鬼。”⑱

既然葡人已经吸取了以前几次侵华战争失败的教训,“不要做任何对抗中国人的事情。”“并答应缴纳各种税”,中国人理应给以友好态度,准许他们与允许进行贸易交往的其他国家一样使用濠镜澳这个舶市,汪柏和索萨的会谈,其实是中葡正式结束战争状态,进入正常贸易与交往的和平谈判。

同年,两广总督应奏请将驻肇庆左参将分防地段由高肇雷廉四府改为高肇广韶四府,并设广州府海防同知,直属分巡海道副使,专责海防征兵征饷事宜。⑲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广东当局封锁上川岛,^{②0}实际上是关闭上川岛之临时舶市,让舶市集中濠镜澳。同年,两广总督鲍象贤指挥汪柏平定广东沿海的海盗何亚八、徐铃等。^{②1}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汪柏整顿牙行,“立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②2}

明政府关闭其他临时舶市、平定海盗、整顿牙行等重大行动,使明朝政府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权力得到加强,为澳门由只准搭建短期篷舍的舶市,向外商可以定居的商埠过渡,准备了条件。

周景濂《中葡外交史》载:葡商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与中国商人协力运动地方长官,尽请求馈赠之能事、卒得遂其宿愿,于1557年有名阿妈之一荒芜小岛,被指定为彼等之居住地。及彼等由浪白港乘船直驶其地,知其地即为澳门。乃将原有之假小屋拆去,改造坚固之家屋,设立礼拜堂。”

设立澳门为商埠,是“地方长官”“指定”的,当时并曾陆续把散居于浪白等临时舶市的外商,调集到濠镜澳居住,因为那里是市舶司所在地,便于管理。“自是诸澳俱废,濠镜独为舶藪矣。”

至此,两广总督设立了一套较唐宋元更为完备的外贸新体制。舶市和商埠的一部分——外商居住地设在澳门,商埠的另一部分——出售舶来品和外商购买中国货的市场,则仍在广州,中间联系者为牙行。

从名义上说,澳门商埠设立后,进入澳门居住的外商,应不限于葡萄牙商人。但当时的客观事实是,东南亚及阿拉伯等地的外商,早于唐宋时已在广州有居住地,其贸易规模比葡萄牙少。葡萄牙人因迟来,在广州已无定居之地,故入居澳门者,惟以葡人为多。

二、澳门开商埠后两广总督及其属员对澳门的管治

澳门开商埠后,两广总督对澳门管治

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沿袭唐宋蕃坊旧例并有所发展,让驻澳门的葡商与牙人享有适当的自治之权,在澳门外商居住区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经济和行政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对澳门行使主权,实施领土、军事、行政、司法和关税的全面管治。坚决抵制部分葡人欲侵夺我国主权,不服从我国主权管治的一切图谋。具体措施是:设立管治机构,明晰税制与规范贸易活动。

濠镜澳开商埠前,行政方面属香山县延福里恭字围,中有龙田村,设有保、甲;澳口有守澳把总,并有市舶提举司。开埠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两广总督王钊奏请市舶提举司革去副提举一员,保留同提举。^{②3}稍后,广州府海防同知、香山县主簿,均于濠镜澳建立行署。隆庆五年(1571年),两广总督殷正茂奏准实行丈量制,蕃舶到达濠镜澳,“核委海防同知,市舶提举及香山正官,三面往同丈量,……上海道(分巡海道副使或佥事)转闻督抚(两广总督),待报征收。”^{②4}可见外贸管治权在中国政府。

至于自治机构,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置民政长(又译行政长官),由葡人选出,是中国方面批准的自治首长,即宋代之“蕃长”。万历三年(1575年),罗马教皇任命澳门主教。万历八年(1580年),葡人擅自选出一名治安判事(又译首席检察官)。次年,由民政长、治安制事、贸易舰队司令和市民代表,组成行政议会。^{②5}

葡人擅自举行选举,组织议会,显然含有不尊重中国主权的成分。万历十年(1582年)春,两广总督陈瑞通知教会、议会派人到肇庆澄清。澳门方面派罗明坚和本涅拉到肇庆。陈“詰责葡人自由行使法权之不法,大有违皇上予以澳门之初意。”罗明坚等则答云:“驻在澳门的葡商过去和现在常常是中国皇帝的顺民,他们并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因此,请求殿下对他们加以扶助和慈爱。”并送上礼物价值2000余银。“总督始许其自治。”^{②6}

此次会谈涉及澳门每年500两地租由香山知县核收及调整澳门政制等内容,据

《利玛窦中国札记》，该次会见，罗明坚还请求在内地给神父安排一个居留地，陈总督表示“以后再来，可以答应这个请求。”此事导致后来利玛窦入居肇庆六年，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万历十一年（1583年），澳门履约调整自治政制。选出判事二人、长老二人、检事一人组成元老院，统理政事，其办公地称为议事亭。次年，两广总督吴文华授予澳门元老院成员以“夷目”的职衔。

万历十九年（1591年）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两广总督萧彦、陈大科相继对澳门外商住户实施保甲制，“听海防同知与市舶提举约束。”陈督抚又奏，“将其聚庐中有大街，中贯四维，各树商栅，榜以‘畏威怀德’四字，分左右定其门籍。以旅葵‘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迹，毕献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东西为号。东十号，西十号，使上相维系讥察，毋得容奸。诸夷亦唯唯听命。”

至于税制，隆庆年间两广总督殷正茂改抽分制为丈量制，规定将进口税由提取实物变卖改为直接征收白银。万历初，两广总督凌云翼再定出详细“则例”，计有舶税五种。在澳门主要征收水饷与陆饷两种。水饷为丈量所得从量税，陆饷则是向货主征收的从价税。与此同时，还向出洋船只发给“引票”，征收“引税”。^{②⑧}

至于贸易活动的规范，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因海寇犯潮州，立例禁止蕃商进入广州城，明确广州与澳门之间只由牙商联络的关系。隆庆元年（1567年），两广总督张瀚奏准朝廷取消海禁，准中国商人出洋贩运，葡商与中国商人开始合作拓展对日贸易。

万历六年（1578年），两广总督凌云翼批准葡人于每年夏冬两季到广州海珠岛参加中国举办的定期交易会。万历八年（1580年），两广总督刘尧诲批准驻澳外商随时可到广州处理商务，不过每只船不得超过5个同行的葡国商人。^{②⑨}

嘉靖末万历初，两广总督还指挥了绥靖海盗张璉、林朝曦、曾一本、林凤等的战

役。在俞大猷、戚继光的配合下平定了沿海倭乱。驻东莞南头（屯门）之备倭都指挥使署改中路巡海参将署，迁至濠镜澳以北之雍陌村，香山守御千户所改隶中路巡海参将。这些军事行动与军事设置，为澳门的贸易发展，提供了安定和平的环境。

由于两广总督及其属员对澳门执行了正确的政策，故明万历年间，澳门的对外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给中国和葡萄牙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促进了中葡两国以至西欧、东南亚、拉丁美洲以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当然，两广总督执行这些政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部分葡人一直没有放弃他们要变澳门为葡萄牙殖民地的企图。另方面，葡人带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会发生碰撞。故两广总督准许葡人居住澳门发展贸易一事，多次受到朝中大臣的非议。但两广总督及其属员不为部分外人的嚣张气焰所屈，采取种种措施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而朝中大臣的非议又促使他们不断完善管理的措施。对这两方面的压力，他们可谓应付自如。但对另一种破坏管治的势力，他们却无能为力。那就是封建王朝自皇帝至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之风。

尽管明代两广总督对澳门商埠的设置与管治，不能不带有封建王权政治的历史局限，但两广总督们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多年的艰辛探索，通过对澳门商埠的设置和有效管治，推动了明王朝的贡舶贸易政策向市舶贸易政策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部分葡萄牙商人、传教士也推动了葡国从殖民主义政策向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政策转变，实现了双方平等互利的交流。其历史的功迹，应当得到肯定。

①万历《肇庆府志》卷十林大春《重建端州督抚行台碑记》。

②嘉靖《广东通志》卷三十一《兵防》。

③万历《广东通志》卷六十九《贡例》。

④万历《广东通志》卷六十九《抽分》。

⑤万历《广东通志》卷七十《蕃商》。

- ⑥《明史·佛郎机传》。
- ⑦戴 《广东通志初稿·夷情（上）》。
- ⑧道光《广东通志·职官表（九）》。
- ⑨《明史·暹罗传》。
- ⑩嘉靖《广东通志·公署》。
- ⑪林希文《卸金序记》。
- ⑫《霍勉斋集》卷十二《上潘大巡广东事宜》。
- ⑬黄启臣《澳门历史》引托利各尔脱《中国基督教传教史》。
- ⑭黄启臣《澳门历史》引威廉氏《中国商业指南》。
- ⑮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八十八《前事略》。
- ⑯《明史·佛郎机传》。
- ⑰万历《广东通志》卷六十九《澳门》。
- ⑱周景濂《中葡外交史》。
- ⑲嘉靖《广东通志·职官》。
- ⑳强克斯特《葡萄牙在中国殖民史略》。
- ㉑道光《广东通志·前事略》。
- ㉒万历《广东通志》卷七十《蕃商》。
- ㉓嘉靖《广东通志·职官》。
- ㉔万历《广东通志》卷六十九《丈量》。
- ㉕黄启臣《澳门历史》第200页。
- ㉖黄文宽《澳门史钩沉》第103页。
- ㉗万历《广东通志》卷六十九《澳门》。
- ㉘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1987年版第248页。
- ㉙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 作者刘伟铿，肇庆市端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526100）
- 责任编辑：郭 林

《共有制与均贫富》出版

由潘强恩总裁策划，陈家义教授主编，李力教授、冯永宁副教授参与写作的《共有制与均贫富》最近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共富与均贫正反两个方面阐

述共有制的内涵；论证共有制能够实现财产最大的社会化，是脱贫致富的好形式，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唐传奇与元杂剧相关作品的比较研究

□程国赋

周贻白在《中国戏剧史长编》附录《中国戏剧本事取材之沿革》一文指出：“中国戏剧的取材，多数跳不出历史故事的范围，……甚至同一故事，作而又作，不惜重翻旧案，蹈袭前人。”这种题材因袭的现象在唐代小说的嬗变历史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集中论述唐传奇在元杂剧中的嬗变情况。

一

根据黄文暘撰、董康辑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曲海总目提要》，庄一拂撰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傅惜华撰的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元代杂剧全目》，孙楷第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戏曲小说目录解题》等书的统计，唐传奇改编的元杂剧不下40篇，其中散佚不存的23篇，今存17篇①：

《隋唐嘉话》卷上尉迟恭三夺槊事——尚仲贤《尉迟恭三夺槊》；

《离魂记》——赵公辅《栖凤堂倩女离魂》（佚）、郑光祖《迷青琐倩女离魂》；

《柳毅传》——尚仲贤《洞庭湖柳毅传书》、李好古《沙门岛张生煮海》；

《柳氏传》——乔吉《李太白匹配金钱记》、钟嗣成《寄情韩翃章台柳》（佚）；

《李娃传》——高文秀《郑元和风雪打瓦罐》（佚）、石君宝《李亚仙花酒曲江池》；

《莺莺传》——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长恨歌传》——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白朴《唐明皇游月宫》（佚）、关汉卿

《唐明皇启置哭香囊》（佚）、庾天锡《杨太真霓裳怨》（佚）、庾天锡《杨太真浴罢华清宫》（佚）、岳伯川《罗公远梦断杨贵妃》（佚）；

吕道生增订《定命录·卖娼》——庾天锡《中郎将常何荐马周》（佚）；

《博异志·李黄》——郝经《西湖三塔记》（佚）；

《纂异记·陈季卿》——范康《陈季卿悟道竹叶舟》；

《阴德传·刘弘敬》——佚名《施仁义刘弘嫁婢》；

《扬州梦记》——乔吉《杜牧之诗酒扬州梦》；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韩愈从侄事——纪君祥《韩湘子三度韩退之》（佚）、赵明道《韩湘子三赴牡丹亭》（佚）；

《宣室志·陆颀》——李好古《沙门岛张生煮海》；

《传奇·裴航》——庾天锡《裴航遇云英》（佚）；

《传奇·封陟》——庾天锡《封陟先生骂上元》（佚）；

《传奇·张云容》——庾天锡《薛昭误入兰昌宫》（佚）；

《传奇·昆仑奴》——杨讷《磨勒盗红绡》（佚）；

《传奇·孙恪》——郑廷玉《孙恪遇猿》（佚）；

《醵化记·崔尉子》——张国宾《相国寺公孙合汗衫》；

《法书要录·购兰亭序》——白朴《萧翼智赚兰亭记》佚)；

《云溪友议·卢渥》——白朴《韩翠苹御水流红叶》佚)、李文蔚《金水流红怨》；

《云溪友议·韦皋》——乔吉《玉箫女两世姻缘》；

《本事诗·李白》——王伯成《李太白贬夜郎》；

《本事诗·崔护》——尚仲贤《崔护谒浆》佚)、白朴《六曲崔护谒浆》佚)；

《续神仙传·蓝采和》——佚名《钟离度脱蓝采和》；

《云溪编事·侯继图》——李唐宾《李白云英风送梧桐叶》；

《中朝故事》宣宗私行访贤事——高文秀《好酒赵元遇上皇》；

《唐摭言·裴度》——关汉卿《晋国公裴度还带》佚)。

二

从唐传奇到元杂剧的嬗变，可以从科举观、婚恋观、市民观三个方面来论述。

(一)科举观。

唐代小说所描写的文士，像荥阳生、崔某这样科举及第、博得一官半职的是少数，大多数是落魄不遇的书生，他们虽然在爱情方面比较美满，但功名不遂，仕途坎坷，有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却无用武之地。因此，《枕中记》的卢生说：“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柳毅传》亦交待：“唐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②又“广德中，有孙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③不过，唐代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所追求的名、仕途，在元代杂剧中变成了现实。

《金钱记》第四折李白云：“圣天子选用贤良，文章士尽赴科场，韩飞卿状元及第，我与他成秦晋花烛洞房。”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元杂剧中的男性主人公应有尽有。

另外，唐、宋、明、清不同朝代揭露科举积弊的文学作品屡见不鲜，如唐代《集异记

·王维》、《逸史·李君》、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明代《警世通言》卷九《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王衡《邯郸记》杂剧、汤显祖《邯郸记》传奇、清代《聊斋志异》中的《饿鬼》、《司文郎》、《贾奉雉》、《考弊司》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它们或者揭露科举考试造成“死读书，读书死”的社会现象，或抨击科场作弊、请托、贿赂等不良习气。在元杂剧中却很少揭露之作，更多的是以读书做官、科举入仕为人生最高境界和最终目的，如柳毅刚出场便说：“母亲，您孩儿学成满腹文章，如今春榜动，选场开，您孩儿欲要进取功名去，但得一官半职，荣耀门闾。”④在《倩女离魂》杂剧中，科举与婚姻的地位亦同等重要。

唐、元两代作品，科举观的嬗变并非事出无因。唐人重视科举，“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⑤而在科举考试中，“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⑥唐代重视科举的时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小说的兴盛，传奇小说集《玄怪录》、《续玄怪录》、《传奇》等都是文人的“温卷”之作。不过，每次录取的人数很少，“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⑦据《唐摭言》卷二载：“圣唐有天下，垂三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其每年录取的名额之少可想而知。简言之，唐代重视科举的风尚吸引了大批文人参加科举；而录取人数的限制，又使众多的书生怀才不遇，唐代小说中众多书生落第、生活窘迫，正是唐代大多数士子的真实写照。

入元以后，仅在太宗九年（1237年——即金亡后第三年）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中间隔了78年。重开后，科举试分两场，对汉族文人倍加歧视，且“一岁仅三十余人”。⑧然而，科举长期被废止，为什么元杂剧中却有大量反映科举的情节呢？王国维指出：“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且金时科目之学，最为浅陋。此种人士，一旦失所业，固不能为学术上之事，而高文典册，又非其

所素习也,适杂剧之新体出,遂多从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于其间,充其才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⑨

元代统治阶层贬斥文士,元宪宗曾问高智耀:“儒家何如巫医?”此语出自帝王之口,可见统治集团对于文士的忽视和文人地位的低下。《元史》又云:“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⑩而唐代帝王则是尊崇儒学的,文士虽然多是落第书生,但他们处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社会地位较高,对前途还是充满自信的。元代文士则不同,他们失去科举入仕的途径,丧失了历代文人的清高与优越感,甚至失去读书人的自尊,当时有些文人不禁喟叹:“余自追念少年血气盛强时所好诸艺皆为无益,幸而不精;虽精于诗,亦复何用?”^⑪这批文士科举无门、仕途无望、生活贫困、心志挫折,于是他们便在杂剧创作中去“寻梦”,借助于状元及第、仕婚两全的士子形象的塑造寄托自己的理想,弥补自己心理上的不平衡,却很少揭露其弊端。

元末恢复科举,并且录取的人数大增。

《元史·选举志》:“元统癸科,廷试进士同同、李齐等,复增名额,以及百人之数。……科举取士莫盛于斯。……下第举人,仁宗延佑间,命中书省各授教官之职,以慰其归。”统治集团对文士采取抚慰政策,以科举为诱饵,笼络人心。随着科举的复兴,元代文人读书做官的道路由梦想变成了现实,很多儒生转而钻研举业,从事杂剧创作的文人逐渐减少,这是导致元剧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唐、元两代作品科举观嬗变的另一个特征是:科举考试在戏曲结构中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成为剧情不可缺少的重要环扣。唐代小说描写科举的作品,如《唐摭言》的一些篇章,主要记载科举文士的奇闻逸事。元杂剧则不一样,如《西厢记》、《倩女离魂》两剧中的老夫人自称不招白衣秀士,所以张君瑞、王文举只有通过科举得了官职才能分别与莺莺、倩女正式结合。科举考试的地位如此重要,因此在剧中甚至可以决定着剧情的发展。

(二)婚恋观。

唐代前期、中期婚恋比较自由,唐代王室中太宗纳弟媳杨氏为妃,高宗以父亲宫中的才人武媚娘为皇后,玄宗强占儿媳杨玉环,武则天公开招面首。据《唐会要》卷六记载,唐代公主改嫁的就达30人。唐末五代此风渐变。《新唐书·宣宗女万寿公主传》:“帝(按:指宣宗)遂诏,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

《北梦琐言》卷五亦载:司徒裴璩以寡女再嫁,时人视为“乱伦再醮”,以此为耻。可见,晚唐五代时贞节观念已逐渐加强。

元朝随着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婚恋束缚有所削弱,这在元杂剧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如《柳毅传书》中龙女再嫁、《张生煮海》中张羽和琼莲私订终身、《西厢记》崔张私会等等。又元代《合汗衫》杂剧依据唐传奇《虢化记·崔尉子》等小说改编而成,两篇作品的女主人公都被强盗霸占多年,而作者都没有视之为“失节”。我们由此可以窥知,元代社会与唐代前期、中期一样,对于贞节的要求都不太严格。

然而,唐、元两代作品中的女性地位则呈现出不同的状况。总的来看,唐代女性地位较低,法律中就规定有“七出”和“义绝”的条文,在这种不公平的社会中出现了很多弃妇。唐代诗人顾况曾有《弃妇词》,对弃妇作过生动的描述:“记得初嫁君,小姑始扶床,今日君弃妻,小姑如妾长。回顾语小姑,莫嫁如儿夫。”唐代灾荒之年,妇女甚至会被当作商品一样转让、买卖,如《太平广记·周迪妻》载:“周迪妻某氏,迪善贾,往来广陵。会毕师铎乱,人相略卖以食,迪饥将绝,妻曰:‘今欲归,不两全,君亲在,不可并死,愿见卖以济君行。’迪不忍,妻固与诣肆。售得数千钱以奉迪。”一般的平民女性尚且如此,妓女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她们在身体和心理上受到双重的凌辱。与她们交往的,除了官吏、商人以外,主要是一些文士,这些文士贪恋妓女的美色,很少平等相待。

唐代小说中的女性(主要指民女和妓女),其命运往往被男性所左右,她们缺乏

自信,性格柔弱,一味地自怨自艾,为了命运而抗争的精神不够强烈。霍小玉与李益欢会之际,“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霍小玉依赖男性、害怕被抛弃的心理是唐代小说女主人公所共有的。《莺莺传》中的张生始乱终弃,莺莺只能赋诗言志,以表怨恨之心。《柳毅传》中的龙女、《韦皋》中的玉箫女、《扬州梦记》中的湖州少女等人,也都具有这种柔顺、善良、痴心而缺乏自信的性格特征。

不过,唐代贵族妇女的地位较高,《酉阳杂俎》前集卷八:“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妒悍”性格的形成,与其地位的高低有一定联系,如果在家庭、社会中毫无地位可言,就很难出现嫉妒、悍泼之妇。《太平广记》卷二七二引《朝野僉载·任瑰妻》有所记载:“唐初,兵部尚书任瑰,敕赐宫女二,女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

元代杂剧对唐代小说女性形象的改造很大,主要反映在平民女性地位的明显提高。试举几例:《莺莺传》中的莺莺出身寒门,在《西厢记》中为相国之女;《柳氏传》中柳氏原为李生幸姬,在《金钱记》中为长安府尹王辅独生女;《李娃传》中的妓女李娃,在《曲江池》中上厅行首李亚仙;《韦皋》中的姜荆宝婢女玉箫,在《两世姻缘》中上厅行首韩玉箫,再生后被荆襄节度使收为义女,等等。李亚仙在曲江池偶遇郑元和便说:“我看那生裹帽穿衫,撒丝系带,好个俊人物也。”并且主动让赵牛筋去喊郑元和:“妹夫,那里有个野味儿,请他来同席,怕做什么?”^⑫唐代小说《柳毅传》中的龙女被钱塘君救回洞庭湖即“入于宫中”,与替她传书的柳毅连个招呼都没打;后来龙女化名卢氏嫁给柳毅,为他生了个孩子,才敢告诉他自己的身份,因为当时女子毫无法律保障,即使像龙女这样出身龙王家族的女性,也害怕柳毅因为她是“异类”而抛弃她。到了《柳毅传书》中,洞庭君夫人与洞庭君同进同出;龙女回到洞庭湖后与父、叔、柳毅

等同席而坐,并大胆唱出“俺满口儿要姻”(第三折)的心理独白。《柳毅传》中的那座“后宫”到了元杂剧中消失了,我们在元杂剧看到的是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家庭生活场景。“后宫”被拆除,表明元代女性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解放,享受到人性解放的自由、新鲜的空气。

《柳毅传》中的龙女实质上是个被遗弃的女子,是唐代无数遭受遗弃的不幸女性的代表,晚唐五代即有人指出龙女的弃妇身份。元杂剧描写的女性则大不相同。《遇上皇》中的刘月仙因为丈夫赵元“好酒贪杯,不理家当,营生也不做,每日只是吃酒”(第一折),因此要找赵元讨休书,改嫁他人,“遗弃”丈夫。由唐至元,被遗弃的角色发生转换,女性地位的改变由此可见一斑。

平民女性地位在元代得到提高的另一方面,就是元曲注重女子之才。《柳毅传》对龙女的才华毫无提及,这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时代使然。其时代风尚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贤妻良母就是标准的女性。《涪溪编事》中,黄崇嘏才华出众,不让须眉,最终只能被男权社会所不容,故黄氏女“归临邛之旧隐,竟莫知存亡焉。”元杂剧对女性的才华开始给予重视,如《张生煮海》第一折,龙女通过琴声理解到张生的心理,如果没有高超的艺术修养,恐怕是很难做到的。难怪侍女要称她为张羽的“知音人”了。从唐代小说到元曲,对女性的要求由一味重色到要求女性才貌俱全,反映出女性作为人的主体价值受到社会的尊重。

(三)市民观。

宋元以来,交通发达,运输便利,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郑若曾说过:“元时海运故道,南自福建梅花所起,北自太仓刘家河起,迄于直沽。”^⑬又,元人马祖常指出:“近年工商淫侈,游手众多,驱垆亩之业,就市井之末。”^⑭商人、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必然带来文学作品中市民观念的加强。从唐代小说到元人杂剧,这方面的差异性有三个方面。

第一,创作主体。唐代小说作家一般

是进士文人,《朝野僉载》作者张翥、《枕中记》作者沈既济、《柳氏传》作者许尧佐、《鞠柯太守传》作者李公佐、《孪娃传》作者白行简、《唐国史补》作者李肇、《广异记》作者戴孚、《灵怪集》作者张荐、《传奇》作者裴 、《集异记》作者薛用弱……几乎都是进士出身,很多人位居高官,《莺莺传》作者元稹、《玄怪录》作者牛僧孺更是官居相位。相比之下,元代杂剧作家地位低微,多为下层文人、商人、医生、低级官吏等。如《真珠船》云:“盖当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中州人多不得为之。每沈抑下僚,志不得伸。如关汉卿乃太医院尹,马致远行省务官,宫大用钓台山长,郑德辉杭州路吏,张小山首领官,其他屈在簿书、老于布素者,尚多有之。”^⑮元曲作家或为书会才人如关汉卿等,或以贾谋生,如施惠“以贾为业”;^⑯文人与市民之间的差别大大缩小,很多元曲作家经商、行医、充任小吏,因此笔者将元曲作家称作市民文人。

进士文人周旋于上流社会,追求高雅、新奇的生活情趣,在唐代小说创作过程中表现为作品以文人、官吏、军将、侠士等作为描写对象,突出地反映了唐代小说作家“作意好奇”的创作特色;元代市民文人作品以商人、妓女、下级官吏、落魄文人等作为表现的重点,反映市民阶层的喜怒哀乐,讲究通俗易懂,口语化倾向比较明显。

第二,人物形象。元代杂剧对唐代小说改编,一个明显的特点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女性形象大胆、泼辣、善良、纯真,具有典型的市民女性的特征,如龙女、刘月仙、李亚仙等人便是其中的典型。刘月仙就责骂丈夫赵元是“辱没门户败家的村弟子孩儿,你每日贪杯恋酒,冻妻饿妇。”^⑰活脱脱的市民口吻。

就男性形象来看,如荥阳生,在唐代小说中没有丝毫的抗争,父亲将他鞭之至死,扔到野外,以至浑身溃烂,乞讨为生,而终与父亲和好如初。到了元曲中,作者对他的单纯、柔弱和没有主见的性格进行了改造。经历风风雨雨之后,郑生由一个柔弱的书生逐渐坚强起来。这主要体现在元曲

对《孪娃传》的两处改动上:一是郑元和不告而娶;二是郑元和剑门遇父,不认父亲。他恨父亲无情、狠毒,置亲生儿子于死地,与父亲“恩已断矣,义已绝矣”。^⑱郑元与唐代小说中那个柔顺的荥阳生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元杂剧赋予了唐代小说的男性形象以更多的叛逆精神。

然而,元曲中的男性主人公也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一些虚伪、油滑、自私、贪色的市侩习气,如从《柳毅传》到《柳毅传书》,柳毅形象的演变即可证明这一点。唐代小说中柳毅替龙女传书,毫无私心,正直、坦诚而不畏强暴,元曲中的柳毅则少了一份读书人的“义行”,多了一点虚伪、重色的市侩习气,他辞婚的理由是因为“想着那龙女三娘,在泾河岸上牧羊那等模样,憔悴不堪,我要他做甚么?”可见他的重色、轻情。

第三,市民平等观念。市民阶层重视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强调个性,反对礼教约束。在他们眼中,君臣观念、等级意识相对淡薄一些。白朴《梧桐雨》比之《长恨歌传》,对唐明皇、杨贵妃的同情成分减弱了,作者把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帝王、后妃作为鞭挞、揭露的对象,甚至设计马践杨妃的情节,惩治杨妃的祸国之罪。《遇上皇》中宋太祖与军人赵元君臣同饮,宋太祖说:“赵元,我也姓赵,你也姓赵,我有心待认你做个兄弟,你意下如何?”这里君臣关系被结义兄弟的平等关系所替代了。在《本事诗·李白》中,玄宗命李白书写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李白醉酒,“(上)即遣二内臣腋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贬夜郎》杂剧中则是玄宗央求李白作诗,“二内臣”变成捧砚的贵妃、脱靴的高力士。这些都可视为元代杂剧中市民平等意识的萌芽。

①本文所说的唐代小说,包括五代作品;下文所列唐传奇篇目,凡《太平广记》所引者皆据《广记》,《广记》未引者注明“某某事”;下文李好古《沙门岛张生煮海》杂剧根据《柳毅传》、《宣室志》·陆颢》改编,所以出现两次。

②《柳氏传》。

③裴 《传奇·孙恪》。

从陈澧《切韵考》论清浊看古今声调

□罗伟豪

一、孙 论清浊是指五音声母

在现代语言学中,清浊是指发音方式的带音与不带音。凡元音在常态语言皆属带音,而辅音则有带音与不带音两类。不带音旧称“清音”;带音旧称“浊音”。①在中国音韵学史上,清浊始初定名所指含混,

《切韵序》“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此中的“浊”、“清浊”不是专指声母的发音方法,而是指韵母或声调方面的语音状况。②《隋书·潘徽传》“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创清浊,才分宫羽。”

此中清浊究竟是指声母、韵母或声调,也很含糊。到孙 的《唐韵序》以清浊用于声母,才开始说得比较清楚。清代学者陈澧指出:“四声有清浊,孙 之论最为明确。”

③此说很有启发,但论证不够确切,当代学者不完全赞同。张世禄认为,陆法言、孙 等所谓清浊系指韵部的分析而言,不是近代那样用以辨别声纽的,也不是魏晋六朝那样用以形容字调的清浊。④罗常培也认为孙 《唐韵序·后论》所言“切韵者,本乎

四声,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仍然含义不明。⑤各家认识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孙 的原文未作细致的分析,因此有必要重新研讨。

《唐韵序·后论》全文为:“论曰:《切韵》者本乎四声,纽以双声叠韵,欲使文章丽,则韵调精明于古人耳。或人不达文性,便格于五音为足。夫五音者,五行之响,八音之和,四声间迭在其中矣。必以五音为定,则参宫参羽半徵半商,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若细分其条目,则令韵部繁碎,徒拘桎于文辞耳。”⑥首句比较明显,四声是指平、上、去、入四种声调,这是唐代文人所亟需使用的。但五音指什么?引述者并不加分析,而把四声直接与下文“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连为一句。误会就从这里产生。陈澧认定孙 所说的清浊指四声,甚至引用《魏书·江式传》所说的“吕静仿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有一篇”,认为宫商角徵羽即平上去入四声,其分为五声者,盖分平声清浊为二也。⑦把“平分阴阳”推至魏晋,似属主观臆测。张

④《柳毅传书》第一折,《元曲选》本。

⑤⑦《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

⑥《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

⑧《元史·彻里帖木儿传》。

⑨《宋元戏曲考》之九《元剧之时地》,见《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⑩《元史·高智耀传》。

⑪戴表元《剡源文集》卷八《张君信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⑫⑬石君宝《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第一折、第四折,《元曲选》本。

⑭《郑开阳杂著》卷九《海运图说》,文渊阁《四

库全书》本。

⑮《石田文集》卷七《健白一十五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⑯《真珠船》,转引自《剧说》卷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八。

⑰《录鬼簿》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⑱《好酒赵元遇上皇》第一折,《元曲选外编》本。

作者程国赋,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510632)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世禄认为孙 说的清浊是指韵部的分析,仍然不够具体。《切韵》一些韵部内各个小韵之间有韵母的洪细与开合的差异,有的没有介音,有的有 i 介音、u 介音或 iu 介音。孙序说:“若细分其条目,则令韵部繁碎。”因此《切韵》不少韵部都是洪细、开合同部,如东、支、脂、齐、佳、皆等。但《切韵》也不是每一个韵部都有开合洪细的不同的,例如冬、钟、江、之、鱼、虞、模等都只有一个韵类,不存在等呼对立,因而序文所说“各自有清浊”的“清浊”就不是指等呼的对立,而应该是每一个韵母所具有的声母的发音方法的分别。过去对此尚未充分理解。

“必以五音为定,则参宫参羽半徵半商,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张世禄、罗常培在引述时完全忽略了前二句,陈澧却把“五音”改作“五声”,并认为序文所说“宫羽徵商即平上去入也”,而“平上去入各有清浊”。⑧“音”改“声”,一字之差,混淆了声母与声调的概念。这就是致误的关键。笔者认为,唐宋时代广泛使用“五音”术语,

《唐韵序》有“纽其唇、齿、喉、舌、牙部作而次之”的话,孙序撰于天宝十年(公元 751 年),后 50 年有《元和韵谱·五音声论》,后又有《玉篇》末附沙门神珙所撰《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其中“五音之图”用宫商角徵羽称代并描述喉、齿、牙、舌、唇五音。宋代

《韵镜》以此五音及舌齿音作为定格归纳的字音,《七音略》以宫、商、角、徵、羽、代称喉、齿、牙、舌、唇五音,再加半徵代称半舌,半商代称半齿,号称七音。《切韵指掌图》使用 36 字母,与五音对照:角,牙(见溪群疑);徵,舌头(端透定泥)、舌上(知彻澄娘);羽,重唇(帮滂并明)、轻唇(非敷奉微);商,齿头(精清从心邪)、正齿(照穿床审禅);宫,喉(影晓匣喻);半徵半商,舌齿

(来日)。《唐韵后序·后论》“必以五音为定,则参宫参羽半徵半商”是指《切韵》每个韵部之内的各个小韵分属于五音声母,声母的排列是各发音部位互相参间。“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是指喉齿牙舌唇五音声母各自有清声母和浊声母,而不是直接指

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各自有清浊。“五音”是指发音部位,“清浊”是指发音方法。“参宫参羽半徵半商”与前文“纽其唇齿喉舌牙部作而次之”是同义错综,“参宫参羽”是“参宫参商参角参徵参羽”的省称,“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是唐宋时称七音声母的通行术语,因此下句的“清浊”应说是清声母和浊声母。《韵镜》以“滂敷透彻溪清穿”为次清,以“并奉定澄群从邪床禅匣”为浊,以“明微泥娘疑喻来日”为“清浊”(次浊),充分体现了《唐韵序·后论》关于“五音各自有清浊”之说。陈澧“四声有清浊,孙 之论最为明确”的说法不准确,实际上是“五音有清浊,孙 之论开始明确。”

四声分清浊在唐代尚为时过早,而宋元以后语音的发展趋势是声母的清浊转变为声调分阴阳。陈澧对《唐韵》四声分清浊的认识虽有疏漏,但他对清浊与四声的关系有卓越的见解。江永《音学辨微》云:“平有清浊,上去入皆有清浊,合之凡八声。”陈澧深表赞同并有所发扬:“江慎修《音学辨微》云有清浊合之凡八声。桐城方以智以翻啞上去入为五声,误矣。盖上去入之清浊方氏不能辨也。澧谓上去入之清浊不能辨者甚多,不独方氏为然,皆由其方音如此,不可以口舌争。”⑨陈澧能利用现今方音与古音有别,不以今律古。例如,中古全浊声母上声现今多数方言都变为去声。刘鉴《切韵指南》自序云:时忍切肾字,其蹇切件字,其两切强字,皆当呼为去声。陈澧以为此说不妥:“上声之浊仍是上声,非去声也。”⑩

汉语从中古到近代,声母的清浊引起了声调分化。江永的“清浊合之凡八声”是指中古平上去入四种声调,每一种声调都分化为两个调类,古音清声母演变为阴平、阴上、阴去、阴入四个调类,古音浊声母演变为阳平、阳上、阳去、阳入四个调类,中古的四声发展为近代的八声。从汉语方言的总体看,阴清阳浊的八声理论切合实际,现今各方言皆有不同程度的对应。客家话有六个调类,平声入声皆分阴调阳调,上声去声则不分。闽语有七个调类,平上去入皆

分阴阳调类,上声不分。吴语有八个调类,平上去入皆分阴阳,阴调类清声母,阳调仍保存古音全浊声母,对应最完整。粤语有九个调类,平上去都分阴调与阳调,入声分上阴入、下阴入、阳入,古声母的清与浊转变为今声调的阴阳两大类,对应关系也非常明显。从现今广州音的阴调类字可推知古音是清声母,从阳调类字可推知古音是浊声母。东字德红切,反切上字德,广州音阴入,古音是清声母,被切字东读阴平而非阳平。隆字力中切,反切上字力,广州音阳入,古音是浊声母,被切字隆读阳平而非阴平。陈澧说:“切语以上字定清浊,不知上去入各有清浊,则遇切语上字用上去入者,不辨所切为何音。”^⑪古音上去入当中,声母的清与浊可运用现今广州音的阴阳调类来分辨。

二、《切韵考》分辨清浊,贯通古今,适用于方音调查

陈澧说:“清浊最易分者也,如天,清;地,浊。人人能分。”^⑫又说:“今人于平声清浊,皆能辨之;上去入声之清浊,则多囿于方音而不能辨。切语之法,以上字定清浊,不辨清浊,故不识切语。”^⑬陈澧运用反切系联法把《广韵》的反切上字分为40类,他在考定声类时有一项重大贡献就是分辨清浊,他把《广韵》的反切上字分为清声21类,浊声19类。每类取平声字为首,首字清则系联一类皆清,首字浊则系联一类皆浊。声类的排列以反切上字在《广韵》中所见之先后为次序,但严格分别清声与浊声。例如:

东,德红切。德,列于清声第一类“多”。

同,徒红切。徒,列于浊声第一类“徒”。

中,陟弓切。陟,列于清声第二类“张”。

虫,直弓切。直,列于浊声第二类“除”。

终,职戎切。职,列于清声第三类

“之”。

陈澧在保持《广韵》原来次序的基础上把声母划分为清浊两大类,泾渭分明。古音声母分清浊与今音调分阴阳相对应,贯通古今,适用于各方言。以广州话为例,《广韵》切语上字清声21类,恰巧对应于阴平、阴上、阴去、上阴入、下阴入五个调类;《广韵》切语上字浊声19类,恰巧对应于阳平、阳上、阳去、阳入四个调类,实为“自然之天籁”。下面举《广韵》全部反切上字与现今广州音作比较。^⑭

甲、清声240字

阴平:多丁都当冬张知猪徵中追之章
征诸支占脂抽痴苏桑相思司斯私虽辛须胥
先居俱规公兼姑佳康枯牵空谦丘墟祛窥羌
钦倾区驱方卑并封分兵陂敷孚妃芳披峰丕
昌充春於央伊依衣忧纡乌哀安烟翬仓苍亲
迁青粗千雌他通天台汤将资兹遵臧呼荒馨
呵香羲休兴虚边巴滂山疏沙生书舒伤商施
诗初创疮叉刍庄争邹簪(粗、疏、沙原文繁体各含二字)、

例外:台滂,今读阳平。

阴上:止煮旨楮褚丑耻写九举纪几古
诡口楷苦起绮岂府甫鄙彼抚处取采此土吐
子姊祖虎火海朽况许喜补普数所史矢赏始
楚阻

例外:吐况,今读阴去。

正素过去畀爱醋借醉布譬试厕

例外:畀,今读阴上。

上阴入:得德陟竹职敕速悉息吉必笔
拂叱忆一握挹七即则北匹色失式识释测侧
仄

下阴入:卓各格客恪诘尺赤乙谒托作
佰百博

乙、浊声208字

阳平:徒同唐堂田陀除场池治持迟锄
鬻床豺崇查雏如儒人而儿余馥予夷羊营移
于云王韦荣为筠文无巫明弥亡眉绵模漠摸
渠强求衢其奇房防平皮符苻扶便冯毗浮卢
来林良离郎胡乎侯黄何才徂前藏秦慈情蒲

裴傍鱼疑牛宜危俄吾研虞愚奴那时殊常尝
臣承成尼拿徐祥详辞旬随神乘（“余”、“辞”
原文繁体各含二字）

例外：治，阳去；于，阴平；韦，阳上；摸
毗祖，阴上。

阳上：伫柱助汝耳以与羽雨永有远洧
美武靡母臼婢吕里鲁语拟五乃奶市女似

阳上变阳去：杜丈士仕俟巨父户下在
渐部是氏视

阳去：度地望慕具暨附赖练匠自步遇
内署寺

例外：暨，阴去；署，阴上。

阳入：特直宅翺弋翼悦莫缚弼落洛勒
力昨酢疾薄白玉诺蜀植殖穉夕食实

例外：缚，下阴入。

《切韵考》在韵类考中把各个韵部分为
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取《广韵》每一音之第
一字，以其切语上字声同类者直写之，下字
韵同类者横写之，平上去入相承编排为表，
每一韵表之中都分列清声与浊声两大系
列，这也是独具匠心，简明扼要的，反映出
古今声调的变化发展。清浊在《切韵》中本
属于声母类别，但在韵表按清与浊归类，自
然而然就转变为声调的类别，所谓清浊共
八声，皆由此体现。古声母的清浊与今声
调的阴阳水乳交融，“清声”就是“阴调”，
“浊声”就是“阳调”。古今声调，可分可合，
四声分作八声，一目了然。

辨清浊的理论尤其适用于广州话音。
陈澧在《广州音说》一文中说：“广州方音合
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约有数
端。余，广人也。请略言之。平上去入四
声各有一清一浊，他方之音多能分上去入
之清浊。如平声邕，《广韵》於容切；容，余
封切。一清一浊，处处能分。上声拥，於陇
切；勇，作陇切。去声雍，此雍州之雍，於用
切；用，余颂切。入声郁，於六切；育，余六
切。亦皆一清一浊，则多不能分者。福建
人能分去入清浊，而上声清浊则似不分。
而广音四声皆分清浊，截然不混。其善一

也。”^⑮陈澧有一部重要著作《切学编·音
学》，第一卷就介绍了四声清浊。开宗明义
说：“平上去入四声各有一清一浊”，“医、
倚、意、忆、怡、以、异、翼；腰、夭、要、约，遥、
鵝、耀、药。十六字熟读之，类推于他字。”

“读此当用粤音，他处音但能辨清浊，多不
能辨上去入清浊也。”“粤音入声有两清一
浊。如必，清；鳖，亦清。别，浊。”^⑯陈澧熟
悉广州音，凭“自然之天籁”，明确分辨《切
韵》声类和韵类中的清与浊，丰富和发展了
江永清浊共八声的理论，为我们审音与考
据相结合作出范例。

①罗常培《切语音韵导论》释清浊。

②参看洪诚《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转
引自罗常培《切韵序校释》王国维《观堂集林》唐
兰《论唐末以前的轻重和清浊》等文。

③⑦⑧⑨⑩⑪陈澧《切韵考》（成都书局1929
年版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本）卷六。该书又见于
番禺陈氏《东塾丛书》第五册第六册《切韵考》，第
七册《切韵考外篇》。

④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上册第四章。

⑤《切语音韵学导论》第42页。

⑥据黎庶昌校札古逸丛书覆宋本《重修广
韵》摘引，并参证刘复《敦煌掇琐》钞刻法国巴黎
国家图书馆所藏王仁翱《刊谬补缺切韵》，均见于
北京大学出版社《切韵汇编》。

⑫《切韵考外篇》卷三后论。

⑬《切韵考》卷二声类考。

⑭反切上字据《切韵考》卷二清声21、浊声19
类摘引。广州音是作者调查考定的。

⑮《东塾集》卷一第27-29页，光绪壬辰刊
成。羊城西湖街刊印；又见于台湾海文出版社影
印本第80-83页。

⑯陈澧《切学编·音学》原稿，现藏于广东省
中山图书馆特藏部善本室。咸丰五年乙卯（1855
年）写成。同治六年丁卯（1867年）作序欲重刻。

作者罗伟豪，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
教授（10275）

责任编辑：陶原珂

也 论 客 家 精 神

□张应斌

近几百年来,客家已逐步成为推动中国进步、东南亚发展,乃至影响文明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客家民系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精神风貌,日益引起世界有关研究界的注目。

但是,目前人们对什么是客家精神,却因理解不同而众说纷纭。有的理解为政治激情,说“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有的归纳为“崇高、自豪”;有的着眼于其消极阴暗面,忽视基本主流。对此,实有正本清源之必要,虽然正如歌德所说:“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①

一、客家精神的实质

有人认为,客家是中华民族中汉族人的一部分,汉族人的优点客家人有,汉族人的缺点客家人也有,因而否认有特殊的客家精神存在。其实,这种观点是不了解客家精神的实质所致。

客家人固然是汉族人,但客家精神并不是一种民族精神。客家之所以是客家,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所处的客居环境和特有的迁徙命运。客家精神的实质,是他们在新的入地关系条件下所形成的独特的生存精神,她虽然与原来的文化传统相联系,但又是在不断迁徙的新的生态环境中形成、并与生存和生命等基本问题相关的独特精神。

一般说来,人的精神总是与特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有关的,是具体的人地关系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生存环境的独特性造成人之精神的独特性的例子并不罕

见。《礼记·地官·大司》云: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泽之民黑而津,丘林之民专而长,坟衍之民皙而瘠,原隰之民丰肉而庠。^②地域不同,人的特征便不同。司马迁更具体地论述过秦汉时期不同地区的人的不同性格:齐国“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这是管子、晏子的故乡;邹鲁之地则“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齷齪”,这还可以看到孔子的影子;而楚之地“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尚有项羽遗风;梁宋之地“厚重多君子,好稼穡”,曾产生过先秦的农家学派。^③造成人的这种地区性格类型的原因,古人有多种说法。管仲认为其原因在水:“失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洿,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汙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④也有人认为其原因在土壤:“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小,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⑤甚至把土作为基本的生命结构要素,把它推广到一切生命形式中去。唐代孔颖达也说:“民之所生,皆因地气;所感不同,故形类有异”。^⑥可见,古来已有不少人认识到人的群体性格类型与地理因素有某种对应关系。

当然,把造成人们不同性格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水或土,是片面的、直观的,但是,这已隐含了把地球自然系统与社会人文系统相联系的光辉思想。这种古典的人地关系说,是我们现代研究人地关系的起点。从现代科学角度看,人类是生物机体与文化活动的产物。一定地区的地表系统

不仅是人们的生存空间及其人文系统的地缘背景,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人类的生态环境和生存资源,必然决定着人们的衣食方式、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比如,一个地区的食物资源量等自然因素,便会决定着人们获取食物的方式和生活态度。即所谓:

“处沃土则逸,处瘠土则劳,此系乎地者也。”(张衡《西京赋》)自然的生态系统,必然对人们的精神系统发生作用和影响,因而,地域的差异性不仅带来人的种族、肤色、头发、眼睛等自然机体的差异性,而且也带来人们心理、情绪、性格、精神和文化行为的差异性。这并不是宣扬唯地理决定论,而是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和精神发展的客观影响。

客家的形成是在天文、地理对人类社会发生影响而产生历史的沧桑巨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公元100年至600年期间、公元1050年至1300年期间和1600年至1850年期间,在天文系统上出现了太阳黑子增加、九星汇聚的地心张角小于70度的天体变化,它直接影响到地球表面系统,使地球干旱寒冷,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这天地巨变使大漠南北又干又冷,草原干枯,牛羊死亡,从而使游牧民族无法生存,他们便跨上马背四处掠夺。公元四五世纪的低温使北匈奴的铁蹄踏遍欧亚大陆,它的直接后果是使古罗马灭亡。在东亚,几次地球低温,相继驱使“五胡”、辽、金、元、清挥戈南下,大举入侵,从而一再改写了中国的历史。^⑦客家就是在这种天地巨变中,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形势下,伴随着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历史脚步,被迫流落到东南为“客”的。但当时从北方逃到江南的人很多,有的身为官僚,如东晋渡江的流亡政府官员;有的占据肥田沃地,处境优渥,变成了新土著;只有那些流落到穷困山区,并且不断迁徙、艰苦求生的人才成为客家人。是天、地、人的巨大变化产生了客家,是穷困山区的人地矛盾产生了客家精神。客家精神是在天灾人祸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原汉人大批流亡成为他乡之客的生存情境中,在新的人地关系中形成的文化精神。

她的实质是人在客居的艰苦条件下仍坚持较高的价值取向的精神品质。

二、客家精神的成因

从语义上说,“客家”是与“土著”相对而言的。它原本是土著称呼刚来的“外来人”的自然口语,其含义即“外来的人”。辞典上“客而家焉”的解释,^⑧反而让人觉得生硬牵强,太学究气了。南朝谢灵运幼丧父后寄养在杜治家,被称作“客儿”;李白之父客居四川江油,被当地人叫作“李客”;中国土家族开天辟地神话中有“土家人”、“客家人”,“土家”即土著自己,“客家人”即外来人,“家”只是附加性词缀。当时官方对“客家人”的正式称呼叫“侨人”,《隋书·食货志》云:“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即是。但不管被称为“客家”或“侨人”,他们都是在丧乱南奔的岁月里离家逃难,客居他乡的人。因此有人说,客家人是一个流离颠沛者的指称,是对这批离乡背井的外来人不幸命运的简洁而直观的概括,客居的侨民性是其生存状态的基本特征。

客居他乡的处境对客家人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心理上。客家流落他乡是迫不得已的,而非自主性的选择。他们离开故土,不仅仅失去了土地、房屋和财产,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精神上的安定感和故乡的依托感。土著之于故乡,人地关系是协调的,故乡不仅是生他养他的衣食之地,而且是形成其性格、文化和心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与周围世界和谐自由而充满自信。相反,一个离乡背井的人,常常会丧失内心的根源感和行动的自信心,陷入情绪的焦虑和迷惘。丹纳说:“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⑨乡土对人的精神的烙印是刻骨铭心的。客家人走上迁徙、漂泊之路后,失去了心灵上的精神家园,失去了安土重迁、安贫乐道的精神气韵。有的客家人,因流寓的心理惯性,一而再地迁徙,便是明证。

客居命运对客家人最大的影响还在经济生活方面。客家人的祖先原来生活在华

北,华北平原的深厚黄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客家离开祖宗故地,失去了良好的生存区位和生存资源,他们能够落脚的地方大多是人烟稀少的穷乡僻壤。以客家人主要聚居地——五岭山系周围的赣、闽、粤边区而言,这在客家来到之前是一块尚待开发的地方,古人视之为“瘴疠之地”,除了古人望而生畏的莽莽丛林、毒气蒸天、蛇蝎猛兽横行之外,这些沙质山地土壤瘠薄、荒凉贫乏、交通困难,生存资源和生存区位都与其故土形成巨大反差。客家选择山区立足,也只有在封闭型的山区地理中生活而未被土著同化的人群才是客家,从而形成“逢山必见客,无客不居山”的客家生存格局。以出洋客家人的生存境地看,与国内客家人也很相似。如客家人众多的新加坡,在19世纪初还是一派蛮荒。瘦瘠的土地,贫乏的资源、荒凉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客家生存境况的主要特色。以五岭山系周围的山地为例,地域的贫困和人地关系的冲突对客家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使在山区以农为生的客家人耕作更为辛劳,生活更为艰苦;他们不得不用加倍的体力去劳动,更为勤劳俭朴地度日。生态环境的变化导致其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变化。二是贫困的山地不能养活大量的客家人,使他们又处在艰难、动荡之中,而高出山地的文化视野和近海的地理位置驱使他们中一部分人出洋谋生,使他们由国内侨人变成国际侨民,使客家人的侨居生涯延伸到世界文化的宏大背景上。

客居命运对客家人精神的影响还表现在社会生活上。客家人入居异地,必然需要占领生存空间,从而引起生态上的压力增加、生存竞争加剧。国内客家历史上死伤几十万人的土客大械斗,客家被辱称为“鬻家”,客家历史上具有防卫功能、坚如城堡的住房——土楼,等等,都足以说明当年客家受歧视的程度和社会环境的险恶。历史上,海外客家的生存境况更为恶劣。有的国家排斥华侨,“专征诸华人之税最奇”;^⑩在有的国家里,华侨“遭土人虐害”,惨案不断发生;清朝时除了在新加坡可以设领

事保护华侨外,在其余英属岛屿“不能设领事,徒知民艰,无缘保护”。^⑪总之,客家意味着离乡背井,意味着在贫瘠和艰难中迁徙和颠沛,意味着在侵入他人领土时的白眼,客居的处境和飘荡的命运是客家生涯的主要内容。但是,客家人没有向命运屈服,他们在艰难中奋起,在逆境中奋争,把生存危机当作激发创造力和激励客家精神的因素。

三、客家精神的内涵

黑格尔说:“精神的历史就是它自己的行为,因此精神仅仅是它所做之事”。^⑫客家精神也不是抽象的,它是一种与生存行为和实践活动紧紧相联的意识状态和意志力量,它是客家人在客居情境中以其生存行为表现的精神。客居的生存需要决定了他们的活动方式,他们的活动结构决定了他们的精神结构,它与客家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直接相联。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中国文化是建立在稳定平和、周而复始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化,随季节而动的泥土劳作和其它农业耕作的物态特征形成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心理和务实保守的性格,即《周易·系辞下》所谓的“安土敦乎仁”,这与开拓、冒险的进取精神迥异。但是,客家的生存环境变了,他们必须面对荒凉贫瘠的自然条件和与土著矛盾冲突的社会环境,必须以拓荒者的文化心态和性格去迎战艰难困苦,才能面对生存的困境和压力。“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⑬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法则。事实上,具有中华民族刚毅性格、受过中原文化传统熏陶的客家人,在客居的困境中没有消沉,他们“穷则思变,困则谋通”,^⑭积极向上,开拓进取,在生存危机中奋发图强,开创了一条新的客家人生之路。客家的人生进取之路主要有两条:一是大兴文教、发愤读书。贫困地区的客家人衣食难保,兴学读书谈何容易?但是他们认识到,在当时国内封建主义制

度条件下,只有兴学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社会地位。因此,客家人愈是贫穷愈是更坚决地送子女读书,读书的也能拼命发愤,历尽艰辛,只为将来有个好前途。这是一条以文治贫,以学翻身的进取之路。所以,客家之乡读书成风。以梅州为例,自清以来,这里进士、举人之多,远远高出同类地区,被誉为“人物为岭南之冠”,康有为称:“嘉应先哲多上词章”,梅州的教育普及率也被称为“在中国为最”,^⑮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也于1898年在梅州开办。因此,梅州素有“人文秀区”“文化之乡”“历史文化名城”等美称。

第二条进取之路是跨海出洋。客家的侨民性使他们拥有远远高出山地水平的文化参照系,他们的胸怀和生命创造力使他们把发展的目光投向山区外的世界,投向蔚蓝的大洋彼岸。闽、粤一带的客家人把妻儿老小安顿在客居地以后,常常“束一条裤带出门”去闯世界,以“一条扁担挑天下”的精神开创事业、拓展生存空间,这是一条以商治贫、以实业救贫、向海洋进取的发展之路。客家民谚:“胆大飘洋过海,胆小死守家门”,“宁愿出门做到死,不愿在家吃老米”,就表现出内陆农业民族少有的开拓进取精神。

客家人奔向海洋,对中华民族有巨大的历史意义。黑格尔认为,大海是激励人们向外发展的自然因素,“奋发有为的一切大民族,他们都是向海洋进取的”,相反,禁止航海的民族,精神迟钝保守,“并深深地陷于最可怕的最可耻的迷信中”。^⑯客家人走向大洋彼岸,比内地中国人接触欧风美雨早了几百年。在“天朝上国”闭关自守的岁月里,客家已用异域空间和异质文化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悄然无声地把自己的发展与海洋与世界联系起来。在当时客家优秀的男性中,不是发愤读书,就是飘洋出海,形成客家发展史上的两个创业模式。侨居的精神是现实逼出来的,是一种战胜苦难的彼岸精神,“彼岸精神是凌驾于实际心情之上的精神力量”,^⑰客家人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开创未来、谱写客家的生存

和创业史的。

(二)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中华民族素有吃苦耐劳的美德,客家人到山野僻地之后,严酷的生存环境使这种精神得到更充分的发扬。客家人深知,仅有开拓进取的人生价值取向还不够,还必须有刻苦耐劳、不畏艰辛的坚韧品格,理想才能实现。英国古典经济创始人威廉·贝第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勤劳是财富之父。客家人既无法拥有肥田沃地,就只有加倍勤劳。客家人的勤劳与吃苦精神在客家妇女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汉族是农业民族,有人称他们是最热爱耕作的民族,“一个中国人就是一棵树,离不开泥土,而且紧抓着泥土,根深蒂固”。^⑱客家人定居下来以后,首先想到的依然是以农业为生计,但是,由于客家男人不是读书就是出洋,全部农活和家务的重担便都落到客家妇女身上。客家妇女既要像内地男子那样独力承担户外大田耕作、挑担等重体力劳动,又要像内地女子一样操持家务,抚养子女,孝敬公婆。丈夫出洋的妇女更为艰辛,还几十年如一日忠贞不渝地等待丈夫归来。客家妇女以惊人的吃苦精神赢得了四方传扬的美誉。

客家的吃苦耐劳精神还表现在出国华侨身上。出洋的客家人,许多是以“猪仔馆”出去开矿做苦工的,他们所干的活多是他人“所不屑者而华人为之”;“园主虐待华工,往往终身为奴”;^⑲而且“华人无缘无故地经常遭受毒打和抢劫”。^⑳但是他们流落到哪里,就在那里生根。他们以“华人勤而耐苦”、“不惮劳苦”而著称于异邦;被称赞为“最好不过的工人”,“尽管受尽苦难”,却从不“灰心馁志”,顽强而坚毅地生存着,以自己的血汗为东南亚的开发,为其它侨居国的历史进步做出了贡献。他们“番邦挣钱家乡使”,把资金和技术带回故乡,为父母之邦的发展贡献力量。客家人是在忧患中奋发的典型。

(三)报本追源、爱国爱乡的精神。客家的这种精神既与中国古代报本追源的人文传统有关,又与他们离乡背井的心理情

境直接相联。

客家的开拓和苦干精神源于他们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而爱国爱乡精神则源于他们客居的心理需要。一个从未离开故土的人,难有故土之思;没有离开过故国的人,也难有故国之情。客家人虽然远离故乡,或远离故国,但他们却不能忘记自己的人文本源,在特殊心理情境中,爱国爱乡之心反而更浓更切了。这种精神首先表现在他们的故乡情感和祖源意识上。客家人远离中原故地至少也有几百年了,但是他们一直以自己是中原人的后裔而自豪,客家的堂联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形式。在客家地区,堂联是一种普遍的文化景观,千家万户的大门上都有鲜艳夺目的堂联。例如,李姓陇西堂的堂联为:“陇西世泽,柱史家声”,把显赫有名的祖宗和祖居地写在大门两边。从表面上看,“山东世泽”“河南世泽”之类的堂联不过是魏晋门阀士族阀阅之风的遗绪,被人理解为客家人以祖宗的望族在汉代的郡属为自豪的心理;甚至被人误解为客家人都是中原华堂贵胄、衣冠士族的子孙。其实,在现代中国,郡望文化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殆尽,以郡望为自豪的现象在其它地区已经很难看到了。客家人的堂联固然有龚自珍说的“婚姻必书汉郡”之迹,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等同于郡望文化,这种特殊现象有其特殊的内在根据,这就是客家客居异乡的心理情境。堂联是客家人身处异乡而又心系故土,对祖源念念不忘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堂联上的故乡和祖先,并不仅仅是他们的历史渊源,而更主要地是他们的“精神故乡”,是他们心灵深处精神家园的外化和实体化,

是他们在自己的本源王国里的神游。他们通过这种古老的形式来表达一种实际的客居心境,以祖源意识和乡土情怀的精神魅力来构造一种居室文化环境,不仅使自己能悠游其中,也以此来教育子孙,熏陶后代。

①陈代熙等译《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②⑥《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02页。

③《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管子·水地》。

⑤《礼记·礼运》,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⑦参阅蓝勇《从天地生综合角度看中国文明的东移南迁的原因》,《新华文摘》1996年第3期。

⑧《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0页。

⑨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

⑩袁祖志《瓯海采问纪实》。

⑪张荫桓《三洲日记》。

⑫⑬⑭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52页、第246-247页、第360页。

⑮《周易·系辞下》。

⑯王弼《周易·困卦》注。

⑰(美)《美国百科全书》,转引自《客家研究辑刊》1993年第二期第88页。

⑱容闳《西学东渐记》。

⑲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

⑳(德)亚历山大《1871年漫游世界记》。

作者张应彬,广东梅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514000)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访博士生导师陆贵山教授

□卢铁澎

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体系,在新时期以来一直是文艺理论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也是当代文艺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为此,人们对这一课题不停地思考与探索,并且做过建立体系的种种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已见到的成果来看,存在的不足与问题不少,任务远未完成。陆先生,您目前也正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是否可以谈一下制约着这一课题研究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陆:当代文艺学体系的构建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当繁杂,比如“中国特色”问题、方法论问题……等等。但我认为,首要的、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在于哲学基础。哲学基础是各门学科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具体地说,它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两个方面给具体的学科建设提供理论指南。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有什么样的文艺观,哲学基础决定着文艺观的本质特征。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同时就是哲学家,他们的文艺思想是其哲学观的组成部分,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即使以作家身份名世的文论家,其实有不少也是思想家,从他们的文论中不难看出其哲学基础,如歌德、雨果、巴尔扎克……。就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艺观,仍然是或以科学主义或以人本主义或以多种交融的哲学为基础形成,并随着相应的哲学思潮的兴衰更替而消长流变的。萨特的文艺观最典型,你要弄懂他的艺术论,如为什么说艺术是“由一个自由来重新把握世界”?就不能不把握“自由”这一概念的存在主义哲学内涵。只有明白了他的哲学思想,才能领会他的艺术观,也才能看懂他的独幕剧《禁闭》和其它作品。西方如此,中国也不例外。没有

仁学这一哲学基础,便没有孔子的文艺思想,老庄的文艺观则离不开“道”这一哲学根基。以后从刘勰、钟嵘到王国维、鲁迅直至新时期以来乱花迷眼般的种种文艺观,主要的区别或联系,就决定于各自秉持的哲学基础。1984年第10届国际美学会议预定的中心议题便是“艺术对哲学的改造”,讨论之后大多数与会者得出这样一个共识:在任何意义上,哲学观都总是革命性地决定着艺术观的产生,哲学基础决定性地支配着当代文艺学体系的构建。

卢: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形形色色文艺思潮的引进,形成“方法论热”、“文学主体论热”……等等,文艺观念在“更新”的名义下渐趋多元。在这种多元趋势中,当代文艺学体系应建构于怎样的哲学基础上呢?

陆:如果说文艺学体系像一座建筑物,哲学基础就是它的地基和框架。没有坚实牢靠的地基和框架,高楼大厦就不能拔地而起和稳固安全。只要走出无知与偏见的藩篱,就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科学性、正确性和生命力远远优于历史的、当代的所有哲学体系,这是迄今为止的实践所证明的。所以,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建设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多元趋势的形成是新时期我国文艺理论界充满活力和生机的表现,但由“方法论热”发端的多元趋势有两种流向,一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前提下具体方法的多样化,有多样的选择,这种“多元”是健康的、正常的,应该肯定、鼓励的;一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最高层次的哲学原则的多样化,也就是所立足的哲学基础不同的“多元”。诸如表现主义的、直觉主义的、存在主义的、生命哲学的、分析哲

学的等等。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文艺观的合理成分“拿来”，为建设我们的文学所用，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有人从政治和哲学的意义上提倡无主元的多元，淡化以至消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有的随意夸大某一建构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文艺观，并将其崇奉为包容和涵盖文艺本质所有层面的主宰，刻意上升为独元，排斥他元，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元。多元趋势的形成固然是对过去冠以“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文艺观独元一统天下的历史的反拨，但不能矫枉过正，拒斥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主元。我们提倡多元，但多元又应统一，要理顺多元与主元的关系。无主元的多元和无多元的主元均不可取。前者可能陷于疏离和混乱，甚至滑向自由化和自流化；后者容易导致单调、刻板、狭隘，甚至造成禁锢。多主元即无主元，无多元即独元，都从不同的极端扰乱和破坏文艺的有序结构和合理布局，不利于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体系的构建。

卢：的确，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构建中国当代文艺学体系的哲学基础。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理解，存在着人言人殊的“多元”现象，有人说是“辩证唯物主义”，有人阐释为“历史唯物主义”，有人坚持“反映论”，有人主张“实践论”，有人强调“价值论”，此外还有“生产论”、“审美论”、“意识形态论”等等观点。对这种现象，您是怎样看的？

陆：首先应当从大视角和宏观把握、辩证分析着眼，强调和突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总体性和一体化原则。因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观点、方法和原则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没有理由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持有不同观点的各个学派所强调和突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内容和层面，都应当放在哲学基础的总体性和一体化原则的大视角中审视和整合。前述各种观点都从各自独特的角度和层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某个或某些侧面

的问题，对于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和研究视角探寻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理论原则都是有益的。这些观点之间的关系既相异又统一；既互逆又互补。从本质和深层的意义上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是相互丰富和推进的。正是各种学派不同论点的竞赛和论争，撞击出真理的火花，对论争双方给予深刻的启示，才会逐渐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全面、整体的把握和理解。我相信，凡是具有真理性的思想观点最终会走到一起，形成有主导的统一的格局。我们要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补充的原则，允许并提倡不同学派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的指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深入开掘和拓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探讨。

其次，由于历史时空的变化与主体的不同，哲学内部的研究重点可以转移，可以从本体论转到认识论，从认识论转到实践论或价值论，等等。但，转移不意味着后者取消前者，因为它们都是哲学学科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拿其中某一重点作为哲学基础的重点构建具有个性特色的文艺学体系，但不应绝对化，将自己视为唯一至上的体系，否定以马克思主义其它重点作为哲学基础重点的文艺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我们提供的是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它与别的哲学不同的是其科学性、实践性和发展性。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切忌将它视为黑格尔自诩的那种“绝对真理”式的哲学体系。如果不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会成为恩格斯拒绝承认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者”。

再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完整、彻底的把握，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多侧面、全方位、立体感地对这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进行切实有效的探讨，才能将它推向纵深，导向前进，为全面、深刻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料。

作者卢铁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博士生（100000）

责任编辑：陶原珂

宋庆龄研究中的重大成果

——《宋庆龄辞典》评介

□吴淑珍

1996年10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张磊主编的《宋庆龄辞典》。它是在总结《孙中山辞典》编写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吸取了《孙中山辞典》的许多优点和长处,补充了其某些不足。从选题到具体操作都有很大改进,条目质量、版面设计、印刷、纸质等方面也有所提高。应该说,它是一部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可读性的佳作。

《宋庆龄辞典》内容全面,充实而不乏重点。全书67万字,收入辞典正文的条目1073条,按其内容分为宋庆龄著作、历史文献、人物、政治制度机构事件、文化教育、军事、中外关系、思想理论、会社党团派系、报刊、史迹纪念场地和其他12类,力求全面如实地反映宋庆龄的思想和实践,与宋庆龄有关的人和事,有关研究宋庆龄的机构、团体和个人及宋庆龄文集等。

本书既注意内容的广泛性、全面性,又避免面面俱到,着力突出重点。其重点放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坚持和捍卫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致力妇女运动,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在国际活动中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人类幸福所作的贡献等方面。通过条目的介绍,再现了宋庆龄的革命风范和崇高品格,使人们更加坚信:宋庆龄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领袖;中国少年儿童的慈爱祖母;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久经考验的前驱。

《宋庆龄辞典》既客观真实,又具有科学性。辞典的编写方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力求全面如实地反映宋庆龄的思想

和生平事迹。要求条目撰写要以准确、翔实的史料为根据、广泛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作出客观、公正的评述。编者邀请广州、中山、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专家、学者、行家撰写条目,从而保证了辞典的质量。辞典基本达到了原定的写作宗旨和要求,条目释文资料翔实,观点明确,写人记事真实客观,文字表达朴实、简明。对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坚持以一说为主或诸说并存,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例如人物条目中的“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宋子文”、“宋美龄”等,不曲意褒贬,如实地反映历史本来的面貌。宋庆龄著作条目的释文,除介绍其主要内容、观点外,还准确地说明其出处和背景,使读者读后易于了解宋庆龄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

与一般的辞典不同,《宋庆龄辞典》条目释文突出宋庆龄与各类事件和人物的关系。这是该辞典的一大特色。过去的各类辞典,条目释文内容重复、雷同的现象严重,显示不出各自的特点。宋庆龄所经历的事件和涉及的人物很多、很广泛,本书有些条目难免会与诸如中国近现代史辞典、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辞典等相关辞典的条目相同。但本辞典阐释这些条目时,很好地条理了这种关系,避免了重复和雷同现象。凡列入本辞典的事件、人物条目,除概述事件的来龙去脉或人物的生平活动外,着重突出宋庆龄与事件、人物的关系。比如:“十月革命”条目释文,概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过,重点介绍宋庆龄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和态度。“一二八事变”条目释文,在概述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事变的始末后,突出宋庆龄积极支持淞沪抗战的情况。“毛泽东”条目释文,除

介绍毛泽东的生平事迹外,还介绍了宋庆龄与毛泽东的革命情谊和宋庆龄对毛泽东的评价。“邓演达”条目释文,概述邓演达的生平事迹,着重介绍邓演达与宋庆龄并肩战斗和宋庆龄纪念邓演达殉难的情况。这样,作为人物辞典的特征就显现出来了。

《宋庆龄辞典》后面附有《宋庆龄研究论著、史料汇编简介》、《中国大陆发表的宋庆龄研究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49—1994)》。前者介绍中外学者研究宋庆龄的论著、史料汇编 79 种,内容包括书名、作者、编者、出版单位和出版的时间、页数,主要内容和论点,有的还说明对宋庆龄那方面的问题具有参考价值。后者介绍 40 多年来中国大陆发表的论文、资料的情况。这两个附录给研究者检索资料提供了方便。

总之,《宋庆龄辞典》的出版,将会促进宋庆龄研究的发展。同时,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科学的工具书。

然而,宋庆龄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所以这部辞典不可能完美无缺。正如陈锡祺教授在《宋庆龄辞典》的“序”中所说:“《宋庆龄辞典》既然由国内研究有素的

学者担任撰稿和编辑,那么,它将反映了当前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但宋庆龄研究在今后将会有较大的进展,而这也正是各位作者、编者所期望的。《宋庆龄辞典》作为一本工具书,自然有必要在若干年后吸收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加以修订”。随着宋庆龄著作的征集、整理、出版以及编辑出版专题性的资料汇编和翻译出版外国有关宋庆龄资料与研究著作,宋庆龄研究工作将上一个新台阶。这就要求《宋庆龄辞典》进行增订。宋庆龄的研究资料,还大有挖掘余地,仅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就保存着大量革命文物,仅书信一项,保存完整的有 1000 多封。其编译的《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收入宋庆龄来往信件 263 件(包括少量的电报),其中宋庆龄函电 128 件。这本书信集所收的书信绝大部分属于第一次公布发表,它为将来增订《宋庆龄辞典》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作者吴淑珍,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510275)

责任编辑:郭 林

目

郭沫若题)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张硕城

常务副主编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林有能 兼)

资深编辑

陶原珂 (主任)

冯达才 (主任)

谭湛明

编务主任

黄荣显

•学苑聚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广东专家学者学习座谈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

..... 陈家义 (5)

邓小平南方谈话闪耀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辩证
法的光辉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5周年 张江明 (7)

•可持续发展研究•

发展与发展观

——兼论可持续发展 赵凤歧 (11)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市场理性的培育

..... 任建东 (17)

•经济•

国有外贸企业资本经营探析

..... 许经勇 徐清军 袁向阳 (21)

战略选择权理论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时机选择

..... 顾乃康 (25)

论企业家技术创新的条件..... 田贵庚 汪小亚 (29)

•哲学•

论青年的道德建设..... 潘逸阳 (33)

冯友兰对辩证法思想的反思..... 张翼星 (37)

以符号学析公孙龙子的《指物论》..... 朱前鸿 (40)

•历史•

从新发现的庚戌新军起义资料谈起..... 黄大德 (45)

1997年第2期

录

政治权力与近代中日航运…………… 江道源 51)

•香港研究•

香港正在成功地走向平稳过渡…………… 吴奕新 55)

•澳门研究•

浅释港澳档案所藏有关孙中山与澳门关系研究
的一些资料…………… 澳门)霍启昌 60)

明代两广总督对澳门商埠的设置与管治
…………… 刘伟铿 66)

•文学·语言•

唐传奇与元杂剧相关作品的比较研究…………… 程国赋 71)

从陈澧《切韵考》论清浊看古今声调…………… 罗伟豪 76)

•岭南文化研究•

也论客家精神…………… 张应斌 80)

•学者专访•

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访博士导师陆贵山教授 …………… 卢铁澎 85)

•书评•

宋庆龄研究中的重大成果
——《宋庆龄辞典》评介 …………… 吴淑珍 87)

《公有制与均贫富》出版…………… 70)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83815300—246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B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Points from Guangdong Experts' Study on Mr. Deng Xiaoping's Talks (1992) in the South of China	Chen Jiayi 5)
Mr. Deng Xiaoping's Talks in the South of China, with a Glorious Light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al Construction Dialect	Zhang Jiangming 7)
Development and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 also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o Fengqi 11)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for Continu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ivation of Market Reasonal Knowledge	Ren Jiandong 17)
An Analysis on Capital Management of the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of Foreign Trade	Xu Jingyong, Xu Qingjun, and Yuan Xiangyang 21)
On the Theory of Selecting Strategy and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Choice for a Chance of Trans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Gu Naikang 25)
The Condition for an Entrepreneur's Technical Renovation	Tian Guigeng and Wang Xiaoya 29)
On the Youth's Moral Construction	Pan Yiyang 33)
Feng Youlan's Remark on the Dialectical Thought	Zhang Yixing 37)
An Analysis on Gongsun Long's (about 320BC - 250BC) 'On Naming' (《指物论》), in Light of Signology	Zhu Qianhong 40)
A Talk from the Data of the New Army's Revolt (1910) Discovered Recently	Huang Dade 45)
Political Power and Modern Sino - Japanese Shipping	Jiang Daoyuan 51)
Hong Kong Being Successful in a Smooth and Steady Transition	Wu Yixin 55)
An Explanation on Some Data Filed in Hong Kong and Macao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Sun Zhongshan (1866 - 1925) and Macao	Huo Qichang 60)
The Openess and Management of Macao as a Commercial Port under the President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in the Ming Dynasty	Liu WeiKeng 66)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hinese Romances (传奇)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Poetic Dramas (杂剧) of the Yuan Dynasty	Cheng Guofu 71)
Looking into the Ancient and Current Chinese Tones through Chen Li's (1810 - 1882) 'Qie Yun Kao' (《切韵考》)	Luo Weihao 76)
Another Talk about the Spirit of the Hakkas	Zhang Yingbin 80)
The Necessity of Insist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ent Chines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s	Lu Tiepeng 85)
An Introduction to 'A Dictionary of Song Qingning (1893 - 1981)'	Wu Shuzhen 87)
A Book Review on 'Common - shared System and Rich Balance'	70)